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周志芳 主编



Wu Jiang Xian Xian

吴江先贤

崔瑛 俞前 谈燕 编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吴江先贤 / 崔瑛, 俞前, 谈燕编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 / 周志芳主编)

ISBN 978-7-5399-7643-3

I. ①吴… II. ①崔… ②俞… ③谈… III. ①区(城市)
—名人—生平事迹—苏州市 IV. ①K820.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9974 号

书 名 吴江先贤

编 著 崔 瑛 俞 前 谈 燕
责任编辑 赵 阳 姚 丽
文字编辑 聂 斌
责任校对 张松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63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43-3
定 价 360.00 元 (全九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顾 问

梁一波 沈国芳

主 任

孙悦良

副主任

周志芳 吴 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 勇 孙悦良 孙俊良
吴 琦 何斌华 沈卫新
周志芳 金健康 凌龙华

主 编

周志芳

副主编

何斌华

统 稿

姚海兴

编 务

高 频 庞 庆

《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序

在区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经过广大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吴江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吴江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喜事！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潮流中，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吴江而言，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本土文化，很多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用瑰宝来形容，历经岁月风霜，仍然熠熠生辉。

吴江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在吴江境内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桃源广福村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震泽蠡泽湖、刘家浜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平望龙南村、袁家埭、唐家湖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同里九里湖、移定毕圩、何家坟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址和松陵邓家桥的良渚文化遗址等。而今驻足静观，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场景如在眼前。

古往今来，吴江之所以声名远播，就在于城富秀美之貌，镇多俏丽之姿，同里、黎里、震泽、松陵、盛泽、平望，古镇金镶玉嵌，集结了吴越文化之精华；就在于天光锦绣百湖，水色星涌平原，东太湖、汾湖、莺脰湖、盛湖、蠡泽湖，湖泊星罗棋布，凝聚了江南水乡之灵气。

同样，“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游子思归、名士颂扬、盛景醉人，寥寥数笔间，吴江的魅力更是可见一斑。去年评出的吴江十大文化名片：垂虹桥、古镇同里、绸都盛泽、美丽苏州湾、沈璟与昆曲“吴江派”、柳亚子与南社、费孝通与江村经济、南怀瑾与太湖大学堂等，也充分彰显“人文吴江”脉络绵长，“水韵吴江”流连忘返。

为了全面、系统地展示吴江历史文化的精髓，挖掘、传承和保护吴江的历史文脉，去年7月，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始了“吴江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编著者在撰写过程中，精益求精、几易其稿，用共享和开放的心态，科学准确记载和表达吴江的历史文化，使丛书做到了雅俗共赏、通古鉴今。无论是《吴江史话》、《吴江先贤》、《吴江诗咏》、《吴江传说》，还是《吴江古镇》、《吴江风物》、《吴江南社》、《吴江江村》、《吴江丝绸》，都是展示吴江内涵和魅力的名片，也是值得收藏和阅读的吴江地情书。

水土滋养、文化浸润，造就了吴江人厚道淳朴、开放包容的品格。而今，在新的起点上，在吴江人民奋发进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设美好家园，创造时代辉煌的征程中，璀璨的历史文化必将更好地启迪未来！

中共苏州市吴江区委书记

梁一波

2014年9月

吴江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先辈出生和居住的地方。这些年来，每当我回到吴江，亲眼目睹改革开放以来故乡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变，繁荣的经济建设，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现代城镇，浓厚的文化氛围，居民的小康生活的普遍实现，都使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江人，是在这片热土上辛勤地耕耘和劳动、创造这些业绩的广大人民以及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干部。他们是今天吴江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当然，历史是延续的，人们不能割断历史，历史的创造总是在过去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尤其是对吴江这样一个建城已达一千一百多年、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来说，更应珍视自己以往的历史。自古以来，吴江素以人杰地灵著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他们是当代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不仅在过去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例如，在吴江纪念的杰出人物中有著名的“三高”、“三贤”、“三杰”、“三忠”之称，其中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和治水御灾建功的官员。特别是进入近、现代和建立新中国以后，出自吴江的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更是层出不穷，真可谓群星璀璨，他们之中有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和牺牲的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包括“两弹一星”元勋在内的多位两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学者、教授，有战功赫赫的将军，还有名扬文化艺术界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运动员以及成功的企业家等等。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了榜样的作用。这次吴江区委启动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编纂出版《吴江历史文化丛书》，其

序

汝信

中《吴江先贤》一书是专门论述吴江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业绩的，这对于我们后人学习历史，继承和弘扬先贤们留下的思想财富，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都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本书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振兴中华，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正是近亿百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所怀抱的中国梦、吴江的先贤们所力争实现的中国梦。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学习先贤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信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把吴江建设得更好更美。

2014年8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院、学部委员）

目录

CONTENTS

总 序 / 梁一波	1
序 / 汝 信	3
张 翰	001
顾野王	004
陆元方 陆象先 陆龟蒙	007
盛 寅	010
史 鑑	012
盛应期	015
周 用	018
沈 啓	021
袁 黄	024
王叔承	027
真 可	030

沈 璟 顾大典 沈自晋·····	033
计 成·····	037
周宗建·····	040
叶绍袁 沈宜修·····	043
吴 易 孙兆奎·····	046
柳如是·····	049
朱鹤龄·····	052
计 东·····	054
潘怪章 吴 炎·····	057
钮 琇·····	060
叶 燮·····	063
王锡阐·····	066
孙云球·····	069
吴兆騫·····	072
徐 鉉 徐灵胎·····	075
潘 耒·····	078
沈 彤·····	080
陆 燿·····	083
郭 麐·····	086

杨龙石	089
殷兆镛	092
沈桂芬	094
张 曜	097
陆 恢	099
金松岑	102
陈去病	105
施肇基	108
郑辟疆 费达生	111
杨天骥	114
邵力子	117
钱涤根 钱康民	120
柳亚子	123
郑桐荪	127
蓝公武	130
王绍鏊	133
孙本文	136
金诵盘	138
金国宝	141

孙本忠·····	143
严宝礼·····	145
徐蔚南·····	148
毛啸岑·····	151
张应春·····	153
费 巩·····	156
倪征燠·····	159
蒯斯曛·····	162
刘天韵·····	164
费彝民·····	167
黄文熙·····	169
费孝通·····	171
唐长孺·····	174
杨承宗·····	177
冯新德·····	180
钱家骏·····	183
杨嘉墀·····	186
后 记·····	189

张翰

张翰（约258—319），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张翰为人纵放不拘，却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有阮籍的风度，有人给他一个称号叫“江东步兵”。有一天，会稽人贺循奉命前往洛阳经过苏州。这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博览群籍，很有学问，入名“二十四友”。

船只停泊在阊门，贺循在船中抚琴。张翰恰好经过，听到有琴音从水面传来，循声找去，便上船拜访贺循。两人虽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

攀谈之下，大为融洽，相见恨晚。张翰知道贺循是因陆机的推荐正要北上洛阳，他便和贺循同船而去，连家里人也没有告知。

当时正是齐王司马冏执政时期，征召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东曹掾是大司马手下管长吏及军吏迁除的官员。张翰当了官，但心情并不平静。因为司马氏原来是曹魏的臣子，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黜曹魏皇帝曹奂而称帝，建立晋朝，很不得人心。司马冏是西晋宗室，袭封齐王。“八王之乱”中，与赵王司马伦密结，杀皇后贾南风，后受排挤。司马伦篡位，司马冏联络河间王司马颙等共讨司马伦，迎晋惠帝复位，拜大司马，掌握了大权。他恣行非法，骄奢专权，大造府第，赏罚不明，以自己的喜好用人，手下的人都很失望。

当时有个南阳人郑云曾给司马冏上书，指出他的过失，他置之不理。另有个叫孙惠的官员也曾向他提出建议，让他改正做法，他还是我行我素，孙惠就气愤地辞去了官职。这些事情都深深地影响了张翰，他的心理开始非常矛盾，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时时兀立沉思，



◎ 张翰像

思绪不断，辞官的念头油然而生。

有一次，张翰约同朝做官的顾荣郊游。顾荣，字彦先，吴郡（今苏州）人，张翰的好友，是西晋末年拥护司马氏政权南渡的江南士族首脑。西晋灭东吴，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入洛阳，号为三俊，官拜郎中，后历任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

他们边走边聊，张翰对顾荣说：“现在天下纷纷扰扰，灾祸战乱都没有停止。你名声远播四海，想要退出政坛很难。我原本就是生活在山林之中，对现实社会没有抱持期望。您是聪明人，要适当防备，要明智地来考虑前进或是后退的计划。”顾荣握住他的手怦然说：“我也想跟你一起采南山的蕨草，饮用三江的清水！”



◎ 张翰

秋天到了，在秋风中，张翰望着南归的大雁，想起了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感觉到了江南水乡那和谐的自然环境和与世无争的人文氛围，一首《秋风歌》（又名《思吴江歌》）便从心底流淌出来：

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

他对天长叹：“人生最重要的是能够顺应自己的想法，怎么能够为了名位而跑到千里之外来当官呢”，想到这里，就命手下人收拾行李，立即动身回到了吴江，典故“莼羹鲈脍”源出于此。

张翰回到家乡后，隐居在分湖元荡，因而元荡也称为“莼菜荡”。他在元荡枫里桥建了别业，住宅的东面带水，后来当地人把这里称作莼鲈港。

在生活中，张翰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行事方式常打破常规。常常在元荡边读书、作诗，自由自在，饮酒潇洒度日，不愿意为了名利去束缚自己。

有人问他：“你可以一时生活得很快乐，难道你没想过百年之后的名声怎样吗？”张翰回答说：“给我百年之后的名声倒不如现在给我一杯酒。”世人感叹，张翰的旷达真的很难得。

相传，张翰也曾在吴江盛泽镇居住过。卜孟硕曾有记载：“盛川为府君桑梓钓游之地。先晋张季鹰绘图，晋唐宋元诸名人杂有题咏。其中高士、勋贵、孝子、贞妇、古迹幽芳，府君一一搜拾为《盛川志》。”

张翰是个孝子，五十七岁那年母亲一病不起，张翰太过哀痛，竟身染重病，不治而逝。他著有《首丘赋》，但诗文大多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六首诗。唐李白评价说：“张翰黄金句，风流五百年。”

张翰的墓就在元荡东北滩，临近菀鲈港，即现在的二图港，二图港村至今还居住着不少张氏后裔。

吴江人以张翰为傲，宋代时吴江松陵镇东门外建有三高祠，祭祀的就是张翰、范蠡、陆龟蒙。元符三年（1100），时任知县的石处道在三高祠塑“三高”像，又撰《三高祠记》。

（资料来源：《晋书》、《世说新语》、宋范成大《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吴江县志》、《盛湖志》）

顾野王

顾野王（519—581），南朝文字训诂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音乐家。原名体伦，小字阿南。特别敬慕汉朝时的野王郡长冯服孝，就改名野王，字希冯，就是希望成为冯服孝一样的人物。

顾野王出生在官宦世家，历史记载为吴郡吴人，祖上世居苏州横山，后徙光福，顾野王时徙居今吴江三里桥。祖父顾子乔，梁朝时担任过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父亲顾烜，任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掾，是州郡属官，掌春秋祭祀，对儒家学术颇有研究，还是中国钱币学的鼻祖。

顾野王年幼时就很好学，七岁时读“五经”，就能大体上了解书中的主要意思，九岁时能撰写文章。有一次写了一篇《日赋》，被梁武帝手下的亲信、领军朱异见到。朱异对他十分赞赏，认为顾野王十分奇特，是个天才。

顾野王博览群书，把经史通篇阅读完毕，记忆力很强。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梁中大通二年（530），十二岁的顾野王跟随父亲来到了建安郡（福建建瓯），被那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撰写了《建安地记》二篇，从小显示了与地学方面的才华。顾野王在绘画上也很有钻研，特别能画人物。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明朱谋珪的《画史绘要》中都有记载。顾野王的书法也很突出，曾倾心临摹“二王”书法，是魏晋书法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梁大同四年（538），顾野王因知识渊博，被授为太学博士。不久，又当上了中领军临贺王萧正德府的记室参军。

宣城王任扬州刺史时，顾野王和南北朝文学家、书法家王褒都是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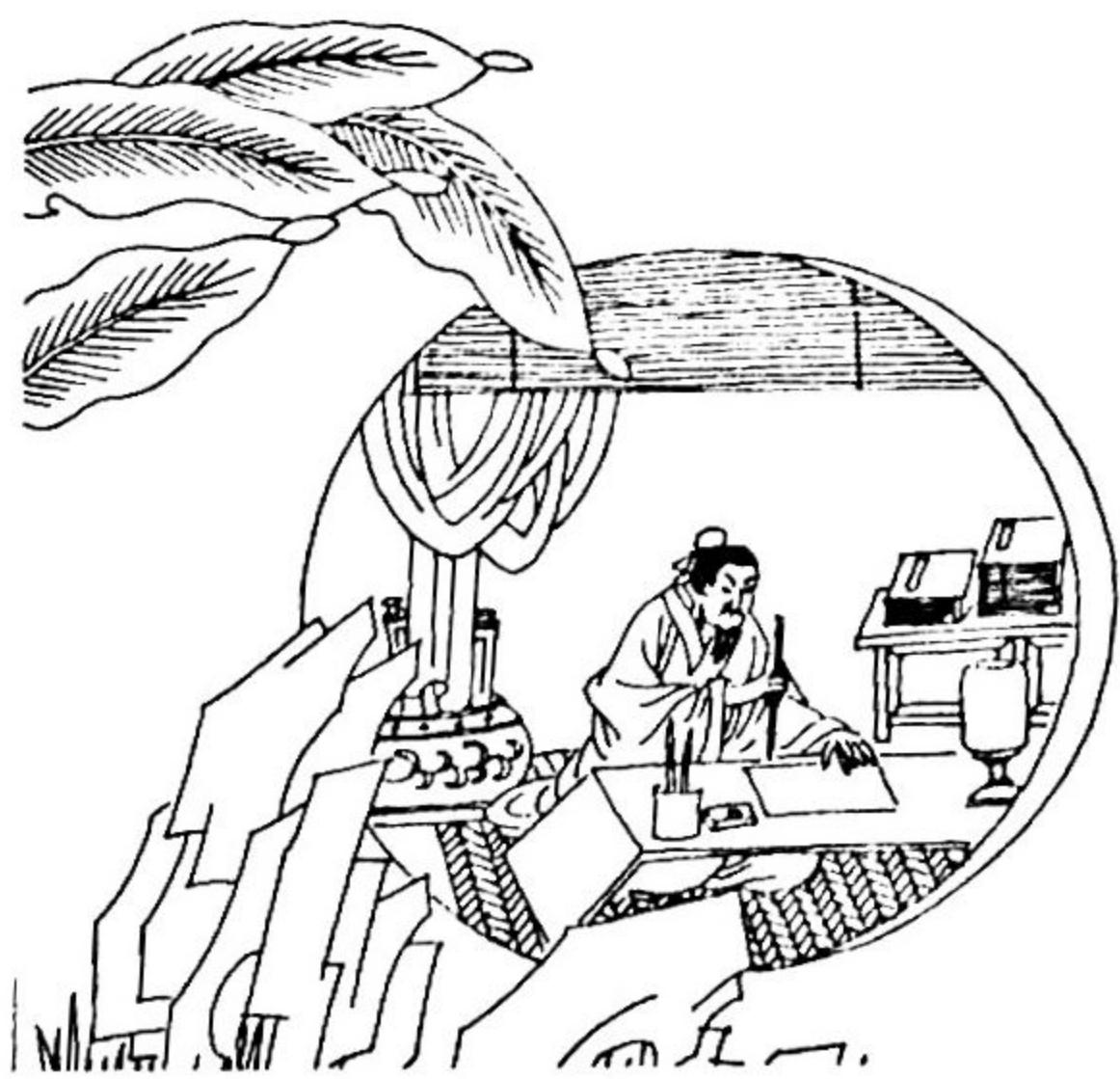
◎ 顾野王像

宾客，宣城王很爱惜他们两人的才华，在造学舍的时候，就命顾野王画古贤图像，王褒写像赞，二人珠联璧合，被当时人称赞为“二绝”。

大同九年（543）时，顾野王接受了编撰字书任务。为了静心地编纂，他在吴淞江边（现在的松陵镇）建起了住宅，书房名叫“听江轩”，在这里专心著述。顾野王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了汉魏齐梁以来古今的文字形体、训诂的异同。同年，书籍成稿，取名《玉篇》。《玉篇》共30卷，也是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第一部以楷书为主要形体的字书。《玉篇》上承《说文解字》，下启《类篇》、《切韵》等辞书，在中国古代的字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顾野王对魏晋时期异体字收集归类，共收集汉字16917个，这种处理方法被看做他的字书编纂体例特色之一。从体例上看，《玉篇》保存有广征博引的书证材料，具有文字学、训诂学方面参考价值，体现顾氏辞书编纂思想的“野王案”，忠实反映了六朝时期社会用字的使用情况。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次年二月，攻下台城（宫城），梁武帝愤恨而死。当时，顾野王的父亲刚去世，顾野王在家里守孝，听到这消息，毅然在家乡招募能作战的人，抗击侯军，有数百人响应。京城建康（南京）失陷后，顾野王撤往会稽（绍兴），又到了东阳（金华），与刘归义合军一处，共同据城抗击叛军。侯景之乱平息后，太尉王僧辩对顾野王大加赞赏，派他使监浙江海盐。

顾野王参悟禅道，相传在梁大同初年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光福施基二百余亩，建了光福寺和光福塔，香火极盛。相传顾野王曾隐居在海盐亭林镇（今属上海金山），在宝云寺附近的高阜上，建茅舍读书，后人称“顾野王读书堆”。顾野王在那里修了集地志之大成的《輿地志》三十卷。梁元帝萧绎（508—554）对顾野



◎ 顾野王

王也很是赞赏，顾野王曾撰《御览》三百六十卷，梁元帝叫宫人各念一卷，曾随驾行，有人称这为“着脚《御览》”，顾野王吟诗作文，其诗多为乐府，在游记散文和文学批评史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顾野王曾撰《陈史》，他的学问被当时的人所看重，当地不少人曾跟随他做学问。有位在隋朝当越王侗记室兼侍读的陆士季，就曾跟从顾野王学《左氏春秋》、《司马史》、《班氏汉书》。初唐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与他的哥哥虞世基从小都拜顾野王为师，跟了他有十余年。

晚年，顾野王潜心于写作，编著志书，着手撰著《通史要略》、《国史纪传》，但还没有完成，他的身体就不行了。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顾野王逝世，时年六十三岁。墓在吴县楞伽山即上方山南，清嘉庆八年（1803）钱大昕书“陈黄门侍郎顾公之墓”。

顾野王死后，皇帝下诏赠他为秘书监。去世三年后，陈至德二年（584），又赠右卫将军。《陈书》、《南史》上有传，并誉为“一代之英灵矣”。吴江人为纪念顾野王，将他居住著《玉篇》的地方，称为“顾墟”，唐末建了顾公祠，后屡毁屡建，2006年正式恢复重建，2007年下半年竣工。

（资料来源：《陈史》、《南史》、清顾大昌《顾氏原始希冯公祠墓记略》）

陆元方 陆象先 陆龟蒙

唐朝时，从松陵镇走出了父子宰相陆元方和陆象先，此后陆氏人才辈出，后人陆龟蒙是著名的文学家、农学家。

陆元方（639—701），字希仲，吴郡松陵乌步村（今松陵吴新村）人。初唐时，陆元方以通经著称。参加明经科考及第，又应八科举。武则天当政时，陆元方奉命出使岭南海外，起航的时候就遇到狂风骇浪。船上的人都很害怕，陆元方毫不畏惧，他令船只继续向前行驶。回来后被升为凤阁舍人、秋官侍郎。之后，他被来俊臣诬陷，武则天并没有听信，升他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也就是唐朝的宰相）。然而，如此直率之人，终究违背了武则天的旨意，后被贬为太子右庶子，去世时的官职为文昌左丞。



◎ 陆龟蒙像

陆元方任官清廉，两次任宰相，武则天凡有升迁任免之事，总是先向陆元方咨询，陆元方必把自己的意见密封上奏，从未向人流露过武则天对他的信托。他临死前，取出自己上奏的草稿全部焚毁，并说：“我对人所积的阴德多，我后代的福泽大概衰不了吧！”他有一匣书，常常自己封住，家中没有人看过，到他死后启封一看，乃是皇上给他的敕书。死后，被赠越州都督。开元十八年（731），又赠扬州大都督。

陆象先（665—736），是陆元方的儿子，本名景初。少有才识和度量，参加科举考试应制举，拜扬州参军，任期满调选到吏部任职。当时他的父亲陆元方在吏部当官，因而陆象先固辞不敢当任。吏部侍郎吉瑱说“为官择人，是极公正的做法。陆景初才望高雅，不是凡庸之辈所能及的，实在不因为他是吏部高官的儿子而胡乱推荐的。”上奏皇上授他职，陆象先就升

为左台监察御史，历任中书侍郎。

当时太平公主专权，宰相萧至忠、岑义等大臣都投靠她，只有陆象先洁身自好，从不去巴结。太平公主阴谋策划废掉唐玄宗，召集宰相们商议，陆象先站出来反对。太平公主见陆象先不支持自己，非常生气，就另外找



◎ 陆龟蒙务农成家

突怀贞等人商量。结果，公主的政变没有成功，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萧至忠等被诛。陆象先也算是太平公主一派的人，被抓起来准备杀头，唐玄宗知道后，立即下令释放，不仅不杀他，还以保护有功封兖国公，赐实封二百户，加封青光禄大夫。

先天三年，陆象先出任剑南道按察使，一个司马劝他说：“希望明公采取些杖罚来树立威名。要不然，恐怕没人会听我们的。”陆象先说：“当政的人讲理就可以了，何必要讲严刑呢？这不是宽厚人的所为。”六年，陆象先出任蒲州刺史，仍为河东道按察使。吏民有罪了，他大多开导教育一番，就放了。他

经常说：“天下本来无事，都是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才将事情越弄越糟（庸人自扰），如果在开始就能清醒认识这一点，事情就简单多了。”后来按察使停，入为太子詹事，历任工部尚书。

陆氏出了一代又一代名人，陆元方七世孙陆龟蒙是唐代的著名人物。陆龟蒙的父亲陆宾虞，官至浙东从事、侍御史。

陆龟蒙（？—881），字鲁望，自幼聪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春秋》更有研究，并且善于写文，当时就名震三吴。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落第后，便跟随湖州刺史张抟游历。后来张抟在湖州和苏州两地做官，陆龟蒙当了他的幕僚。陆龟蒙曾经到达饶州，整整三日，没有去拜访任何人。

陆龟蒙在苏州时，拙政园是他的住宅。在吴江的震泽、黎里都建有别墅，相传他在黎里建有“鲁望别墅”，他住在里面批经读史，习字作文。有朋友来访，就一起划着小船在楔湖中荡漾，饮酒作诗，好不快活。他在用直过

得也很悠闲，他所居的甫里别墅，在保圣寺西，内有光明阁、桂子轩、杞菊径、双竹堤等园景。

陆龟蒙精通诗、赋，陆龟蒙诗词全集收其诗 499 首。咸通十年（869），崔璞就任苏州刺史，与他一同前来的郡从事是文学大家皮日休。陆龟蒙与皮日休一见如故，一起畅游吴郡、互相唱和，时称“皮陆”。他们的唱和诗有六百余首，陆龟蒙把诗编成集子，取名《松陵集》。

陆龟蒙隐逸归于江湖之中，他有钓鱼、饮茶、作诗的嗜好。一天，他读到范蠡写的我国最早的一部养鱼书《陶朱公养鱼经》，发现这本书记录了养鱼的方法，但对于取鱼之法却是空缺，于是据自己多年垂钓江湖的经验，做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对捕鱼之具和捕鱼之术作了全面的叙述。陆龟蒙爱茶有“怪癖”。他不仅饮茶，还种茶，研究茶。在浙江湖州顾渚山下开设茶园，还写了《茶书》一篇，是继陆羽《茶经》、皎然《茶诀》之后又一本茶叶专著。

陆龟蒙对当时江东一带重要的水田耕作农具——犁的各部构造与功能作了记述和说明，写了《耒耜经》一文。《耒耜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也是第一篇谈论江南水田农业生产的专文。

陆龟蒙还对柑橘害虫橘蠹的形态、习性及自然天敌作了仔细的观察，写了《蠹化》一文，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借物抒怀，然而此文却是一篇古代关于柑橘害虫生物防治的史料。

陆龟蒙去世后，唐昭宗于光化三年（900）追赠右补阙。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和《江湖散人传》，对其生平和个性作了总结。他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淡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他著有《笠泽丛书》4 卷，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10 卷，宋叶茵合二书所载及遗篇为《甫里集》20 卷。

鲁迅先生曾高度称赞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资料来源：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李福标《皮陆研究》、曾美桂《浅析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族系发展》、云《大唐宰相世家陆氏一门：陆元方、陆象先父子》）

盛寅

盛寅（1375—1441），字启东，吴江人。父亲盛速，初名棣，字景华，明洪武初因贤良，应征到朝廷回答皇帝的咨询，符合皇上旨意，赐以官职。

盛寅向同郡王宾学医，王宾曾得戴思恭所传。戴思恭，是明代著名的宫廷医家，曾任太医院使，盛寅为戴思恭再传弟子，继承了戴原礼的学问，又精心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在医学上有了建树。

大约在永乐五年（1407）的时候，盛寅因为治愈了宫廷和皇家人员的疾病，得以担任御医，掌管太医院之事务。事情经过如下：当时，一个太监得了鼓胀病，病危，无医可治。有人推荐请盛寅治疗，果然是手到病除。此时，明成祖正在西苑射猎，太监病愈后就回到明成祖这边侍奉皇帝。明成祖朱棣远远地看到了这个太监，非常惊讶，问：“听说你病死了啊，怎么又活过来了？”太监如实奏报了盛寅为他治病的详情，赞扬盛寅医术高明。成祖听了以后，便派人召盛寅入朝，为自己诊脉。盛寅诊过脉后说：“圣上有风湿病。”并开药治疗，皇帝服药后，果然疗效很好。明成祖很高兴，立即授盛寅为御医。

有一天，盛寅与同僚在御药房下棋，明成祖突然驾到。两人连忙收拢棋盘，伏在地上跪拜。明成祖命他们把棋下完，并坐着看他们下棋。盛寅三局三胜，明成祖看了十分欢喜，命他赋诗，盛寅立刻赋诗一首，明成祖越发喜欢，就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阙。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要率大军第五次出塞北征，盛寅认为他年岁已高，劝他不要去，明成祖没听，结果，明成祖在榆木川（今内蒙古



◎ 盛寅像

多伦西北)去世,明仁宗朱高炽继位。

永乐六年(1408)的冬季,明仁宗朱高炽在做太子时,太子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御医认为她怀孕了,都向她表示祝贺。只有盛寅排除张妃怀孕,认为是患了病。张妃知道了盛寅的诊断后,说:“这医生说的很对,有这样的医生,为什么不早让他来为我诊病?”盛寅为张妃开了处方,方子是破血剂。太子看后勃然大怒,不让服用。又过了数天,张妃的病更重了。太子只好又叫盛寅来诊治,盛寅开的方药仍然是破血剂。太子还是担心这样用药会堕胎,就把盛寅关押起来,等张妃服药后,再看结果。



◎ 盛寅精于医道

当时盛寅全家人十分担忧,都认为盛寅性命不保了。张妃服药后,排下了大量淤血,病慢慢好了,大家都松了口气,盛寅的医术也得到了太子的赏赐,还派仪仗为前导,送盛寅回家。

虽然治愈了张妃的病,朱高炽对盛寅还是非常排斥,朱高炽继承皇位,盛寅就请求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太医院,到明宣宗朱瞻基继承皇位后,又把盛寅召回。

正统六年(1441)盛寅去世,两京太医院都祭祀他。盛寅著《医经秘旨》二卷,另著《流光集》等,已佚。《医经秘旨》为医经类著作,上卷为医论,下卷包括读医经的感想和临证心得19篇。这19篇中讨论了《内经》所涉及的治则问题,其中有“以寒治寒”、“以热治热”、“以补治积”、“以益气治满”、“以寒散表”、“以凉平理气”、“以温补止血”、“以攻下及补益治发热”等反治法和权变治法,并结合临证经验,辨明疑似,以便后学者有所遵循,并可触类旁通,很有价值。

盛寅的弟弟盛宏,儿子盛僕和弟子刘毓、李思勉均继承了他的医业,发扬光大,造福后人。

(资料来源:清张廷玉等《明史》、清乾隆、康熙、嘉庆《吴江县志》、徐慎庠《明代御医盛启东医事别录》)

史鑑

史鑑（1434—1496），字明古，吴江盛泽黄家溪人，因居穆和溪之西，故号西村，人称“西村先生”。父亲史珩，字廷贵，皇帝曾任他为宣义郎，他却辞谢不受，皇帝下诏，门上挂“尚义”旌旗。晚年居宜晚楼，以琴诗娱老。著有《宜晚楼集》。

史鑑聪慧好古，十二三岁时，天才敏妙，能作近体诗。出语惊人。他喜欢穿古衣、戴古帽，经常违世俗而学古人的行为。家中的家具等都很精美华丽，治理家政严格如官府，行为上又十分遵循古人的礼仪。当地人相信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史鑑为此忧虑，他上书县令请清除这种风气，他说，巫师这种职业，若上古贤明君王在世都不能容忍的，不除则风不正，礼教就不能自由推行。

史鑑的诗不少为近体，常苦思冥想，直追魏晋之风。史鑑又是著名的藏书家，是有名的江浙藏书家。他收藏书画很多，鉴赏水平也十分精辟。家中收藏了秦汉器物 and 唐宋以来的奇书名画，珍藏有林藻的《深慰帖》、南宋佚名《番王礼佛图卷》、苏轼的《天际乌云帖》和《淳化阁帖祖刻》、林逋的《秋凉帖等》等名迹，在当时有一定的名气。

史鑑特别熟知史学，与人论事辩说的口才也是十分卓越，有纵横之才，所论如风俗、钱谷、水利皆有源有据，不屈从于人。他所撰《运河志》三篇，详细记录了运河的穿行路线，又随手记下了沿河的历史事实，被收入《四库全书》。

成化中，王恕巡查江南到吴江，听到了史鑑的名声，礼请他相见，把他请到了学宫，与他讨论政务。史鑑接席相对晤谈，事实的始末详情讲得很清楚，王恕对他很敬服。曾写过《荐疏》推荐史鑑，疏中写道：“苏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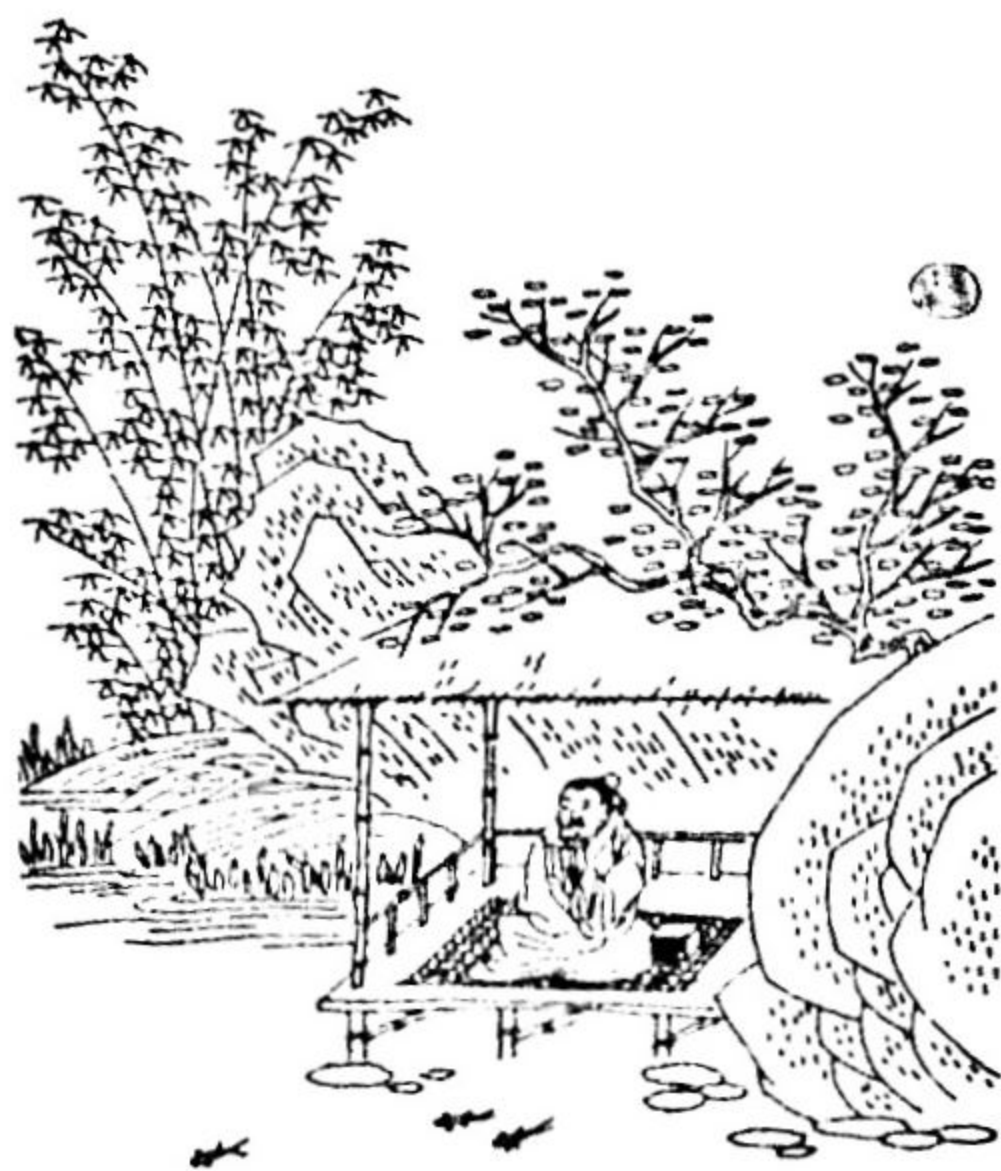


◎ 史鑑像

吴江县儒生史鑑，天资超纵，艺才标植，文采英畅，议论条贯，恣有端绪……”

史鑑筑有西村别构，极园亭竹木之胜，有榆柳园、鹤汀、橘洲、桃李蹊、回塘、迷鱼岛、花坞、芳草渡、芙蓉庄、碧芦湾，共二十七所。吴兴张渊署曰“西村钓游处”，并题诗。他交友广泛，与徐有贞、吴宽、文林、李应祯、沈周、尹宽、曹孚诸名士相互往来很密切。

徐有贞，初名理，字元玉，吴县人，曾任翰林编修。史鑑与他是好朋友，经常往来，他有时在史鑑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有一次与史鑑告别后，船行数里，忽然想到还有话没讲完，就把船



◎ 致力于诗文，博览群书。

摇了回去，又住了几天。徐有贞把史鑑作为知己，他被放逐遇大赦召回后，曾自书所作词数首赠史鑑。卷首有“武功词翰”四大篆字，“贞伯”二小楷字，下钤“湖山主人”印章，后有沈周题《满江红》词一阙，并跋语七十字，吴宽跋语九十六字。

吴宽，字原博，长洲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没有做官，贫困没钱度日时，史鑑邀请他到家里来，与他相交考证古今。曾经有个阶段，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史鑑家里。

都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在未取得功名前，史鑑请他当塾师，巡抚何鑑来到史鑑家，见都穆题屏上诗，很惊奇，劝他应试。于是移书督学，补诸生，连第进士。史鑑家购蓄古今名人真迹在吴中居首位，都穆每天与他考究，撰了《寓意编》一卷，也得益于史鑑。

文徵明，长洲人。以诸生岁贡入京用，荐授翰林院待诏。弘治二年（1490）文徵明曾随师傅李应祯到史家观颜真卿《刘中使帖册》。四年文徵明二十三岁时，从学史鑑，寓居在史鑑小雅堂，所以史鑑去世，文徵明有“凄凉小雅新堂上，曾把文章劫我曹”之句悼念。

沈周，苏州人，居相城，故人称“相城翁”。一生不仕，淡泊功名，博览勤学。工山水画，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为明四家，画名最大，是

吴门画派领袖。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因吴宽介绍，史鑑与沈周相识，二人极为相契，遂结为艺友。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史鑑长子史永龄与沈周季女结为夫妻，他俩成了儿女亲家。沈周常往来史鑑家。一日因雪霁，往约探梅。史鑑方对日饭，沈周戏曰：“史西村对日吃饭，温饱之家。”史鑑即应声曰：“沈石田踏雪寻梅，寒酸之士。”二人都抚掌大笑。钱谦益说过，明代弘治、正德间，吴中高士首推沈周，而史鑑次之。

史鑑与黎里尹宽、平望曹孚、练塘凌震有诗酒之交，成弘间号称四大布衣。他对家乡时政也很关注，曾上《论郡政利弊书·上太守孟公浚》，为当时重要政论文章。他淡泊名利，作《辞县令请乡饮书》，婉辞县令请宴一事，在乡里传为美谈。

弘治九年（1496）史鑑去世，著有《礼纂》、《礼疑》、《西村十记》、《小雅堂日抄》、《西村杂言》、《西村文抄》、《西村集》等。《西村集》收入《四库全书》。

（资料来源：吴宽《墓表》、《松陵文献》、道光《黄溪志》、《吴江县志》、《江震人物传考》、《西村集》）

盛应期

盛应期（1474—1535），字思徵（一说斯徵），号值庵，吴江人。高祖盛寅是御医。

盛应期弘治六年（1494）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辖济宁诸闸。济宁闸在大道上，盛应期约束严整，开闸与关闸都按一定的时间，舟舰没有敢乱行的，军民都很方便。苏州人吴宽赴京担任吏部侍郎时，正遇盛应期刚封闸蓄水，他的船到了济宁闸，也停了十天才过去，事后，吴宽还屡次对人称赞盛应期：“为人臣，守法当如此矣！”



◎ 盛应期

当时，太监李广刚得道，他的家人贩私盐到济宁，因为知道盛应期为人刚正阿严，就将盐全部投倒了水中。李广知道后大怒，让他的党徒秦文诬告盛应期，说他阻荐新船，为大不敬。李广又从中设计，将盛应期手下的主事范璋逮捕，关押在锦衣卫监狱。弘治十年，盛应期被贬谪云南驿丞，不久调到禄丰做知县。

禄丰县是彝族人居住的地方，当地的风俗比较粗野、强悍，也惯于偷盗。但盛应期没有鄙视他们，也不是一味抓捕，而是向当地人传教礼法，讲明查禁盗贼的道理，让犯罪的人坦白服罪，转化为良民。

正德初，父丧归乡，升武昌府同知，服孝期满，改升云南按察司佥事，分巡金沧洱海诸道。他又彻底查办了凤氏党羽，将他们利用权力所侵夺的东西还给了百姓，得到了好评。镇守太监梁裕在云南贪横不法，盛应期与监察御史张璞、副使晁必登联合抵制，梁裕就上书弹劾三人。梁裕是皇帝身边的人，皇帝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下诏将盛应期等三人逮捕下狱。直到正德九年明武宗下了《罪己诏》，朝臣纷纷上疏营救，众议难平，盛应期才复职。开始在按察司任副使，后恢复原来职务，又任河南按察使。他清

廉严正、强干精明，法令大行，先后任山东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

盛应期担任征收税粮的差事，出米银若干听，可作为来年税赋的数目，人们就争先恐后排着队到军队缴纳。平虏伯江彬仗着武宗宠爱，声威气势逼人，他随皇帝出巡，左右的人都畏惧他。盛应期我行我素，独自行平等礼，请托也不施行，周围的同事都叹服盛应期。

第二年，四川缺巡抚，盛应期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到四川任职。蜀道险阻遥远，世居的14个少数民族，情况复杂。平天全六番招讨，使得高文林父子起兵反抗朝廷，数次来侵犯劫掠，盛应期参与了讨伐，一年后，高文林被斩，其子高继恩被擒。

嘉靖二年（1523），盛应期担任了原来的官职，巡抚江西。当时江西刚刚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因战祸民生凋敝，鄱阳湖又是盗寇集中的地方。盛应期编号验船只的出入，同时调遣官军防卫巡逻，建立团保等法规。这样一来，强盗一有动静就能觉察，使强盗没有地方可容，一时四下逃散。接着，又实施减轻徭赋，动议救济。盛应期还上奏朝廷，免杂调缙钱数十万，并请求朝廷，将原来转输到南京的47万石米，20万两银用以赈济饥民。又下令江西各府积谷备荒，集聚了百余万石。此举，不仅安抚了百姓，更稳定了叛乱，他也被升官，担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

盛应期到达两广任职，大量阅记了查考审核的资料，凡是太监及总兵私自批准调动的人，全部勒令归伍，对两府官员的属吏有横行不法的人，也彻底地抑止。他还发檄文通告，两省及湖广诸路，凡要调遣都要禀告。

正德三年（1508），广西田州（今田阳）土官、指挥同知岑猛，屡侵邻部，不听征调，朝廷就商议要大举征讨。盛应期分条上疏方针策略七项，让兵部复议，说两广军队疲弱不能够使用，上疏不久盛应期升迁为工部侍郎。

盛应期在两广的行为，触犯了两府官员的利益，抚宁侯朱麒等人就肆意诽谤他。这时，正遇上御史许中弹劾盛应期暴虐，朱麒等人趁势共同制造流言。御史郑洛书又弹劾盛应期行贿结纳权贵。于是，盛应期就称病回乡了。

嘉靖六年（1527），黄河水泛滥，溢入漕运的河道，江苏沛县北部的庙道口淤积数十里，粮船为此受阻，皇帝下诏选拔可以治水的人来共同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让称病在家的盛应期担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河道，前往抗灾。

盛应期一上任，就决定在昭阳湖东面，新开掘一条一百四十余里的河道，北部由江家口进去，南部由留城日出去，这样比疏浚旧河省力而且利益长远。得到朝廷的同意，用了役夫 65000 人，白银 20 万两，规定完成期限为六个月。但在工程尚未完成时，正逢旱灾，嘉靖皇帝修身反省，有人就向他进言，认为开挖河道不是良策。嘉靖突然命令取消工役，盛应期被罢了职，工程半途而废。直到隆庆六年（1572），朱衡兼任左副都御史，经理河道。他循新河遗迹完成了新河的开通工程，给河道运输带来了很多便利。

盛应期到退休的时候才被赦免，恢复官职。有“直臣”、“材臣”、“社稷臣”之誉。嘉靖十四年（1535）去世。

（资料来源：《明史》、明袁袞《都察院右都御史吴江盛公应期传》、明陆粲《陆子余集》、马同军《明代“避黄行运”思想及其实践》）

周用

周用（1476—1547），字行之。平望烂溪（今周家溪）人。周用的父亲周昂年轻时家境贫寒，在平望烂溪计氏家做女婿，周用出生烂溪，自小聪明好学。

明弘治十四年（1501），周用中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并按惯例恢复父姓，改名为周用。中进士后担任行人，即掌管传旨、册封等事的官。正德初选拔至南京兵科任给事中。回来奔外婆家的丧事后，补礼科，重新又回到南京兵科任职。



◎ 周用像

武宗派太监到西藏迎佛，周用曾上疏劝谏。后任广东左参议。当时，广州市南部的番禺县有强盗作乱，周用监军到了龙川县，擒杀了九百余人。按当时的案例，在岭南的地方捕杀强盗一千人以上的可升俸一级，但周用并不妄杀，又将这功劳让给同事，所以没有升级，仅得到了受赏。

嘉靖初，周用曾转任浙江按察副使，后补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又升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按察使是为了一省司法长官掌一省刑名按劾。布政使是一省最高行政长官。他代监司审问南阳多年没有解决的刑事案件，案情全部理清，监狱也为之一空。当时，天大旱，朝廷发帑赈济饥民，他自请担任汝宁府分守。汝宁府在今湖南汝南，他到了乡下，亲自到百姓家里，查清户籍，在每家人家发放写有“赈”的纸条，叫百姓拿了纸条去领贮米和物品。这样，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乡里管事的人不能从中作奸，因此，救活了无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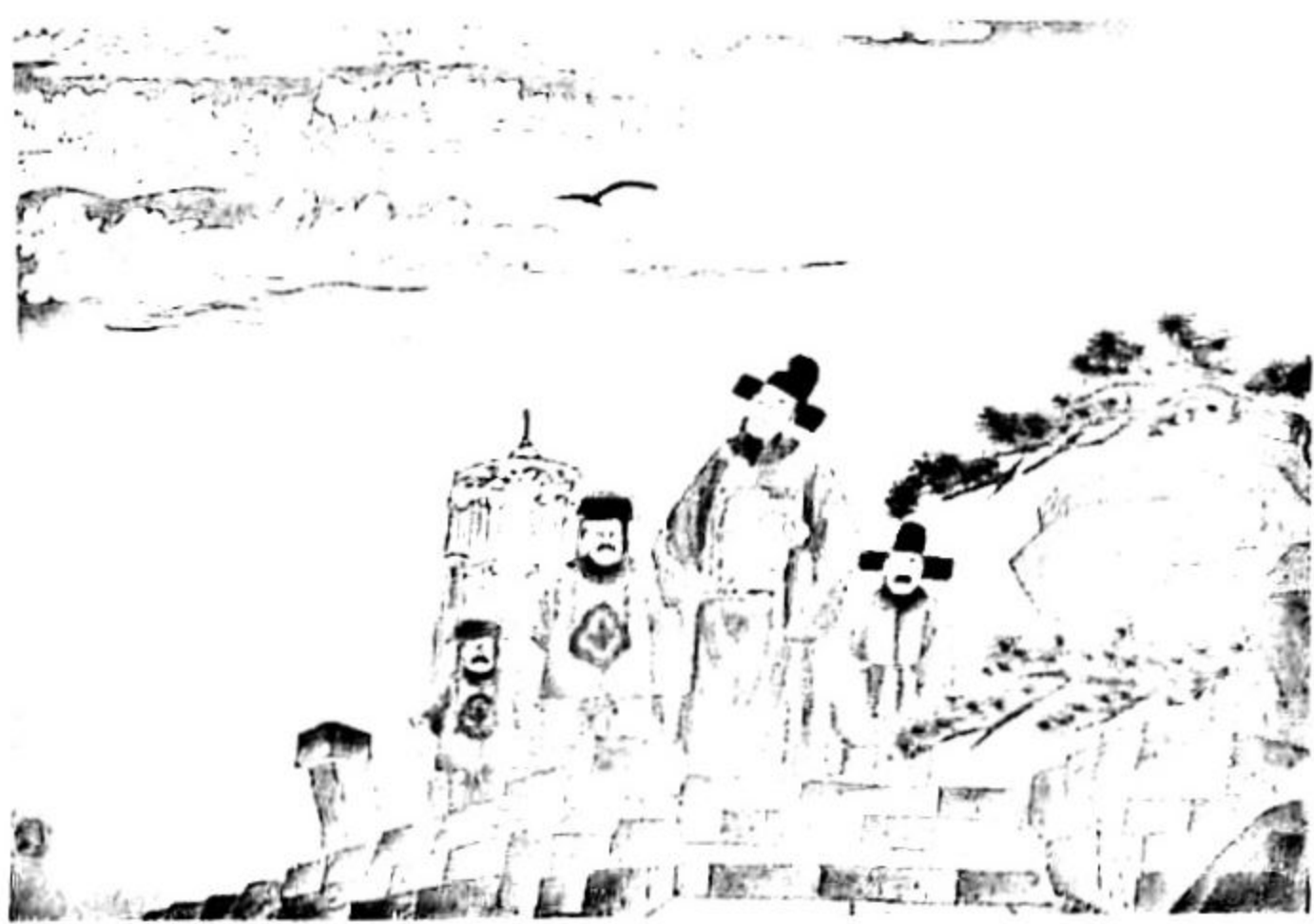
嘉靖八年，周用以副都御使提督南赣军事。当时有一大盗，官军多次剿捕而不能捉住。周用想了办法，观察到大盗部下有一动摇的人，就召来

对他恩威并施，胁使这人杀了大盗。周用认为“治盗当塞源”，从根本上解决必须清除赃吏，就下令郡邑均徭赋、缓征科、抚流民，过了一年，四境就安定了。但因税太重，很多商贾避开去了别的地方，致使军饷不足，周用了解详情后，就调整商税，使税轻重适度，商人都又回到了南赣，改善了经济，发展了当地的商品流通。

周用的业绩得到了朝廷的关注。不久，他就应召入朝帮助管理中央政府内部的事，迁吏部右侍郎。周用在任上，发现为皇宫里采购东西的吏胥，经常接受贿赂，先给商人钱而后进货，奸商因此而获利。周用就命令百姓将货物直接送进衙门，并立即付钱，使黠胥无隙可乘，积弊就杜绝了。但尚书汪鋐（字宣之，江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进士）诬陷他，在官吏升迁降调中处置不当，就将他降调到南京刑部右侍郎。

秉公执法的周用，还是深得大多数官员的敬重。当他改任刑部尚书时，遇皇帝宗庙起火，就自请免职，朝廷内外都表示惋惜。嘉靖十五年，众官员极力推荐他，他复任工部尚书，督河道，治黄河。他治河提倡沟洫治理，把黄河洪水分散到田间地头，有利于农业生产，又可达到消除黄河洪患之目的。他这种治河思想，打破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新的治河见解。他的主张得到同时代徐贞明、徐光启及清代柴潮生、沈梦兰等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治河名人”。

几个月后周用改管漕运，未久又拜左都御史，即都察院长官，秩正二品，掌监察内外百官，并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重大案件。嘉靖二十一年，阁臣夏言（字公谨，为首辅）、严嵩（字惟中，太子太师）互相倾轧时，他亦处之坦然。周用在二品任满九年后，加封太子少保。嘉靖二十五年转吏部尚书。周用任职前，吏部郎中职专权重，他们定下的事，连尚书都不能表示反对。周用考虑再三，决定有关官员职务的升降这



◎ 周用敬业尽职

类大事，只与两个侍郎商量，调动了侍郎的积极性，郎中们也就恪尽职守了，而吏员就不能从中做手脚了。

嘉靖二十七年，周用积劳成疾，死于任上。

周用工诗文，善书画，才情横溢，其书画得著名书画大家、江南才子沈周、唐伯虎的指点，气韵蔼然，备极高雅，著有《读易日记》、《楚辞注略》，并有文集十六卷行世。

自周用之后，周氏世代书香传家，科第不绝。

（资料来源：明朱希周《周恭肃公集序》、清张廷玉等《明史》、《明诗纪事》、清徐沁《明画录》、《中华大典》、清道光《平望志》、《治河名人》、张芳《明清时期有关水土保持治理黄河的理伦》）

沈 啓

沈啓(1490—1568)，字子由，吴江松陵人。父亲沈经，字惟彰，明弘治(1488—1505)初为医学训科，有干才厚德。沈啓从小学习勤奋，曾受师友称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失去父亲，但好学之志不变，博览群书、兴趣广泛，钻研过“四书”、“五经”，也探究过阴阳五行，懂历律数学。

嘉靖十七年(1538)沈啓考取了进士，任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他办事精干，深得上司赞许。嘉靖十九年，中贵人提请要修缮南京的皇陵，南京工部尚书宋景就让沈啓陪同锦衣指挥朱某到现场去踏勘。从朱某的言谈举止中，沈啓弄清楚这帮家伙

想要把工程规划得大些，好从中多渔利。于是，灵机一动对朱某说：“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皇陵不得动寸土，违犯者斩。这次修缮看来要大动干戈，是不能不动土了，怎么办呢？但死是可怕的啊。”朱某听他这么一说，吓得脸都变色了，最后向中贵人进言，决定只修墙垣，节省了数万经费。

沈啓在南京任上三年，凡是官军、俸粮以及解额、积兑之数，没有一样不熟悉的。一天，吏部侍郎张某向户部侍郎打听南京的贮粮情况，问兵部侍郎驻军数量，这两人都说不出确切数字，又问户科官积兑之数，亦问不出正确数据。工科给事中高某在一旁说，这些事情只有问沈主事，他肯定都清楚。张某不信，把沈啓叫来，一问，果然对答如流，一清二楚。

嘉靖二十一年(1542)，沈啓调任北京刑部主事。有一次，刑部尚书闻渊让他复查一个案子。这是一件六人盗窃团伙案，其中一个人没有参加分赃，反而抢先自首了。审案官据此，对其他五人都定了死罪，把自首的人放了。闻渊看了宗卷后觉得不可思议，就让沈啓复审。沈啓最终审出结果，自首



◎ 沈啓像

的人是主谋，而其余五人是从，便将主谋定了死罪，另外五人都依律减了刑。沈啓在刑部先后承旨办理 30 余桩案子，都依法办事，判断平正允当，没有出过一点纰漏，很快升为郎中。

嘉靖二十四年（1545），沈啓出朝为绍兴知府，发现会稽、新昌、萧山三县的田亩数与赋额极不相称，畸轻畸重特别明显。他经过实地调查，清理了豪门贵族隐瞒的土地，平均了赋额，刹住了歪风。这样一来，老百姓的负担轻了，完赋完粮也容易了许多。

位于绍兴城西南的兰亭，是晋代王羲之邀请文人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沈啓到绍兴后，偶然去寻访，发现那里面目全非，于是，在二十七年十月，治政稍有空闲，他就访求了原貌，捐俸挖通了水源，修复了曲水、鹅池、墨渚，建起了王氏故址、碑亭等，恢复了兰亭旧貌。

嘉靖二十九年（1550），沈啓迁湖广按察副使。当时，副都御史、两广总督张岳统兵征讨湖南辰溪一带的苗族，让沈啓负责登记战功。张岳规定凭苗人的头颅领赏，放纵滥杀无辜。沈啓坚持活捉的与杀死的要同等看待，从枪刀下救出无数

◎ 沈啓古稀之年作《吴江水考》

苗民。嘉靖三十二年，他还是因为在绍兴支持朱纨海禁的事情被撤职，回家乡吴江。

回到吴江时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在家乡仙人山筑室，以读诗、结社、著述自娱，教子弟“四书”“五经”，预备安逸度过晚年。但是他看到家乡经常有水灾，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收成，就决心在有生之年里，为将水患变为水利作出贡献，开始对吴江水系进行了全面考察。

考察水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他即重视前人经验不迷信古人，注意调查研究，着力实地观察。他不顾年岁已高，不分春夏秋冬，身背干粮，

沿着太湖长途跋涉，有时一走就是几十天。沿太湖有二百多个湖荡，上千条河流，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

通过调查，沈启对吴江水系的全貌有了了解，还观察到了湖水的侵蚀情况，明晰了田蚀与水涨的关系，领悟了防止湖水侵蚀的方法。他在考察过程中，还记录了前人许多治水的经验和方法。他肯定了范仲淹的围田法，总结太湖流域筑堤的经验，提出了筑堤法，绘画了半环体形、长方体、斜方体等大量的图。后来江苏省兴办太湖复堤工程时，曾参照过他的筑堤法。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吴江水考》一书。《吴江水考》全书分五卷，第一卷为水图考，水道考，水源考，江水考，还绘制了半球体形、长方体、斜方体等大量图画。专题记叙了古人有关测量水位的记载，说明了我国的做法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书中还绘有《吴江水利全图》、《太湖全图》、《苏州府全图》、《东南水利七府总图》、《吴淞江图》、《娄江全图》、《白茆全图》。《吴江水考》历今四百年，对当今的水利事业仍然有参考价值。

沈启晚年卜居苏州天平山附近的仙人山鸡窠岭，筑葆真书院。隆庆二年（1568）去世，年七十八，赠都御史。著作除《吴江水考》外，有《南船记》、《南厂志》、《牧越议略》、《杜律七言注》和《江村诗稿》等，《南船记》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造船技术典籍。

（资料来源：据乾隆《吴江县志》、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周世德《沈启与〈南船记〉》）

袁 黄

袁黄（1533—1606），字坤仪，号了凡，芦墟人。是明朝时期吴江的一位奇人，后世多以“了凡先生”尊称。作为明朝重要的思想家、学者，袁黄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万历十四年（1586），袁黄中进士，十六年任直隶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县）知县。当年，宝坻水灾频发，农业收成低微，人民穷困。袁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体察民情，并以自己的薪俸来抵偿赋税，使饥荒中的宝坻民众“全活甚重”。他到宝坻后除了减免税赋、减少徭役摊派，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外，就是放手发动农民抓农业。在生产方面，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南稻北栽，推广水田耕作制度。二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根据当地特点撰写、刻印《宝坻劝农书》，每户一册，分发到农民手中。《宝坻劝农书》作为农业技术专著，分天时、地利、田制、播种、耕治、灌溉、粪壤、占验等八章。主要介绍、推广关于顺应农时、辨别土质肥瘠、播种与中耕管理、沤制肥料、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以及制作闸、涵、槽与汲水工具等方面的实用技术。该书洋洋万言，并有多幅附图，涉猎广泛，注重实际，也很体贴民情。

袁黄任宝坻知县五年，百姓得到了实惠，但他对自己的政绩从不声张。一次，明廷的屯田方御史途经宝坻到玉田（县），见到宝坻四野田禾茂盛，不禁赞叹。但想到袁黄并未向朝廷报告他的劝农兴农的业绩，便问袁黄：“宝坻积年的荒地皆开成美田，为什么屡次具报都不讲这些成绩呢？”

在宝坻任职的五年中，袁黄“爱民重而官爵轻”，正直勤政、廉洁爱民，



◎ 袁黄像

以民众之心为心，所作所为皆能利民惠民，用自己的崇高品德和卓越才学树立起难得的清官形象，被誉为“宝坻自金代建县 800 多年来最受人称道的好县令”。

万历二十年(1592)，袁黄被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虽然是位文官，但他熟知兵法，足智多谋，对历史上的攻守战例作过全面研究分析，又曾独行于塞外一年多，九边形胜、山川营堡历历能道。而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发起侵朝战争。应朝鲜求援，明朝派军队赴朝鲜援救。蓟辽经略宋应昌深知袁黄擅长兵法，上疏请他到军前策划，袁黄便随军驰援朝鲜。参加“明万历朝鲜之役”，是袁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业绩，他赞画东征，往往有言必中，然而这也是他从仕途巅峰跌到谷底的一个转折点。

在平壤战役中，袁黄和主将李如松因技术问题发生分歧。他坚决反对李如松采用以“诱兵迎战倭寇”的战术，并下令禁止李部诸将“割敌尸级报功”的做法。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李如松极为恼怒，独自引兵东去。日寇趁机攻击袁黄的军队，幸亏袁黄机智应对，将日寇击退，而李如松的军队最后却被日寇击败。李如松以 10 项罪名弹劾袁黄，导致袁黄被迫停职返乡。

袁黄回到吴江，在芦墟北赵田筑了新居，建立藏书楼，开始了闭门著书的生涯。在学术方面，袁黄是“文理全才”的人物，为明朝著名的农学家、水利学家及历法学家。他所著《历法新书》涉及 46 种历法，有岁差总数积算、五纬总数积算、推天正冬至五星自行限度、求第一东西差、求太阳食甚定分、求日月出入带食所见分秒、求朔望交会约率、四平方求弦术、太白黄道南北纬度、黄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经纬度等，



◎ 袁黄革职立家训

共 150 多种求算方法，学问深邃。

在所著的养生学专著《摄生三要》中，袁黄提出了聚精、养气、存神识摄生之三大纲要。其渊源似合乎道家的精、气、神，但袁黄从医学观点进行解释，而不是一般道家所讲的玄机，且有理论，有方法，也有他自己实践的体会，至今仍不失为具有特色的养生学专著。

袁黄善于总结。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探讨研究举业之道，组织编纂了《群书备考》等参考书。袁黄还是江南善举运动的倡导者。他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劝善是全书的重点和宗旨，“积善篇”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在书中阐明了善的含义、明辨善恶的标准、行善的道理和方法。这本书还为江南民间慈善事业的兴盛起了指导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生活中，袁黄通过记过“功过格”的方法，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自律。这在当时官宦之家极受推崇，并且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对江南民间慈善事业起了指导作用。

袁黄与嘉善名人陈龙正的父亲陈于王，是同科进士，两人情趣相投，常探讨修德行义之举，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黄去世。天启改元（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字梦白，河北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重提袁黄东征时的功劳，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朝廷追封他为尚宝司少卿。

（资料来源：（明冯梦祯《寿了凡先生七十序》、《明史》、《明诗纪事》、清彭绍升《了凡居士略传》、朱鹤龄《赠尚宝少卿袁公传》、《分湖志》、《吴江县志》、袁黄《了凡四训》）

王叔承

王叔承(1537—1601)，初名光胤，字叔承，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更名灵岳。因慕昆仑山在西大荒，称为天柱，就自号昆仑山人。

王叔承的父亲风流潇洒，颇有才气，倾心艺文，曾经客居吴中，从昆山迁移到吴江严墓（今铜罗）。王叔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留给他的只有万卷书。王叔承从小酷爱读书，但家道中落，生活窘迫，王叔承只得随伯兄做小生意。他家贫不能婚，就到梅堰秋泽钱家做了女婿。钱氏以卖豆腐为业，每夜五鼓起，点起灯笼磨豆，王叔承就携书在灯下读。岳父嫌他只会读书不会干活，看不起他，把他逐出了家门，没给他一文钱。



◎ 王叔承像

王叔承只得带着妻子回到严墓侍奉母亲，重新开始研究辞学。但遇上倭寇入侵，战乱中家被毁了，家里越来越贫穷，有一天，他发了狠心，与一位朋友一起离开家门。

王叔承游历了山东、河北、山西、福建、浙江、湖北、河南等地，由此，结识了郑若庸。

郑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隐居支硎山，精通古诗文，兼工词曲，是吴中名士。郑若庸将王叔承推荐给了赵康王朱厚煜，王叔承听说朱厚煜贤而好客，就和商生去求见。却发现朱厚煜没有礼贤下士的实意，就赋诗离开了。回程中，正遇上那商生死死了，王叔承就将他葬在了河北临漳县南的铜雀台下，离开了邠地。



◎ 王叔承游学成才

到了京城，王叔承进入了大学士李春芳的家。李春芳很器重他，在此，他与太仓王锡爵、吴兴范应期、海陵顾养谦、梁溪胡濬等人为布衣之交，相得甚欢。当时，明世宗朱厚熜（嘉靖皇帝）正诏令朝臣写青词，李春芳就极力推荐王叔承。钮琇《觚賸》记载，王叔承走笔题写：“洛水灵龟单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李春芳进呈嘉靖皇帝，嘉靖皇帝阅后对他十分赏识，就命王叔承入内阁直所任职，这样，王叔承就有机会进入了皇宫，他观赏了西苑胜景，就写了数十曲《汉宫词》，

公卿互相延誉。

王叔承在李春芳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生性嗜酒，结识王锡爵后，就经常出去赴宴，每次都喝得烂醉。后来，遇到因直言被放逐的胡濬后，王叔承就辞别了李春芳，与胡濬一起纵游吴越山水。王叔承在游历中看到了不少山川的离奇现象，也品尝了不少山珍海味，使他大长见识。他一路行，一路思，一路写作，游吴越山水写作《吴越游编》，到福建写作《荔子编》，到湖南湖北写作《楚游编》。他一边游学，一边写作，留下了不少作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王叔承在镇江金山登高远眺，长江自天西涌来，浩浩荡荡，两岸舟船万计。怀古追昔，深感人生如梦，江寒逼人，意创而情伤。又逆风横折而下，游焦山暮雨而还。王叔承即兴寄怀，写下了《游金焦两山记》，成为游记名篇。

晚年，王叔承厌倦于行旅生涯而回乡，泛太湖回吴江。经澜溪时，曾在溪桥酒店狂饮，留下一诗：“水树微茫溪上村，榜人渔火暗相论。几年放浪思黄菊，此日何为别故园。一枕波涛浸客梦，满船风雨出口门。囊中尚

有鱼虾直，好问吴姬绿酒中。”

他回到铜罗，曾写有《述归》一诗：“离家四五载，骨肉多猜疑。生还不自分，忽如梦与迷。小儿不识父，大儿惊我归。妻子怨离别，笑言仍嗟咨。此别未为久，何得生酸悲。明朝事行役，为余备晨炊。”

他在村中建造了堂屋，取名“螭螟寄”。东面风塘浜边有他的先贤诗书“芙蓉阁”，他做了修建，请太仓人王锡爵题了匾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烂溪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盛产珍珠。王叔承中秋夜在烂溪草堂观采珠看到的是“溪蚌开明月，吴珠出素秋，色凝寒水滴，光动曙星流”。

王叔承在严墓惨淡度日。他曾为自己的“螭螟寄”题过一诗，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乱水来苕霅，双峰出洞庭。聊将太湖艇，一试种鱼经。世味贫堪破，玄机病忽醒。浮名君莫问，万古寄螭螟。”

王叔承与鄞县（今浙江宁波）沈明臣、苏州王稚登同称为万历年间三大“布衣诗人”。他的诗“豪宕莽苍、天才烂发”。大学士申时行评价：“其为诗，触景匠心，抒所自得，不喜为剽剥酬应语。而歌行长篇尤为词家所脍炙。”王叔承与著名文人王世贞交情深厚，诗为王世贞兄弟所推崇，王世贞撰有《昆仑山人传》。

（资料来源：明王世贞《昆仑山人传》、明申时行《王山人子幻墓表》、清钮琇《觚賸》、清《明史》、清《乾隆吴江县志》、清《江震人物备考》）

真可

真可（1543—1603），字达观，晚号紫柏，门人称尊者。俗姓沈。吴江人。父亲沈连，字季子。真可童年时就受道教佛法环境熏陶，五岁还不能说话，有异僧经过他家门摩顶，对他父亲说：“此儿出家，当为人天师。”

真可年少时豪爽侠义，与汾湖名士袁黄关系密切。当时袁黄家中藏书很多，真可一一细读，读书间常常幻想到边塞建功立业。年少时，性格刚烈勇猛。明嘉靖年间某一天，他仗剑远游。途经苏州阊门竟忽遇大雨。虎丘云岩寺僧明觉禅师在苏州办事，偶然见到真可，见他长得身材魁梧高大，是学佛、弘法善根的人，就为他撑伞蔽雨，并且邀请一

起同往云岩寺。那天晚上，真可听见寺僧唱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开悦，第二天黎明时，将带在身边的十几两黄金赠给明觉禅师，并且请求出家。就此，真可拜明觉为师，闭户读书。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十岁的真可受具足戒。不久到了常熟，相遇了辞官回乡、人称青词宰相的严讷。严讷很赏识他，留他一个多月。此后到了嘉兴东塔寺，碰到一位僧人在抄写《华严经》，一种恭敬心油然而生，便跪在一旁观看，并且叹道：“吾辈能此足矣！”于是，他便来到浙江武塘（现嘉善县魏塘镇）的景德寺闭关三年，出关后便回到云岩寺。

一天，他突然告别明觉，开始云游四方。他日行二十里，脚痛了，就用石块抵住脚痛的地方，继续前进，后来越走越快，一天竟能走一二百里。从嘉兴楞严寺开始，至北京房山云居寺，复兴梵刹计15所。在北京，他到



◎ 真可像

张家湾谒暹法师，千佛寺谒礼法师，又在西方庵访宝讲主，最后参遍老于法通寺。

真可悟道后，即遍历禅席，居无定所。他主张佛、道、儒一致，他融合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提出：“不杀曰仁，不盗曰义，不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并写有五首偈颂，对照佛、儒二家五种人伦道德。

成历元年（1573），真可来到京师，拜了“南岳下”派的三十一代传人、一方丛林的僧人遍融真圆禅师和“临济宗”二十七代传人笑岩等佛学大师为师，深得真传。

万历十五年开始，真可在峨眉山等地行脚参访，前后持续三年左右，在峨眉山时，结识禅僧善真。至万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始刻《方册大藏经》，由真可的门人如奇等主持。因山中气候严寒，不便刻经工作，四年后南移至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真可的门人桐城人吴用先为他修复径山下院化城寺，作为贮藏经板之地，并施资刻经数百卷。真可所倡刻之《方册大藏经》，因明万历间刻于浙江径山，故有《万历藏》、《径山藏》之称，为今所见最早之方册藏，在我国佛教刻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神宗万历癸巳（1593）七月，真可又和憨山一起，准备编修《大明传灯录》，前往睿曹溪洞开法脉。他们先来到匡山（今江西庐山），极力搜寻经籍，不懈修习，一直坚持了三年。意想不到的的是他们编修的《大明传灯录》的别录触犯了皇帝，憨山大师因此被逮捕下狱，不久，发配雷州。真可赶赴京师，希望能够救助憨山出狱，但到京城憨山已然南放。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今江西星子、永修等县地）太守吴宝秀奋起抗税，被捕下狱，其妻陈氏哀愤自尽。真可听后，不禁感叹道：“世道如此黑暗，我仍当以慈悲为怀！”于是，便再下匡山，北上京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见到了身在狱中、面目全非的吴太守。真可便偷偷地传授给他“毗舍浮佛半偈”，吴太守夜以继日诵念，竟然就打动了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善心，再次



◎ 真可书写的《金刚经》塔铭

派有司仔细查审案情，终于得以无罪获释。

不久京城发生了一起谣言，称神宗要改立太子，以挑拨宫廷纠纷的妖书事件。神宗下令搜索犯人，嫉恨真可的人以太后曾因真可在石径山发现舍利而施资供养，遂诬他以滥用帑金之罪，捕之下狱。并诬陷他是“妖书”的造作人，但未得到罪证。到了狱中，真可却依然一身正气、慨然正道。一天，他让狱卒给自己打来干净的水，独自沐浴净身，然后对待从性田和尚说：“我就要西归佛国了，你替我去向江南诸护法告辞！”说完，念了一首偈子：“一笑由来别有因，哪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橛花开不待春。”端坐安然而逝。

他的弟子们把他的遗骸浮葬于西郊慈慧寺外，后又移龕至浙江余杭径山的寂照庵，以后又移葬在开山。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开山前文殊台茶毗立塔。

真可生平律身至严，一衲无余。著作有《紫柏尊者全集》30卷和《卷柏尊者别集》4卷及附录1卷。其内容包括法语、经释、序跋、诗歌等。列入“明代四大高僧”。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憨山德清《泾山达观可禅师塔铭》、《紫柏老人集序》、戴继《紫柏大师简谱》、陆符《达观大师传略》）

沈璟 顾大典 沈自晋

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晚号聃和，别署词隐生。明代戏曲家、曲论家，吴江松陵人。父亲沈侃，投身过科举一直不顺，训督儿子十分严急。沈璟牙牙学语时背《三字经》，刚刚启蒙读“四书”“五经”。在沈璟十来岁的时候，沈侃便开始领着他去拜见当地的名流。

沈璟自小颖悟聪敏，天资过人。幼年就能和大人一起对对联，而且吐字清楚，声音响亮，落落大方。读书，他能过目成诵，绝无重复、颠倒、缺漏之处，被称为“神童”。

万历二年(1574)，沈璟中进士，任职方司主事，工作十分勤勉。万历七年调任礼部仪制司，提升为员外郎，沈璟不懈怠，事必躬亲，就连校勘纪录宗藩名封文件之类的小事，都亲自动手，1581年被调到吏部，任稽勋司员外郎。第二年，调吏部考功司，时时留心查访，处处发现推荐人才。

就在这时，朝廷发生了“争国本”案。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未生育儿子。万历十年(1582)八月，王恭妃生下朱常洛。十四年正月，郑贵妃生下朱常洵。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位的继承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既然皇后没有生儿子，朱常洛就应该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由于郑贵妃从来就爱在神宗面前撒娇献媚，加之能说会道，就特别得到宠幸。神宗为了要立朱常洵为皇太子，就想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朝中大臣一怕坏了祖宗的规矩，二怕引起朝廷内乱，对此纷纷表示反对。沈璟则直接给神宗上了一个奏本，要求赶快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这一举动无疑使神宗



◎ 沈璟像



◎ 沈璟寄情戏曲

大为恼火，下令将他贬官三级，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让他回吴江，实际上是体面地将他撵出京城。也许沈璟忠于职守的品格给神宗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遭贬的第二年，他被再度起用，任命为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次年又被提升为光禄寺丞。沈璟在光禄寺丞的职位上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同朝官员的赞扬。然而，第二年他却称病辞职了。原因是他升任光禄寺正卿，却遭到了一些官吏的嫉妒，礼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饶

伸相继提出弹劾，说沈璟讨好同乡申时行，录取了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为举人，这里面有弊端。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璟对政治失去了热情。辞官回乡后，他决意袖手风云，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面对人家的误解，他不辩解，最后决定辞官回乡，自表清白，以示抗议。

万历十七年（1589），沈璟回到松陵，居住在垂虹桥南的“小潇湘”里，与同镇的顾大典结交了朋友。

顾大典（1541—1596），字道行，号衡宇、衡寓。父亲顾昺与孙贲、陈策并称“江南三才子”，他辞官回到吴江，把家从芦墟迁移到了松陵北塘，在住宅后面建了私家花园“谐赏园”。

顾大典聪慧，在十岁时就写有《孤儿行》，见者辄惻然伤之。由于他工诗文，善书画，嗜词曲，在南京做官，公务之暇，一律谢绝登门的人晋见，独自坐在屋内，从早到晚读书写诗，从《离骚》到乐府、汉魏六朝以及开元、天宝诸家，罔不挖讨涵咏。还经常招呼同道一起载酒游赏，遇到美丽的风景，就画画作诗，有时一夜不归，写下了大量的诗词。

顾大典回乡后，家中养有一班家乐，宴会、来客时就在厅堂演出。他经常与朋友在园中举办诗酒会，与当时的戏曲家梅鼎祚、王骥德等都有交往，梅鼎祚赞他为“无误可顾”。1592年，顾大典带了家乐进入苏州城。

沈璟经常到谐赏园，与顾大典交流戏曲。二人境遇相同，互相观摩切磋，

你演给我看，我演给你看。顾大典创作了《清音阁传奇》四种，其中有影响的是《青衫记》和《葛衣记》。他的剧作文词雅质，讲究构局之法。沈璟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也是在顾大典的影响下完成的。

沈璟把戏曲看成一种大有作为的事业，反对“案头之曲”、提倡“场上之曲”，开始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研究与创建。他一边阅读，一边笔记，一边思考，一边写作。精心考索 17 年，最终以《旧编南九宫十三调谱》为蓝本，结合昆山腔演唱实践，在宫调、曲牌、句式、音韵、声律、板眼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在他五十四岁那年，写成《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简称《南词全谱》），建立了一整套南戏传奇的曲牌格律体系，被人誉为词林指南车。

顾大典家居七八年，约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去世，传世作品除传奇、诗稿外，还有《山水图》、《将隐斋图》、《燕子矶图》、《峦涧幽深图》等绘画作品。沈璟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十六去世，留下了传奇 18 种、曲谱 3 本、曲论 7 种、散曲 5 集、诗文集 1 本、杂著 1 本、书信 2 札……

沈璟与顾大典等人，一起交流创作讲戏研曲，逐渐形成了与汤显祖“临川派”齐名的“吴江派”。“吴江派”总人数达到 60 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是沈自晋。

沈自晋（1583—1665），字伯明，号西来，又号长康，晚号鞠通生，补博士弟子员，深沉好古，旁及稗官野史，无不穷搜。二十岁左右考中秀才，之后不再追求功名。明亡后，隐居吴山，作曲赋词，优游以终。在沈汤之争中，他首先维护沈璟曲坛领袖的地位，但他也敢于突破沈璟的局限，对沈汤对立抵触的私人关系进行斡旋，使之得以缓解。在创作上他把沈璟的恪守格律与汤显祖的妙想才思合为双美，取得较好的实绩。在戏曲关目上，沈自晋力图避免沈璟在《义侠记》中的松散平直，使用了多头并进，有张有弛的技法。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戏曲语言运用两方面也很好依据“本色当行”的原则，进行了出色的发挥。

明清之际，沈自晋年已花甲，受冯梦龙、沈自继等亲友的推戴与支持，将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进行修订增补。他于清康熙四



◎ 沈自晋像

年（1665）去世，留下传奇作品有《翠屏山》、《望湖亭》、《奢英会》（仅存收录在《南词新谱》中的五支佚曲）。散曲集有《黍离续奏》、《越溪新咏》、《不殊堂近草》，合称《鞠通乐府》。

沈氏世家文学，在明清两代赢得了文坛上一些名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清初文学家尤侗评沈氏极一时之盛，“于是而吴兴骚雅遂已领袖江南矣。”而最早将“吴江派”作为一个流派提出来论述研究的是近代戏曲大师吴梅。《中国文学史》评价：“吴江派理论的出现，表明戏曲的地位在晚明有显著提高，它已经成为士大夫普遍重视、像诗词一样受到认真探究的艺术形式。……晚明后期直至清代前期的剧作，在艺术形式上发展得更为完善，和这一理论有很大关系。”

（资料来源：《沈璟评传》、徐朔方《沈璟年谱》、《顾大典年谱》、《沈璟集》、《沈自晋集》、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

计成

计成（1582—？），明朝造园专家，字无否，号否道人。吴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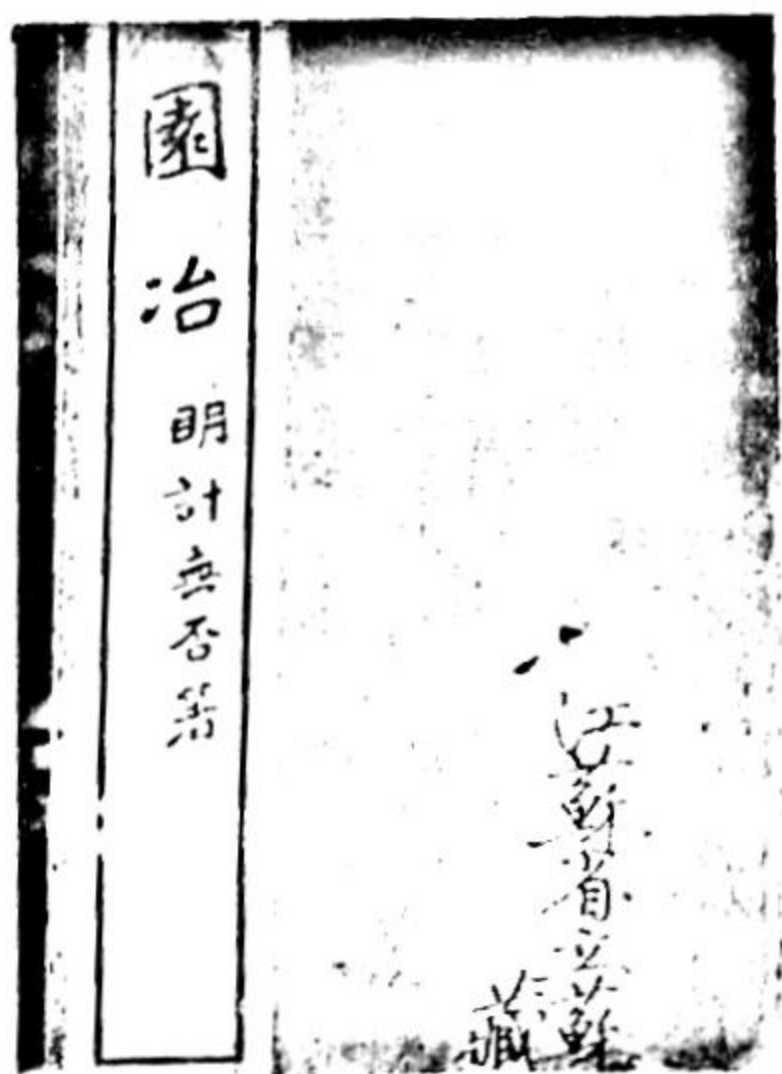
计成从小喜爱山水风光，博学多才，常常在家乡附近的苏州、嘉兴等地的园林名胜游玩，特别爱好搜罗奇形怪状的树桩石块、亭台楼阁式样，以及古董、字画。平时还喜欢画画、作诗，最喜中国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关仝笔意，以画山水闻名。计成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思想，在大量阅读古代有关园艺著述的同时游历了北京、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一方面留意古今园林的建筑结构，意景情趣，另一方面寻访假山石，中年以后在镇江定居。

有一天，计成在一片竹林间散步，看到几个园艺爱好者在叠砌假山，他就停住了脚步，看到那些人叠的假山不伦不类，一点也没有景致，他就拿起石头，几下堆叠，一座像悬崖一样的假山就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众人赞叹不已。这样，计成叠石的名声在镇江就传开了。

常州吴玄得到一块面积十五亩基地，是元代温国罕达的旧园。他闻得计成名声，就找到计成请他来造园，计成观察了这块基地，就谈了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建造园林，不但要叠石变高，还应该挖土变深，配合着古树上上下下地高踞在山腰，屈曲的树根嵌补山石，好像一



◎ 计成像



◎ 《园治》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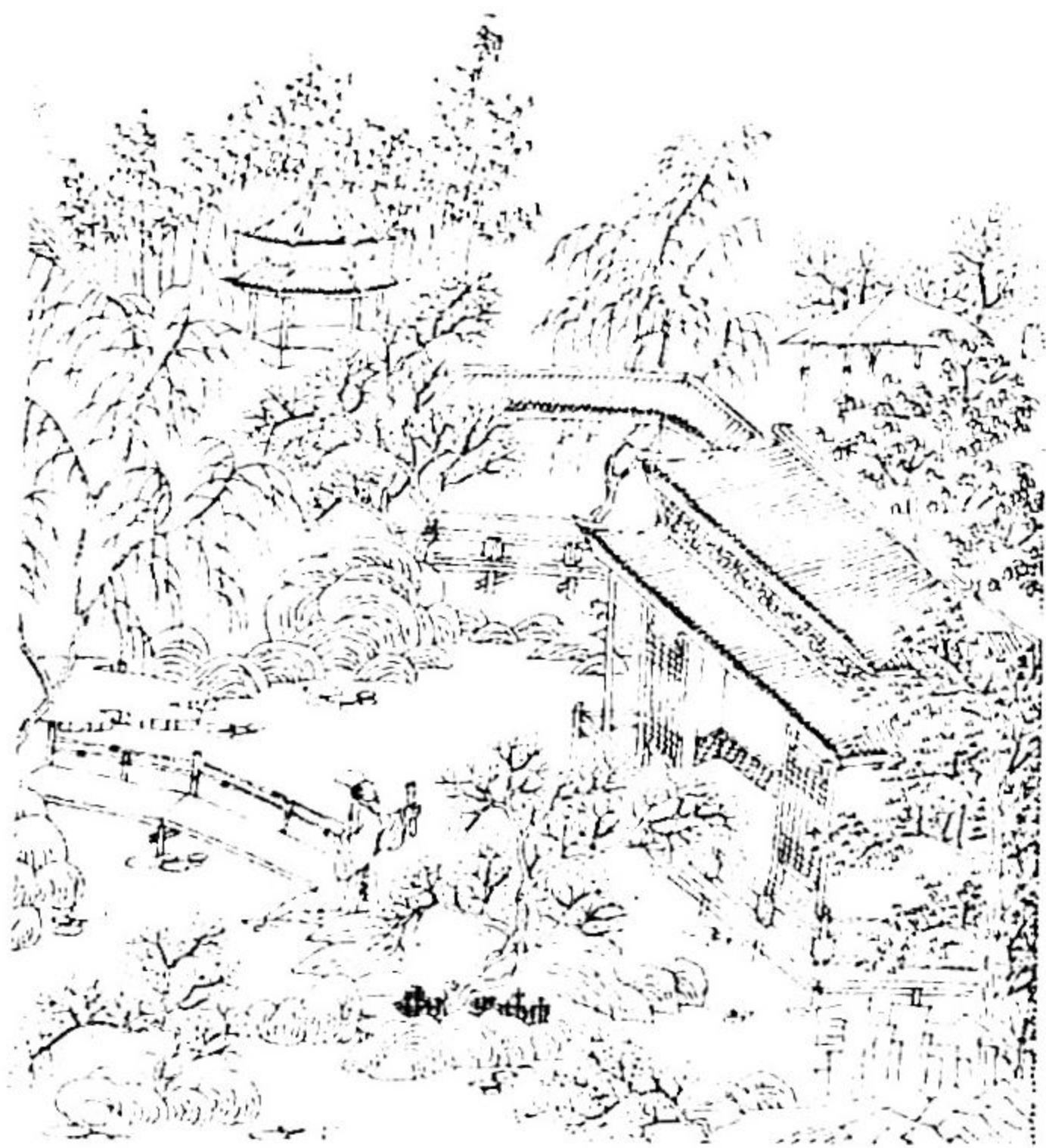
幅图画，沿着池旁的山上，构造亭台，疏疏落落地影入水面，并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境界之美使人出乎意想之外。”吴玄采纳了计成的建议。园落成后，吴玄十分满意地说：“从入门以至出园，虽仅步行四百步，但自以为江南胜景，为我尽收眼底了。”这园林取名“环堵宫”，也有人称为“东第园”，计成第一次造园名声大噪。后来，又有江苏仪征的中书汪士衡请计成去营造花园住宅，称为寤园。

计成造的最有影响的园林是扬州影园，影园是郑元勋的私家园林，为清初扬州八大名园之一，是计成的封山之作。计成造了影园后不知所踪。

影园建成后，郑元勋很是满意，写了《影园自记》。影园后因战事而毁，梦幻之景，被历史尘埃湮没。2000年，扬州在遗址重建“影园”，让游客的思古之情油然而生，也让计成这位伟大的造园家得以重生。

计成曾将自己的造园心得，整理成了图式文本，题名《园牧》。当时安徽著名文人曹元甫到仪征参观汪氏花园，曹元甫对汪氏花园结构赞不绝口，认为看到的仿佛是一幅荆浩、关全的山水画，谈话间，计成就将自己所作的《园牧》给他看，曹元甫看了，为图文并茂的文稿深深吸引住了。曹元甫指着《园牧》对计成说：“这真是千年以来没有听到的，为什么叫做‘牧’呢？这是你的创造嘛，应当改称为‘冶’”。计成欣然应允，对原稿加以整理，配有各种描图232幅，正式命名为《园冶》，于明崇祯四年定稿。

崇祯七年（1634）四月，因魏党案罢官赋闲的阮大铖偶然雇一小船，到了仪征，驶往寤园柳淀之间，顿时乐而忘返，在那里住了两宿，觉得非常安适。他听说



◎ 计成实践出成果

了这造园者是吴江计成，也看到了计成的书稿《园冶》，对《园冶》一书十分钦佩，就把书稿带走，后来由安徽人刘炤手刻，于崇祯七年（1634）出版，阮大铖为该书写了序。

《园冶》一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包含“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和“装折”；第二卷为“栏杆”及图式；第三卷包含“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园冶》付梓时，计成写了《自识》附于书后，他说这书本想给儿子作为谋生手段，现在刻印成书，同样也方便了世人。

计成《园冶》成书，得益于阮大铖的帮助。但也因阮大铖的插手，计成被看作“阮氏门客”遭人白眼，《园冶》一书也被打入冷宫。但《园冶》一书传到了日本，引起了日本园林界的重视，1916年，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学科名称，尊计成为造园鼻祖，还以《夺天功》的书名出版。1922年至1935年，瑞典造园学家奥斯瓦尔得·西润曾三次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园林的图片和书籍，对《园冶》赞赏不已，《园冶》得以传入北欧，后又有莫译本《园冶》出版。在陈植教授等人的努力下，1932年《园冶》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1965年《园冶》重刊，以后又有不少版本出现。《园冶》是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造园学专著，在中国园林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章。

（资料来源：明计成《园冶自叙》、阮大铖《园冶序》、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沈昌华、沈春荣《计成传略》）

周宗建

周宗建（1582—1626），字季侯，号来玉，曾祖父就是当过尚书的周用。周宗建幼年时，祖父遭到当时县官的诬害，家道中落。七八岁时，父亲周辑符与客人谈起杨继盛（字仲芳，号叔山，河北容城人，历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与畏敌如虎的大将军仇鸾、奸相严嵩作殊死斗争，入狱三载后受极刑的事，他在一旁听得入神，高声问父亲：“仇鸾、严嵩现在还在吗？”愤怒地叫道：“我去找他评理。”

周宗建在明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第二年任武康（今属德清）知县。周宗建在武康做的第一件事是恢复武康铜山古寺。寺是县内佛地胜景，后渐颓废，地基长期被一个姓房的豪绅强占，以前的知县碍于权势不敢下判。万历四十三年（1615），有人向周宗建递了状纸，他经过实地踏勘将地基判归寺僧，使寺得以重新恢复。

武康县东部云岫、狮山、开元等处产的石头就是有名的武康石，外地人来开取武康石的络绎不绝，使山体裸露，成了县内一大公害。万历四十三六月，周宗建写下《禁石宕文》列举开山的八大害处，勒碑在县衙前，严厉禁开，有效地保护了武康的山林。

由于出身贫穷，周宗建非常了解百姓的疾苦。武康县内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相当困苦。他就废除杂役，禁收漕粮折耗，让民间休养生息。他重修县学宫，经常召集学子讲解学问批阅文章。他将俸禄捐给地方上用于修学宫、铺路造桥，接济贫困生员就学。他谢绝一切馈赠、饮宴、交际、应酬，生活琐事全部托付给一名诚实朴素的家仆操持。他的政绩得到了老



◎ 周宗建像

百姓的爱戴。在他调往仁和时，武康百姓一再向上要求挽留，但没有被允许。他对武康百姓也有着深深的感情，曾写下《别武康诸君子暨父老序》，历数自己在武康任上的收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周宗建赴京述职后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就开始上疏直攻魏忠贤。魏忠贤是个专擅朝政的宦官。周宗建指出，现在是内有魏忠贤为指挥，旁有客氏为羽翼，外有刘朝等人拥兵示威，又有郭巩辈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忠臣，满天下已是忍无可忍。他历数了魏忠贤的罪状，认为长此以往，名将颠倒，国家危险。他痛斥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看了周宗建的奏章，皇帝一言不发，魏忠贤对周宗建恨之入骨。

天启三年（1623）冬天，周宗建出巡湖广（今两湖和广东），因奔父丧回到吴江。四年，左副都御使杨涟又上疏揭露魏忠贤及他手下人的二十四大罪状，接着，又有七十多名朝臣也上疏揭露魏忠贤，奏疏有一百多封，朝臣们的奏章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他一面哄骗皇帝，另一面开始排斥异己，迫害无辜，首先将杨涟等六人迫害致死。周宗建深知祸害的根子在魏忠贤，于是再次上疏直攻魏氏，将他妄杀无辜，残害忠良的罪行一一点数，并且声称：“举朝噤若寒蝉，臣若顾惜微躯，天下事尚能忍言哉！”

疏文入宫后，魏忠贤大为惊恐。天启五年三月，大学士、户部尚书冯铨让门生曹钦程进行诬劾，矛头直指周宗建，旁及御史李应升、黄尊素和周顺昌等人。魏忠贤假传圣旨将周宗建削籍，下令抚按追赃。当时，周宗建在吴江守孝期间闭门不出，六年四月，魏忠贤暗派锦衣卫到吴江逮捕周宗建。周宗建对夫人顾氏说是外出游历，泰然上路。吴江老百姓听说真情后，蜂拥而至，顷刻间塞满街道，哭着为他送行。

周宗建被定为东厂第一仇人，周宗建与一起被捕的七人都惨死在魏忠贤的刑具下。周宗建被铁钉钉身，又用沸水浇烫，受尽酷刑，右



◎ 周宗建清节斗奸

股骨暴露于外，舌头从右口角拖出。一天，魏忠贤给狱吏一张纸条，狱吏就将周宗建带到一间暗室里，六月十七日半夜的时候，用垂石击胸，周宗建当场毙命狱中。

到了明天启七年（1627），思宗即位，发觉魏忠贤奸情，下令逮捕，魏忠贤自缢而死。崇祯元年（1628），诏赠周宗建太仆寺少卿，赐葬娄字圩（现吴江屯村北）。福王时，追谥“忠毅”，在吴江城内仓桥前诏建忠毅坊，在南关（今长桥南）建“首扬忠毅”坊。武康士民闻讯将前溪书院更名周公书院，建周公祠、命名周公井，以示纪念。

周宗建著有《老子解》、《八识规矩注》、《忠毅公诗稿》、《周毅公集》、《道德经解》等。

（资料来源：明倪元璐《周来玉先生传》、清张廷玉等《明史》、清《德清县志》、清《武康县志》、清嘉庆《吴江县志》、李炳华《周宗建首劾魏忠贤》）

叶绍袁 沈宜修

叶绍袁（1589—1648），字仲韵，别号天寥道人，吴江北厍叶家埭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父亲叶重第，字道及，号振斋。叶绍袁出生在山东临清，从小寄养在袁黄家中，叶重第将儿子的名字改为“绍袁”，以示不忘袁家养育之德。

万历三十三年（1605）叶绍袁与沈宜修结婚。他们的住宅取名“午梦堂”。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出生于松陵镇沈氏世家，沈璟的侄女。父亲沈琬，字季玉，山东按察副使，列入“江苏清官”。沈宜修八岁失母，父亲不久续娶，把沈宜修的姑姑请回家中，照顾沈宜修及其胞弟沈自征。沈家中的年长女性大多识文断字，沈宜修由此获得了较好的文化修养。沈宜修的诗作，大都是悲怆凄楚之音，明代女性选编诗文集者凤毛麟角，沈宜修编撰的《伊人思》是现存明代第一部妇女选本朝诗文集，可以说是首开风气。后来成了吴江女性诗坛的中坚人物，有“明代李清照”的赞誉。

叶绍袁与沈宜修的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个研读书卷专心举业，一个在旁陪伴切磋琢磨。叶绍袁任官南京时，沈宜修曾携家住南京。当叶绍袁北上时，为照顾婆婆，沈宜修不得不回汾湖。



◎ 叶绍袁像



◎ 沈宜修像

崇祯元年（1628）十月，叶绍袁被任为工部虞衡司主事。礼部尚书李腾芳器重他，荐他任四川副主考，等护城河工程完工后可去上任。然而，因工部主事李逢申受冤被逮捕，他受命接任负责炮弹的生产。制炮弹面临着重大的压力，特别是崇祯皇帝自己规定了“配方”，而这配方又不符合科学，经常造成炮弹自炸。经过多次的失败才让崇祯帝同意改变“配方”，然而，就因为这事，叶绍袁受了冤屈。他完成了护城河的工程时，没有得到奖励，却得了这么一道圣旨：戴罪思过。叶绍袁感到身心俱惫，于是，他就上疏要求回乡归养老母。

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叶绍袁回到了汾湖家中，后来巡抚都御史张国维、兵备副使冯元飏和凌义渠等都曾先后列章推荐他再度任职，但他始终坚持不去。沈宜修伴随丈夫，读书吟诗。有次夫妻在灯下读鲍照的《愁苦行》，叶绍袁想起自己的身世，面对贫困的现状，不由感慨万千。沈宜修深知丈夫心中的想法，就劝他说：“不必为贫苦愁恼和忧伤，文中自有欢乐在，何须再去留恋那惊心动魄的官场生活”。

叶绍袁家有五个女儿：叶小纨、叶纨纨、叶小鸾和叶小繁，四女失载。八个儿子：叶世倌、叶世偶、叶世俗、叶世侗、叶世儋、叶世信、叶世倬、

叶世儂。叶小繁是叶绍袁姬妾所生，因生母早逝，依沈宜修为母。

长女叶纨纨，字昭齐，三岁能诵《长恨歌》，十三岁作诗，著有《芳雪轩遗稿》，又名《愁言》。书法得传了沈宜修的灵气，银钩蚕尾，也有卫夫人的风格。次女叶小纨，字惠绸。幼时即娴于吟咏，诗词清丽秀美，有诗集《存余草》留世。三女叶小鸾，字琼章，又字瑶期。沈宜修因产后体虚，出生才四个月就被送往舅舅家。舅舅沈自



◎ 叶绍袁全家插图

征是著名曲作家，舅母张倩倩也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叶小鸾四岁能诵《离骚》。叶小鸾品性高旷，讨厌繁华，喜爱烟霞，通晓佛学的义理。

崇祯五年，叶小鸾许配给昆山张立平，不料与丈夫还未能相见一面，在婚前五日突然去世，年仅十七岁。有诗集《返生香》和词集《疏香阁词》，还有《分湖石记》、《蕉窗石记》等文章留世。长女叶纨纨身体有病，叶小鸾逝世时，她回家奔丧，悲哀过度，病发而死，终年二十三岁。次女叶小纨为悼念纨纨、小鸾而创作杂剧《鸳鸯梦》。《鸳鸯梦》填补了女性创作戏曲的空白，叶小纨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女戏曲作家”。

叶绍袁经受了家人离去的接连打击，终日处于悲痛之中。他收集妻子儿女的诗文作品，分别结集，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忍饥挨饿、典卖田地，将《午梦堂集》编印了出来，这是《午梦堂集》的最早刻本，由叶绍袁自己作序。

清军入关，叶绍袁同乡吴易建立抗清队伍，在抗清形势最为困窘之时曾遣营校持牒至山中，向叶绍袁求援问策，但还没有等叶绍袁有所行动，吴易就壮烈殉难。面对清兵的侵入，叶绍袁出了家，改号为桐华流衲，又号木拂、栗庵等，他把家国存亡之际的自己流浪生活所见所闻以史笔的方式载入他《甲行日注》、《湖隐外史》等著作中，其中还收集了大量的遗民诗歌。

顺治三年（1646）农历四月，叶绍袁与儿子叶燮（叶世倌）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边的寺、庵中避难。四年四月末，山中纷纷传说清兵要抓叶绍袁，叶绍袁与叶燮离开太湖。雇小船化装成农民赶往浙江平湖。1648年，叶绍袁病逝在浙江平湖西畴别墅。

叶绍袁全家醉心文学，叶绍袁夫妇和儿子叶燮都被列入《辞海》条目，他们与女儿叶小纨、叶小鸾一家五人被录入了《中国人名大词典》，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

（资料来源：明叶绍袁《午梦堂集》、乾隆、康熙《吴江县志》、道光《分湖小识》、乾隆《分湖志》、陈去病《五石脂》、李真瑜《文学世家的联姻和文学的发展》、朱萸《吴江叶氏午梦堂》）

吴易

吴易（1612—1646），字日生，别号惕庵，一作惕斋，吴江松陵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尚书吴山的曾孙。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清兵铁骑一路南下。吴易得知消息，写下了“讨贼复仇”四个大字贴在自己的门上。同时，又作了《恢复中兴末议》四篇。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扬州，抵抗清军。顺治二年（1645）阴历正月，吴易到达扬州谒见史可法。史可法见他有异才，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幕府，推荐他担任兵部职方主事，监纪军前。吴易随



◎ 吴易像

史可法到徐州，抚定了已故兴平伯高杰部下的军队，很有功绩。吴易奉檄到江南征饷，才到江南，扬州就失守了，史可法殉国。他带着满腔悲愤回到了吴江。

到吴江后，他找到了同乡孙兆奎。孙兆奎（？—1647），字君昌，号犹文，吴江六都染店浜（今属七都）人，崇祯九年（1636）举人，性格恬静淡泊，不图名利钱财，关心国事。两人是志向一致的好朋友，吴易擅长号召联络，并且讲究武艺，又学习过兵法，孙兆奎擅长管理军队，沉着而有计谋。两人在太湖合谋起兵抗清。

顺治二年六月初一，吴易和孙兆奎派出周耀带人驻扎在吴江城内，帮助县令林颀作守城计划，和太湖义军作呼应。然而在六月四日，清兵向吴江进攻，知县林颀弃职逃走，县丞朱廷佐开门投降做了吴江知县。这时，吴易和孙兆奎都在太湖里，兵力不足来不及救援，周耀孤掌难鸣，只好离开县城，最后在抑郁中痛哭而死。

六月中旬，外间传说明朝将领黄蜚已经带兵到了无锡，要收复江南，吴易的侄子吴鉴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就一个人空手跑到吴江县衙门，大骂朱廷佐，说他是罪该万死的汉奸。朱廷佐就把吴鉴抓起来，监禁了几天以后在胥门的学士街杀了头。

吴易在太湖听到消息，立即潜回到吴江。闰六月十一日夜，他在城外振臂一呼：“杀鞑子打汉奸的跟我来”，便有三十名好汉跟随着他冲进县衙抓住了朱廷佐。吴易把朱廷佐交给吴鉴的父亲处置，他在吴江城内招兵买马大干了起来。第二天从军的就有三百人，不久，发展到了三千人。吴易与孙兆奎举起了江南第一面抗清大旗，他们的军队人称“白头军”，又叫“孙吴军。”在吴江及周围开展抗清斗争，一时名噪江南。

吴江人沈自炳与沈自驹兄弟一起到了吴易的营帐，将 1000 条船送给了吴易。沈自驹留在了吴易营中，沈自炳到了平望烂溪，开始监造箭艘。

阴历八月初六，清朝苏松提督吴胜兆打败了其他地方的义军，就率引大批人马进攻吴易的部队。由总兵李遇春率领五十四艘船的先头部队，从平望镇北到盛泽白龙桥，列阵三十里，声势很大。吴易带兵抗击。沈自炳得知消息后，马上带上造好的五百只箭艘，与吴易军队会师，对吴胜兆队伍纵横合击，把李遇春打了回去。

吴胜兆又会合了四郡兵马，蜂拥而来围剿孙吴军。苏州巡抚土国宝训练了一些小汉奸假装投效义军，混进了吴易的军队。吴易以诚相待，没有提防。战斗打响，敌人里应外合，而吴易的兵士一下子惊呆了，不知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出现了自相残杀的情况，不少人投水而死。孙吴军大败，吴易只身走脱，泅水获救。吴易父亲吴承绪和夫人沈氏及女儿都投水殉节。沈自炳、沈自驹等重要将领也力战而死，孙兆奎自溺未死被抓押到南京。临刑时，孙兆奎作绝命诗曰：“书生自分无攸济，只为纲常看得真。今日从容趋死地，欣然谈笑拜君亲。”

和珠少伯勳多餘年之尚生乎
 為君如前明沈自炳自入白
 等自注道正家而亦入白
 君子手前自勳者應向社沈
 先即於五年前本社以備
 吳易
 張
 吳易

◎ 吴易手迹(选自《明代尺牘》)

顺治三年（1646），吴江人周瑞复聚众长白荡，迎吴易入他的营帐。阴历正月十五，吴易派部将打破吴江城，杀了县官孔胤祖。当时土国宝还在苏州，阴历三月派副将汪茂功领军扫荡，在汾湖中交战。汾湖是周瑞的老家，熟悉地形，一战就打胜了。清兵退到梅堰，周瑞带兵追到梅堰。清兵又败退庞山湖，周瑞追了四十多里。多次击败清兵的扫荡，吴易军渐渐又发展起来了。南明唐王朱聿键闻知吴易，授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晋升兵部尚书。在绍兴的鲁王朱以海授吴易兵部侍郎，封长兴伯。

萧虏伯黄斌卿在舟山，吴易就想邀他从海上出兵，再邀大学士兼督师熊汝霖从江上进兵，他自己率领大军在苏州、松江策应，然后收复南京。就在吴易想大展宏图的时候，吴易部下张飞远的部队在松江被清军袭击，死了数百人。第二天，张飞远袭击金山卫又失败。阴历六月九日清嘉善知县刘肃之假意投降，请吴易到嘉善城会饮。吴易未察觉，率人进城，清总兵张国勋引兵猝至，吴易中伏被俘。押送杭州，他不愿薙发投降，在草桥门遇难。吴易赋《浪淘沙》词两首，然后北面再拜说：“今日微臣之事毕矣！”从容就刑。

吴易著有《富强要略十三篇》、《北征小咏一卷》、《东湖集八卷》、《客问一卷》、《吴长兴伯集五卷》、《惕斋遗书四卷》、《东湖唱和集》、《罗蟾诗存一卷》。

（资料来源：清《明史》、清汪诗侬《所闻录》、柳亚子《明季吴江英雄吴日生传》、陈去病《长兴伯吴易传》、全祖望《梅花岭记》）

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号蘼芜君，后由于她喜欢辛弃疾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改姓柳，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如是”暗喻了“妩媚”的意思。她是浙江嘉兴人，四五岁卖入吴江盛泽“归家院”徐佛家为养女。

归家院鸨母徐佛，是位能琴，工诗，善画兰的女子。柳如是在八岁时被卖入归家院，徐佛见她乖巧伶俐，便精心教她读诗填词，习琴棋书画，改名为朝云。两年之后，朝云十岁。吴江故相周道登在入京前夕，想着家中老母十分寂寞，便来

到归家院重金买下朝云，并替她改名为影怜。后周道登罢官回到吴江，将十三岁的影怜收为侍妾，宠爱有加，亲自教她作诗习书法。吟诗作画的幸福生活，仅仅过了两年。周道登过世，十五岁的影怜被撵出周府。影怜无家可归，再次流落到归家院。影怜年纪虽小，但久经世故，极有主见，与一般人不同，她的心中始终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愿望，她一生追求如意郎君，并为此而奋斗。

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柳如是女扮男装，千辛万苦找到松江陈子龙家。陈子龙忧愤国事，风流放达，曾在周府中偶识影怜，今日，她主动来投靠，自然十分高兴。但陈子龙家中已有妻子，他没有勇气违抗礼教，虽与柳如是感情真挚，情投意合，却也只是与她短暂同居。崇祯六年，陈子龙进京会考，留下柳如是一人。最终，陈子龙名落孙山，无颜南归，决定留京苦读三年再返。失去依靠的柳如是，又被赶出了陈家。无路可走的柳如是，第三次回到盛泽徐佛妈妈的归家院。



◎ 柳如是像

三年后，徐佛嫁人，柳如是独立门户，富甲一方。在柳如是心中，忠耿雅士才是“好风”。她选中宋辕文为至交，几经考验，觉他可靠，决定从良嫁他。不料宋家长辈嫌她出身娼门，决不同意，宋辕文至孝，只能放弃。但柳如是嫁夫从良的愿望，始终没有改变过。她三入娼门，又三度从良。

崇祯十三年的一个晚上，在江苏常熟的虞山脚下，文章宗伯钱谦益老人正在他的“半野堂”中著书立说。忽然，一位身穿儒服的俊美少年来访。钱先生仔细一看，竟是多年前，在杭州西湖一起荡舟吟诗的柳如是。这一次的夜访，成就了一段“忘年恋”，也改变了柳如是的命运。崇祯十四年，钱谦益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如夫人，二十四岁的柳如是，终于走出了归家院，嫁至常熟。婚后，夫妻感情浓厚，时常一起赋诗作文，游历江南，期间，留下了很多足迹。

当年，清军南下时，柳如是很有气节地要求钱谦益与自己一起跳湖殉国，可贪生怕死的钱不仅降了清朝还做了清朝的官，为此，柳如是气得大病一场。但她仍坚持用柔情感染丈夫，劝他迷途知返。钱谦益做了清朝的礼部左侍郎，柳如是决绝地与他分了手，到苏杭一带云游，去访问她的姐妹和故友。钱谦益在北京尝够了亡国奴的滋味，后来推病回到了故里，柳如是闻讯也回来了，两人算是和好了。这场事变，倒是折腾出钱谦益几分血性来，他积极参与到反清复明斗争中去，家中资产几乎用尽。

顺治五年，钱谦益因抗清受株连被捕入狱，柳如是正卧病在床，跃然而起，冒死随夫从行，并自认资助反清之罪，愿替丈夫受死，但官府不信，只关押钱谦益。钱家一族无人敢出头，儿子吓得缩成一团。柳如是变卖家产，赶至北京，各处打点，三十万两用尽，一月后，钱谦益无罪释放，柳如是去接他，钱谦益失声痛哭。

后来，柳如是、钱谦益又与一支抗清队伍的首领姚志卓接上了关系。一天夜里，姚志卓一个人来到了钱府，



◎ 柳如是助资反清

诉说了他的困难。柳如是将家中仅存的一些金银珠宝装了箱子，选了十几名精壮的庄丁，当夜送姚志卓去找队伍。

康熙二年（1663），八十三岁的钱谦益病逝，34天后，柳如是自缢殉节。柳如是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留下了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牘。就文学和艺术才华而言，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清人认为她的尺牘“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如是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柳如是的柔情侠骨也被后人敬仰，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就是《柳如是别传》，称柳如是为“女侠名姝”。《盛湖竹枝词》中称赞柳如是“身为名妓亦名姝，若论襟怀女丈夫”。

（资料来源：顾苓《河东君小记》、沈虬《河东君传》、徐芳《柳夫人小传》、钮琇《河东君》、《盛湖志补》、钱肇鳌《质直谈耳》、听雨阁辑《秦淮翘楚柳如是》、袁枚《小仓山房诗集》）

朱鹤龄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儒，号愚庵，吴江同里人。天资聪慧，十八岁时考童子试，得第一名。但后来五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崇祯皇帝在梅山吊死，朱鹤龄放声大哭。他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绝意科名，过起了隐居生活。

近四十岁时，他抱有著书立名的志向，隐居在吴江同里，在庞山湖边修造“江湾草庵”作为隐居读书之地。他早晚各著一篇，有人评价他“行不知路途，坐不知寒暑”，人家说他“愚”，他干脆自号“愚庵”。虽然当时满清已打下江山，统治天下，但朱鹤龄的心中认为江山依然是朱明的江山，因此，他无法书写出符合清王朝要求的文作，只有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故国之思与亡国之恨，把诗歌与家国兴亡和反清复明结为一体。

有同里人顾之俊，字仲容，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朱鹤龄与顾之俊等十五人结兰社，每月一会课。陈王道的孙子，为里中望族，他与吴载颖轮流做东道主准备餐饮，果茗酒肴备极丰腆。又赏招冯孟韶品箫唱曲以助兴，每次聚会都到夜分而散，在当地传为盛事。

苏州张奕在胥关有假我堂，顺治二年（1654）常熟钱谦益侨寓其中，张奕招集文人，朱鹤龄与钱谦益及吴县金俊明、徐晟、陈三岛、归庄、嘉定侯玄涵等，集结诗社唱酬，他曾作《假我堂文宴》、《假我堂文宴记》。朱鹤龄与钱谦益开始相交。第二年，钱谦益作书邀请朱鹤龄到常熟当私塾老师，两人合作完成了杜注的初稿。康熙元年（1662），朱鹤龄携带杜注稿本第二次到钱家当私塾老师后，二人因政治和学术因素反目，后来门人、友人助阵，俨然成了常熟派与吴江派的对峙。直至康熙三年，钱谦益去世，朱鹤龄写



◎ 朱鹤龄像

了两首《闻牧斋先生讣》悼念钱谦益，二人的争论才告终。

清康熙年间，平望唐家湖北渚的“古风庄”庄主叶继武，与吴江严墓吴振远、吴宗潜兄弟发起成立了“惊隐诗社”，又称“逃社”。含有反清复明之意。朱鹤龄也加入了惊隐诗社，这诗社名家聚集、群英荟萃，参加诗社最重要的是结识了顾炎武。

与顾炎武相交，对朱鹤龄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后来由诗文笺注转向经学。朱鹤龄一生以经学著名，《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读左日钞》等几部儒学笺注，贯穿了通经致用的原则，其经学成就与顾炎武有很密切的关系。朱鹤龄是最早阅读《日知录》的少数顾炎武友人之一。

康熙十二年（1673）在同郡汪琬的资助下，朱鹤龄开始刻《尚书埤传》，他将已刻部分寄给顾炎武，不久收到回信和赠诗。康熙十九年初，朱鹤龄将已经刻刊的《读左日钞》寄给顾炎武，顾炎武看了很欣赏，将自己多年考证所得慷慨相赠。当时书已刻过半，来不及补入，就引用顾炎武考证三十七条，作补注两卷。

顾炎武于顺治十四年（1657）北游，行踪不定，但朱鹤龄与他没有中断联系，在朱鹤龄与钱谦益的争斗中，顾炎武是支持朱鹤龄而反对钱谦益的。

朱鹤龄晚年所考索的，全是经史百家古今之义；所吟讽的，不是庄子、列子、屈原、朱熹等名家的著作，就是陶渊明、谢朓、韩愈、杜甫、白居易、苏轼等文豪的诗文。他深入研究，采撷书中的精华，探索书中的奥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去世。

朱鹤龄致力于经书注疏和儒家理学研究，一生著述等身，且其著作除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愚庵小集》即为《四库全书》所著录的清初唯一的遗民文集。被《四库全书》著录的著作还有研究汉学、宋学之成果《尚书埤传》、《禹贡长笺》十二卷、《诗经通义》十二卷、《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以及《李义山诗集注》等五部著作。另有《春秋集说》、《松陵文集》、《寒山集》、《易广义略》、《水经注笺》、《李义山文集》、《道德经注解》二卷、《杜工部集辑注》二十卷、《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三卷、集外诗笺注一卷，与顾有孝共辑《乐府笺题》二十四卷。史学家们把他与李颀、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海内“四大布衣”。

（资料来源：《清史稿》、《清史列传》、《明遗民诗》、周金标《钱谦益与朱鹤龄交往考论》、《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计东

计东（1625—1676），字甫草，号改亭，吴江盛泽人，寄籍浙江嘉兴。父亲是个私塾先生，曾在吴江城中教书。计东从小住在盛泽茅塔村茭葭浜。母亲一面纺织，一面教他读书，他每夜篝灯攻读，直至结婚。

计东家里很穷，不得不外出求取俸禄钱财孝养母亲。同时，他也带学生教学，与盛泽附近的徐季华是好友，徐季华博学多闻，贯通经史，他家颇殷实，常以其资散给贫乏之士，时称公为倪高士。



◎ 计东像

计东自小放纵不羁，父亲很担忧他，但吴江复社的创办人吴翻一见他就说：“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后来拜太仓张溥为师，十五岁补嘉兴籍诸生，一下子文誉日起。计东二十岁时，著《筹南五论》，拿了去拜谒史可法。史可法看了他的著作，觉得很震惊，其中的深明大略，可以与南宋思想家陈同甫相比，但因当时形势非常，不能用他。计东就隐居在家里，独自韬光养晦。顺治六年（1650）左右，徐季华的儿子徐钊，十四五岁，跟随季华在南州草堂读书时，与计东相识，第二年，跟从计东游学，成为计东的大弟子。

清顺治七年（1651），文人雅士举办“十郡文社”，这是一次江南文人的反清集会，以太仓吴伟业为首，连舟数百艘，在嘉兴南湖集会。计东参与其中，与会者都是当时名士，活动开展三天，最后大家结为朋友，依依不舍而分别。

顺治八年，中乙榜，被选拔升入京师太学读书。他上京时有朋友相送，朱鹤龄写有《送计甫草北游序》。十四年，计东举顺天乡试，御试第二，名

动长安。但殿试未被录取，只是挂名。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计东的挂名也被取消。大学士王熙器重他，几次举荐没有结果。

计东曾从汤斌讲程、朱之学，又从汪琬受欧、曾古文义法，报以他的为文具有本原，从文皆醇正、和平、温雅。他从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洛漳邢魏，东至济兗，揽山川之胜，交贤大夫，情投意合。因为他在京师的名声，所至一地，都有人虚馆设席，以礼相待。所到一地结交贤士大夫，所以他的诗文纵横跌宕，务必极其才力而中止。

他一路游览名胜古迹。过邳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在南门外二十里地找到，把身上的钱全部拿了出来，为谢榛修墓立石，志之曰“明诗人谢榛墓”，还请当地官员禁止在这里打柴放牧。沈德潜在东所题一绝句：“眇目山中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

他在顺德旅馆憩息，想到归有光昔日尝在顺德任通判，管马政佐郡，写有《顺德府通判厅记》就去寻找遗址，没有找到，就在官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观者都惊骇他的狂态。他从海陵归，渡江时遇到大风雨雪，船不能发，同行者垂首叹惋。计东坐在舵楼下，手上捧着王士禛的诗在朗读，读到论郑少谷绝句时，失声大哭。一会儿，却又擦干眼泪，坐于雪中，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

计东与徐乾学、汪琬、尤侗诸君交替主同盟。汪琬买下墓穴，邀计东为他写生圻志。尤侗为计写了《计孝廉传》。计东到苏州，向黄向坚自称“门生”，因为黄是孝子。他外表不羁，但内行严谨，对母亲很孝。儿子计准年十六不幸夭折，计东在盛泽茅塔村茭葭浜筑了思子亭。同邑友人吴兆騫流徙出关，计东为恤他家，就将女儿许配吴兆騫的弱子。

计东曾拜黄冈曹本荣为师，曹本荣从阳明致知之说，计东与他研究性理，已能变化气质，力敦儒行。康熙四年（1665），曹本荣病危，计东在身旁，曹本荣还教导他理尽性之学，康熙九年（1670），计东两次写信给吴伟业，先对吴氏《复社纪事》一文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该文为小人提供了“坐复社诸公以党人亡国之罪”的借口，再对《梅村集》的编排体例表示不同看法。吴伟业对《复社纪事》没作修改，但对《梅村集》提出的编排体例的批评，虚心接受。

康熙十五年（1676）当时朝廷开鸿词科，有人要推荐他，却不料计东因婴痲疾病逝。计东与顾茂伦（顾有孝）、潘稼堂（潘耒）、吴汉槎（吴兆騫）合称为“吴中四才子”。江苏巡抚宋犖为计东的遗文《改亭集》作序，称其文“醇正和雅”。清吴江诗人袁景格编《国朝松陵诗征》，称其诗“所作皆以气骨胜”。计东去世后，尤侗写有《祭计甫草文》。刊行。

（资料来源：《清史列传》、《清史稿》、 王士正《分甘馀话》、计东《蝥庵记》、陶澍《名贤像赞》、李元度《先正事略》、《盛湖志》）

潘恽章 吴 炎

潘恽章（1626—1663），字圣木，一字力田，生有异禀，颖悟绝人。九岁从父受文，记忆力惊人。吴炎（1624—1663）字赤溟、一字如悔、号悔庵，明亡后更号赤民，隐居教授，以诗文自豪。两人均为吴江平望人。

潘恽章、吴炎两人情趣相投，结成莫逆之交，如影随形，对清兵入关，杀害汉族同胞，愤慨不已。吴炎虽比潘恽章大两岁，但潘恽章比吴炎有主见，更多的时候是潘恽章出主意，吴炎附和。明亡后，两人心怀故国。当地有大吏仰慕二人声名，保荐两人为“山林隐士”，应征赴朝为官，二人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吏保荐他俩为“博学鸿儒”，两人感到如果再相拒，显得轻辱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两人相邀隐居于平望韭溪，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也常在一起谈词弄赋，吟诗作画。

清顺治四年（1647）的一天，因吴炎家有丧事，潘恽章前往吊唁。相聚间，两人一起饮酒论诗，从《春秋》、《诗经》谈起，一直谈到明代的文人志士，潘恽章说要效法司马迁、班固作史记，编一本明史。吴炎也正有此意，于是两人相约合撰一部《明史记》。自此便开始了资料的收集整理，特别是南明史事的收集、考订和编撰。潘恽章擅长叙事，吴炎擅长考核，根据各人特长选定目录，略作分工，开始着手编辑。

当时，隐居在唐家湖的好友叶继武等人结起了“惊隐诗社”，又称“逃社”。



◎ 潘恽章像



◎ 吴炎像

潘柽章、吴炎参加了“惊隐诗社”，并利用诗社频繁相聚，《明史记》也有了较大进展。吴江人戴笠，曾一度入秀峰山做和尚，还俗后隐居同里，他认为明朝之亡亡于流寇，因而以日月为序作“寇事”，这给潘柽章以很大影响。该记由潘柽章作“本纪”和“志”，吴炎撰“世家”、“列传”，王锡阐写“年表”、“历法”，戴笠编“流寇志”。其中最难的是皇帝行程实录，为此，潘柽章变卖家产处心积虑到处寻访。编写过程中，潘、吴两人经常切磋，并得到了当时名士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苏州陈济生、吴江钮琇的赞同和热情帮助。

潘柽章把他写的《国史考异》三卷寄给了顾炎武，顾炎武认为写得很精彩，对他很佩服，便毫不怜惜将自己所藏的千余卷史料全部借给了他。常熟钱谦益很器重他，谦益先有《实录辩证》，潘柽章作《国史考异》颇加驳正，几次书信往来，钱谦益也找不出他的错处，就慷慨将绛云楼失火焚烧而余下的诸书相赠。吴炎编了《世家》、《列传》二百多条，博采国史家传及有关郡县志。

潘柽章、吴炎等人写下的书稿堆满了床头，装满了箱子。可是，清康熙二年（1663），正当潘柽章等的《明史记》将成稿时，清大兴“文字狱”，潘柽章、吴炎被清廷拘捕。

这事出在湖州南浔，当时南浔首富庄允城的儿子庄廷鑑，从小文采出众，胸有大志，十五岁进了国子监。谁知一场大病双目失明。后来想到司马迁的一句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于是决定以朱国祯《史概》为草本编写《明史》。为了靠集体智慧写好《明史》，列出了他所仰慕的十八位文



◎ 潘柽章、吴炎骨气傲然

人学士，拟聘请他们作为“参订”，帮助他完成撰写工作，其中有四个吴江人，吴炎、潘柽章、张隽、董二酉。然而，就在他安排好开始编写《明史》不久，突然病亡。他父亲帮助他完成了遗愿。但由于书中无清朝年号，触犯了清朝统治者，“明史案”发，一应人都遭到了杀身之祸。二月，潘柽章、吴炎逮捕，他们的明史稿被焚，著述数年、稿成七八的一番心血被付之一炬。

潘柽章在审讯的表现却坚定而无畏。不少人都四处求人救援，或反复改变供词。他却依然如故，从容赴死。吴炎在审讯中的表现也恰如其人，根本无视高居审判席的什么中央大员、封疆大吏，只顾一个劲地高谈自己的见解，指斥强权的可恶无耻，甚至大骂不止。弄得审判官们狼狈不堪，恼羞成怒，叫衙役们一哄而上使棍乱打，直到把吴炎打昏在地。

同年六月，潘程章、吴炎被斩于杭州弼教坊，同死者七十余人。潘柽章和吴炎在就刑那天，谈笑自如。两人遇难，家人都被流放北方，两位夫人死得都很壮烈，吴炎妻张氏自杀于齐化门，潘柽章妻沈氏发配黑龙江时正怀孕，就受了刑。潘柽章同父异母的弟弟潘耒陪同嫂嫂一起北徙，沈氏到那里生了小孩，就立即自刎殉节。

顾炎武在祭潘、吴两人诗中曰：“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滨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为潘、吴两人葬身“文字狱”深表痛憾。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光绪版《平望志》、清《平望续志》、袁璟辂编《国朝松陵诗徵》、《松陵文献》、戴笠《潘力田传》、陈去病《吴节士赤民先生传》、周宗奇《血光之灾》）

钮 琇

钮琇(?—1704)，原名泌，字书城（一作书臣），一字玉樵，吴江北麻人（现盛泽镇南麻）。出身于一个极不得志的读书人家庭。父亲钮宏儒，字希醇，号芥菴。去浙江应试，浙江提学副使黎元宽对他有知遇之恩。明亡，立志隐居，编有《芥庵自怡编》。

钮琇家贫困，自小生活清苦但注重学习。受父亲的教育，在吴宗汉家塾学习《尚书》、《左氏传》及制艺。吴宗汉去世后，钮琇又从族兄钮棨游，这钮棨是个襟怀恬淡的隐士，明朝灭亡后筑楼汉滨，绕以修竹，种菊其下，赋诗饮酒。

康熙六年（1667），钮琇取入江庠，十一年选拔为贡生，入国子监后，跟从昆山的徐元文学习。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很有学问。钮琇受到了徐元文的赏识，学业长进很快。大约也在这个时期，他与并称“海内三髯”的慈溪姜西溟、邵阳康孟谋、阳羨陈其年结识相交。

康熙十九年（1680），钮琇第一次当官，任河南项城知县，当时项城不少百姓，因交不起田地税而逃亡。钮琇知道后，尽全力为百姓交了以前的税，拿了牛和种子把百姓都招回，恢复了生产。钮琇任项城知县时，兼管沈丘县，到那里检阅监狱时，见有男女犯人六人，已关了十七年，一问才知是因为江南之狱而株连的人，钮琇毅然把他们释放，并向上级报告准许他们回归故籍。前知县刚升为太常博士，离开前，拜访钮琇，对他说：“我在官十三年不敢将这些人放了，你到了三天就释放他们，你的才识超过我很多了。”

钮琇在项城做知县，就把父母接到了项城。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父亲去世，第二年母亲亦病亡。他曾写有五古《述哀》诗，感伤父母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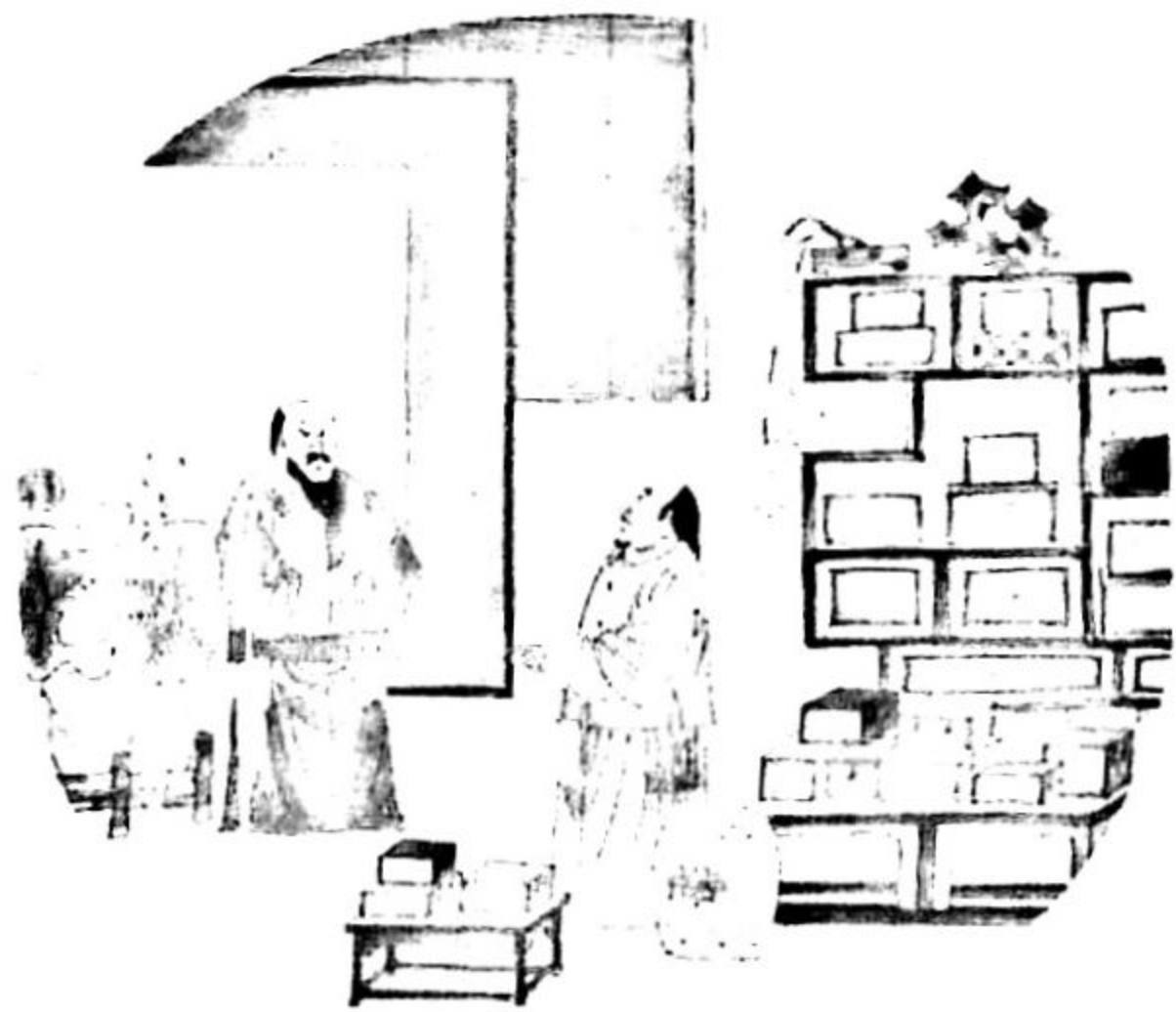


◎ 钮琇像

逝、不能孝养的心情。二十四年冬，钮琇从项城扶柩南归，在家守制。二十七年服丧期满，补任陕西白水知县。三十年四月，钮琇捐俸将县门思齐楼修葺一新，并撰写了一篇《重修思齐楼记》，赢得当时名士如富平李因笃、邵阳康乃心、淳化沈振麟、吴江沈天宝的唱和。他在任上以严明著称，三十一年遇大饥荒，有奸民乘机劫掠，钮琇执法彻底查办，使得境内秩序肃然。他又请发内帑三千金、楚粮五百石以赈灾，这样，流亡的人能够聚集回乡。

康熙三十七年（1698），钮琇调任广东高明知县，高明山界连鹿岗、阜幕诸峰，通药径，是强盗出没的地方。钮琇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而是以情服人，有强盗头子带强盗二十四人倾巢而出自首，钮琇就请示上级同意，每人发了一块免死牌，让他们去防守边疆要塞而赎罪。他还让贫困的人有粮食，有住房，很多强盗因为戒律严明后，就不再来侵犯，这地方就太平无事了。高明的水界连牂牁，每次西江涨水这里的堤坝就容易决裂，钮琇就自己带头捐金，指挥修筑堤坝数百丈，这样，就杜绝了水灾的出现。钮琇恃才傲物，吟风弄月，性好游览，豪爽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他作为一位“儒吏”，任职时能注意省官用，捐逋赋，兴水利，招流亡，操行艰苦，取得相当的政绩，受到居民的拥戴，高明人将他列入名宦祠。

钮琇入燕都、登梁苑、过函谷、临珠海，游览大好河山，每到一地就采录风土轶事、搜集丰富的神异故事，集成《觚賸》一书。从康熙二十七年任陕西白水知县开始，到康熙三十九年在高明官署的根青阁完成。写成正编八卷，以故事来源或足迹所至之地分卷，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续编，则变换了分卷的角度，以叙事的侧重点为标准。《觚賸》一书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大价值。《清史列传》摭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称《觚賸》“记明末国初杂事，



◎ 钮琇为民申冤

能举见闻异词者折衷之，可补正史之阙；其文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今人编撰《续修四库全书》，将此书与《聊斋志异》、《虞初新志》一并收入，亦显示出它们在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人把他比作与蒲松龄相当的清初杰出作家。

钮琇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于任上，几年以后归葬家乡。他从宦二十四年，终身只是一个七品知县。有《临野堂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诗余》二卷、《荔梦编》一卷、《尺牍》四卷及《觚賸》正编八卷、续编四卷等存世。

（资料来源：《清史列传》、《吴江县志》、《钮琇评传》、高冰《钮琇》、陆林、戴春花《清初文言小说〈觚賸〉作者钮琇生年考略》、梁芳芳《钮琇研究》、[美]白亚仁《钮琇〈觚賸·睐娘〉本事考》）

叶 燮

叶燮(1627—1703)，原名叶世倌，字星期，号已畦，后改名燮，寓居横山，学者称横山先生。父亲叶绍袁，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明末杰出的女诗人。五个兄长、四个姐姐，都富于文思才情。

叶燮四岁由父亲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五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叶家读书之所谢斋读书，由叶绍袁亲自教导。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叶燮读诗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小鸾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八

岁的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受父亲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精通佛理，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等，叶绍袁也常把叶燮带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十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拜访雪峤上人，十四岁作《哭兄诗八首》，载入《灵护集》。到了十五六岁时，叶燮对佛学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驳不倒他了。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十八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叶燮与三个兄弟，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与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驶向茫茫汾湖，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崇祯十九年农历四月，叶燮父子辗转进入太湖，一路上，大多寄住在寺、庵，使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的消息传到太湖中，叶绍袁也在追捕的名单中，叶燮父子只得离开太湖，到浙江平湖的冯家，也就是叶绍袁的外婆家避难，叶燮在平湖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到父亲病逝。

叶燮在平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离开平湖，孤身一人隐居苏州横山。



◎ 叶燮像

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倬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需要叶燮的照料，叶燮在横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这期间也曾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做过多年的私塾先生。

康熙五年（1666），叶燮在乡试中中举人，康熙九年取进士。十四年六月任宝应知县。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叶燮



◎ 叶燮洁己爱民

征督民夫抢修堤防，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面临财政空虚的局面，叶燮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叶燮在宝应清正廉洁，整顿吏治，秉公执法，除恶扬善，兴修水利，抗洪救灾，恢复生产。但因为刚直，不到二年就被免职。与他同期免职的还有嘉定知县陆陇其，叶燮当时高兴地说：“与同是

清廉的人一起被罢官，不为官场中的污迹所染，这是一种幸运。”叶燮离开时，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是宝应的父老乡亲凑钱为他置备行装，买船相送。

清顺治十六年（1657），叶燮携带妻子儿女隐居苏州郊外的横山，绝意仕进。他在横山建筑了一个小园林，取名“独立苍茫”，建筑一套居室，取名“二弃堂”。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游历名山大川之行。游历中，接触到很多下层百姓的生活，增加了生活阅历，极大地丰富了诗文创作的题材，创作了大量诗歌。在游历中，叶燮也广泛接触一些名流。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辩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叶燮工诗古文，以诗论见称，他创作了专门论述诗学问题的理论著作《原

诗》。在这部书中，叶燮将以往诗话单纯从“诗教”、“诗法”角度研究诗歌的模式提升到审美的层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诗学论著，又是一部美学论著。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分别论述叶燮对诗歌创作主体、诗歌创作客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以流变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论、《原诗》的历史贡献四个大问题。《原诗》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叶燮回到横山后，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他的学生沈德潜、叶长扬、张锡祚、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士。叶燮与汪琬大打笔仗在当时很有影响。

叶燮晚年寓居寺庙里，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一位老僧。七十六岁那年，为没有到过诸暨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回来后不久就在横山病逝。叶燮的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诗文集《已畦集》和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以及《诗集》十卷。王士禛称叶燮是“熔铸古昔，自成一家”的人。

（资料来源：沈德潜《叶先生燮传》、《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国朝先正事略》、蒋凡《叶燮与原诗》、刘诚龙《叶燮焚书》、任星火《叶燮传略》）

王锡阐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又字昭冥，号晓庵，又号余不，天同一生。

王锡阐出生在震泽镇的一个清贫的家庭，十一岁开始悉心于学，清军入关，十七岁的王锡阐作出的反应是自杀殉国。他先是投河，遇救未死，又绝食七日，最后在父母强迫下才重新进食。清政府建立后，王锡阐放弃科举，拒不仕清，他为明守节，穿古衣、用古字表示对现实不满。

王锡阐忠于亡明，与明朝遗民中的一些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他最密切的朋友是潘柢章和吴炎。十二三岁时，潘柢章跟从他的父亲潘凯到震泽康庄别墅吴氏家里作客，而当时，正巧潘柢章的朋友，同样是平望人的吴炎也跟从叔父吴宗汉到震泽住在王锡阐家里，于是王锡阐就认识了潘柢章。

清顺治七年（1650），吴江平望镇人叶继武与严墓人吴东篱兄弟一起创立惊隐诗社，王锡阐成为其中一员。惊隐诗社成立后，王锡阐参与了编撰《明史记》。从顺治十一年（1654）开始，他们寒暑无间，埋头写作。编写过程中，王锡阐就在潘柢章家里的私塾中教书，经济上得到了潘柢章的支持。因为潘耒是潘柢章之弟，王锡阐也很爱护他，在师友之间。王锡阐去世后，潘耒将他幸存的50余种遗稿加以搜集刊行，集成《晓庵遗书》、《晓庵先生文集》，并作了序。

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为达到传教的目的，他们带来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称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影响最大的是天文学，这为王锡阐



◎ 王锡阐像

研究天文学打开了大门。

王锡阐生来聪明颖异，性格孤僻，从不与同年龄的孩子一起游戏。他天性爱好思考，不善于交际应酬。那时候一般的读书人，对于数学上割圆、勾股的测量方法，大多感到目眩心迷，难以弄清楚，然而王锡阐却能手画口谈，好像下棋时的黑子白子一样清楚。他常常说，自己无论坐着还是躺着，总觉得像有一个浑天仪在面前，日、月、五星交错地在浑天仪上横行。

当时科学还不发达，他又是个人研究，家里经济条件差，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没有钱购买仪器，王锡阐就自己制造了一种叫三辰晷的仪器。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王锡阐每逢天色晴朗的夜里，都坚持观察天象。站在下面视角小，看不全面，他就爬到高的地方。他当时居住的是旧式瓦房，人字形的屋顶成了他的观察所，他经常爬上屋顶，躺在瓦楞上仰观星象，通宵达旦，整夜不睡。躺在屋顶上，条件十分险恶。但他坚持每天将观察到的现象及时记录下来，并且进行计算。逢到月食和日食这样特殊的时节，他更是勤于观察，敏于计算。当他发现观测的结果与计算所得不一致的时候，就追根寻源，一定要找出原因。

大约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的时候，王锡阐的《历说》五篇完成了。此时，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天文学著作，主要有《推步交朔测日小记》，《丁未历稿》、《五星行度解》、《历表》、《历说》、《日月左右旋问答》、《圆解》、《三辰晷志》等。清康熙二年(1662)，王锡阐完成了《晓庵新法》一书，这是一部中西合璧之作，把中国传统的天文模式的潜力发挥到了空前的地步，首创月体光魄的推求方法，独立发明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办法，并提出精确计算日月食的方法等。这部书是在王锡阐去世后才问世，受到了当时中国天文学界的高度评介，称为是中国古典历法的压卷之作。王锡阐另有一部数学著作《圆解》，他在《圆解》中就给出了对平面三角学中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公式的证明。在书中，王锡阐一方面受西方《几何原本》的影响，对所用到的数学名词和概念首先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他又按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不用《几何原本》中一系列关于“角”的名词，代之以从《周髀算经》中发展而来的“折”的概念。学者认为《圆解》是会通中西数学的最早文献。清初有“南王北薛”之称，把他与山东的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薛凤祚并称，而另一位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则评价：“近世历学以吴江为最，识解在青州之上。”“青州”即薛凤祚。



◎ 王锡阐纪念馆

王锡阐不仅仅是一个天文、历算学家，又是一个学者、诗人。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提倡“经世致用”，独尊程朱理学，顾炎武对王锡阐也很钦佩，顾炎武作《广师》一文，列朋友中有过己之处者十人，王锡阐居其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在理学

上对王锡阐最有影响的是清代理学家张履祥，王锡阐在语溪（浙江崇德境内）吕留良家当塾师结识张履祥，开始宣扬北宋周敦颐和二程的哲学。

王锡阐一生以志节自励，忍饥杜门，20余年如一日，晚年更是贫病交加。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在震泽去世。王锡阐在天文学、数学上的成就在国内享有盛誉，美国的席文、英国的李约瑟和中国的席泽宗都有专文介绍。美国科技史家吉利皮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列中国古代科学家9人，王锡阐为其中之一。

王锡阐去世的第二年，家乡人为他在震泽镇上修了墓，墓碑题刻为“高士王晓庵先生之墓”。1827年（清道光七年），家乡人为他重修时改立“王晓庵先生之墓”碑。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春，张履祥往谒江苏巡抚林则徐，请檄修晓庵王先生之墓，林则徐倡捐重修，同时在墓侧新建王贤祠。为纪念王晓庵诞生370年，吴江在震泽再建王晓庵纪念馆。

（资料来源：明潘怪章《松陵文献》、清钱仪吉《碑传集》、《江苏古代科学家》、薛斌《王锡阐年谱》、吴国良《王锡阐年谱》、刘纯《梅文鼎与王锡阐》、宁晓玉《王锡阐与惊隐诗社》）

孙云球

孙云球（1630—1662），字泗滨，号文玉，吴江六都双石桥（今属七都）人，父亲孙志儒，字茂叔，号大若，然性好学，手不释卷。母亲董如兰，懂诗书，通晓文艺。

孙云球十三岁考中秀才，入浙江武康县学，后随父母迁居苏州虎丘山下。迁到苏州不久，父亲不幸去世，家境就一天天衰落下来了。虽然家庭贫困，但没有丧失志向，他从小聪明好学，在逆境中抽时间发奋读书。十五六岁时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依靠卖药草来养活母亲和他自己。

孙云球从自身条件和兴趣出发，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他特别喜欢制造器械，对测量也精通，为了校准自鸣钟，他制造出一种自然晷，又号日晷，这是一种古老的时钟，作为根据太阳光影子的长度测定时刻的仪器，测定白天黑夜的时间十分正确。

孙云球最大的兴趣是制造眼镜。明代，眼镜仍是珍贵的珍稀之物，当时出现了一种“单照”，它和现在的放大镜差不多，尽管随身携带方便，但不能架在鼻梁上，使用还是很不方便，他看到许多视力差的人，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

杭州是我国早期眼镜制作的中心，孙云球曾赴杭州向陈天衢学习制镜技术。陈天衢曾求学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德意志耶稣会士、学者汤若望。孙云球还曾把一批杭州学者请到苏州一起讨论、研究。苏州还有个富有科学技术知识的薄珏，他的年龄稍长于孙云球，曾经制造过望远镜和浑天仪，对孙云球有一定影响。孙云球年轻时学习中国制镜技术的同时，又接受了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几何、物理等科学知识。国外输入的眼镜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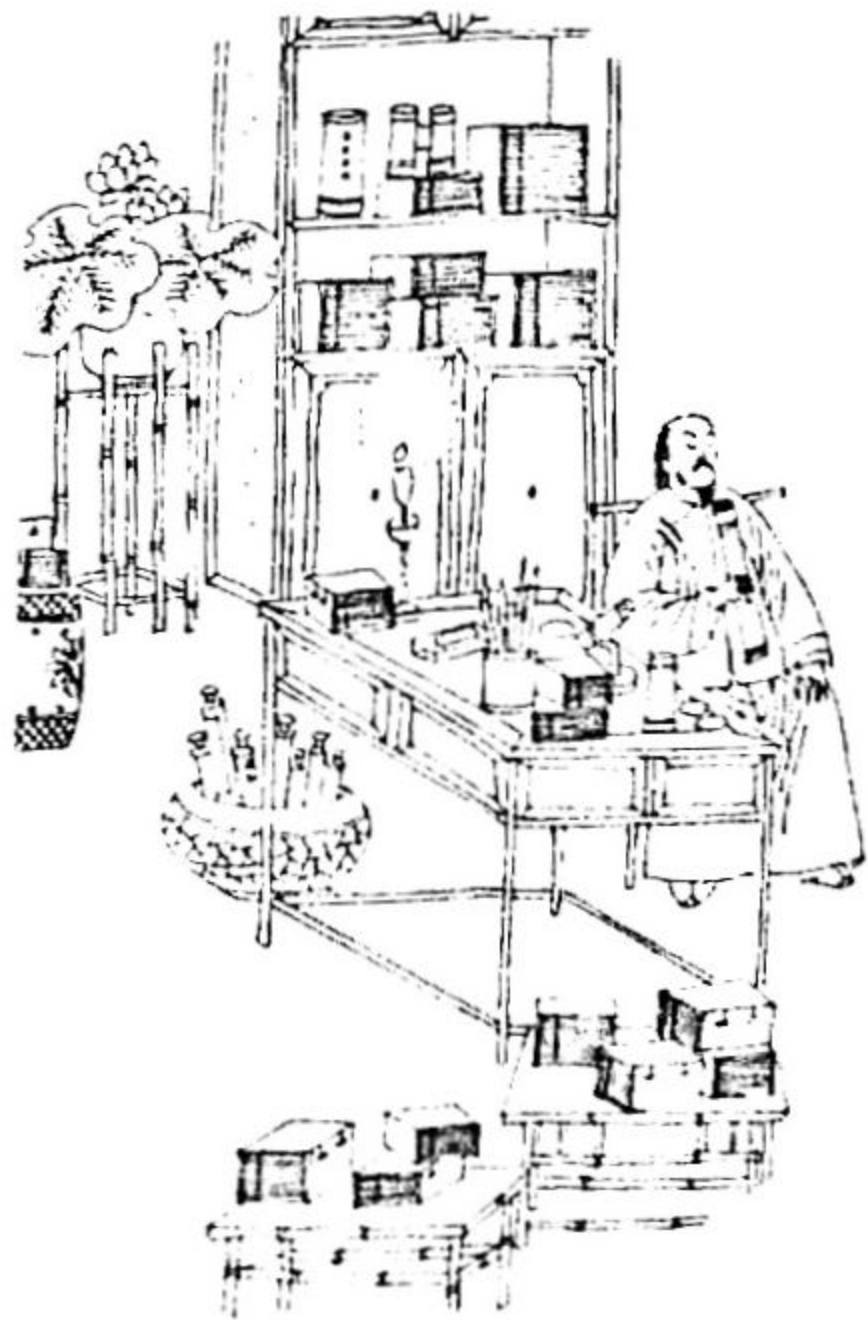
◎ 孙云球像

玻璃制成的，孙云球创造性地采用水晶作为原料，运用手工磨制的方法。经过自己制作眼镜的实践积累和探索，最后终于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创造性地用水晶材料磨制成镜片，还创造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他磨出了老花、少花、远光、近光等品种。眼镜又从手里拿的发展到可以戴在鼻梁上，并且有各种深浅度的镜片，适应各种视力缺陷的人的需要。他制作的“半镜”是一种半圆盘形的眼镜，即眼镜仅仅有下面半块透镜，佩戴者眺望远方时可以直接通过上部，不必借助镜片，特别适应于老花眼之类的人使用。孙云球的成功是一个飞跃，研制一成功，投放市场，不少人慕名来买。

孙云球制造出眼镜后，就开始研制其他光学仪器。在磨制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基础上，他又利用水晶石磨制成存目镜、万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望远镜）等各类光学制品，使广大的眼疾患者能减轻痛苦。

他研制了许多具有不同用途的镜片，特别是把磨制成的凸透镜和凹透镜组合在一起制造出了望远镜，成了我国民间最早制造望远镜的人，它虽比1608年荷兰伯利休制造的欧洲第一架望远镜晚了五十年左右，但比日本自制望远镜早一百三十年，在我国光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孙云球的影响下，苏州逐渐成为我国有名的眼镜制造基地，眼镜的价格一路走低，最终使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孙云球的舅舅董德近视很严重，阅文缮写，在一寸以内才能看清，康熙十七年（1678）参加乡试，借助孙云球所制眼镜，顿时使目光能看到一尺远，他中了举人，眼镜起了一定作用。

孙云球除了制造深浅不同的眼镜和望远镜外，还制造了各种光学仪器七十多种。他制造的“万花镜”，会使一个像变成多个，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万花筒。“察微镜”是一种复合显微镜，可以看清一丝一毫的东西，类似现在哈哈镜。“存目镜”可以拿在手里看清楚细小的东西，



◎ 孙云球醉心制镜

是真正的放大镜。类似现在的探照灯的“放光镜”比欧洲制造的探照灯早了一百多年。他总结多年制镜经验，写成《镜史》一卷，由他的母亲董如兰写序。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影响很大，可惜的是它后来失传了，使我们今日难以窥其全貌。

清朝康熙元年（1662），孙云球去世。他的发明创造及他写的《镜史》一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光学仪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被誉为“明末清初科学巨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苏州博物馆参观时，对孙云球的创造发明很感兴趣，并将他的成就记入自己的专著中。

（资料来源：《虎阜志》、《吴县志》、《儒林六都志》、清叶梦珠《阅世编》、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顾晓红《中国光学仪器制造业奠基人——孙云球》）

吴兆騫

吴兆騫（1631—1684），字汉槎，号季子，出生于吴江松陵镇一个宦宦之家。吴兆騫少时颖异不凡，七岁读书，九岁时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十岁写下《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后来，随父亲宦游楚地四年，终因张献忠起义，奉母归里。清兵入关后，吴兆騫归隐乡里，与江南士大夫互唱互和。顾贞观比吴兆騫小六岁，禀性聪颖，才思敏捷；尤其擅长诗词，声望与吴兆騫并驾齐驱。两人因文结缘，成为莫逆之交。他曾与汪琬漫步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引袁淑对谢庄的话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



◎ 吴兆騫像

顺治年间，江南一带的才子齐聚苏州虎丘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结社活动。此活动由钱谦益授意，吴梅村出面组织，目的是为“慎交”、“同声”二社调和，作二社的和事佬。吴兆騫与尤侗、计东、顾贞观都是“慎交社”的重要人物。虎丘大会上，吴兆騫与吴伟业即席唱和，“吴梅村嗟叹，以为弗及。”一时吴兆騫、陈其年、彭师度被并称为“江左三凤”，吴下英俊才子，都以结识吴兆騫为荣。吴伟业更是对吴兆騫赏识有加。由此奠定巩固了吴兆騫在江南士林中的地位。吴兆騫写有绝句二十首，是《望远曲》之意。他托名豫章女子刘素素，乘夜题在虎丘寺壁上，第二天早晨诸文士见了，感到很惊异，以为真是闺阁中笔。一时和的人很多。

正值吴兆騫名声大振，踌躇满志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科举冤案却将这位江南才子抛入了苦难深渊。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闱科场案”，吴兆騫为仇家所中伤，遭人陷害，含冤下狱。第二年三月由礼部逮赴刑部。顺治皇帝亲自在中南海瀛台复试全部丁酉科江南举子，吴兆

骞也参加其中。考试的时候，武士林立，戒备森严，每举人一名，由满兵二员，刀夹两旁。在这次复试中，吴兆骞叹了一口气：“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乎？”于是就不答题，交了白卷。最后查出的结论竟是“审无情弊”，但吴兆骞仍被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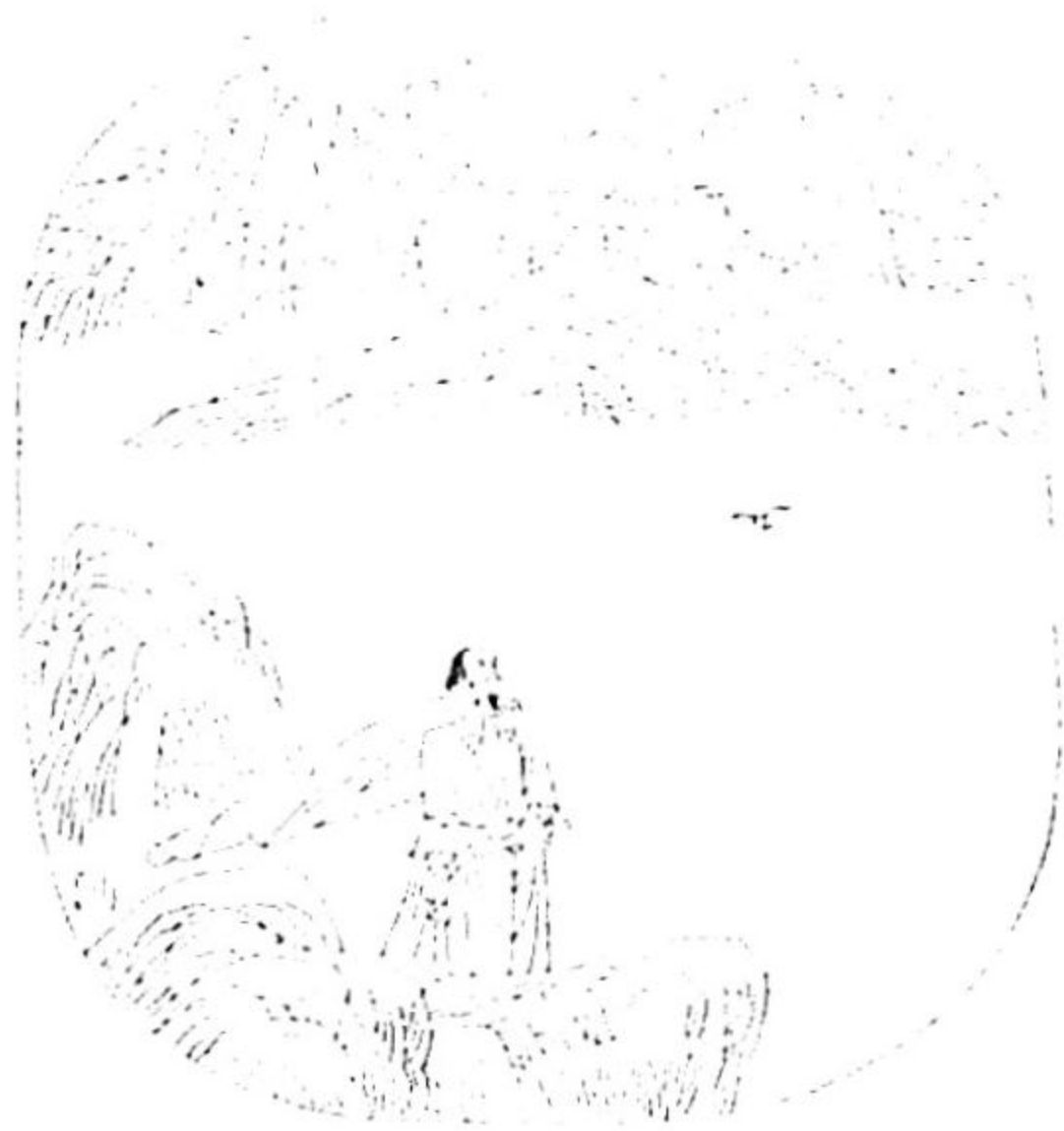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吴兆骞出京，五月至沈阳，七月抵达宁古塔戍所。宁古塔的生活异常艰辛，冰天雪地、饥寒交迫。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江南，一个富裕家庭里走出来的吴兆骞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考验。吴兆骞终日以粗粮为食，寒冷的冬天，还要亲自拿斧头敲凿冰块来取水。到了康熙二年（1663），吴兆骞的妻子葛氏来到宁古塔戍所，生活上才略有改观。

生活的艰辛困顿还能克服与忍受，精神的孤寂与内心的苦闷，更使吴兆骞痛苦不已，只能够用诗句化解心中的忧伤。康熙四年（1665）吴兆骞与张绪彦、姚琢之、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钱德维等结成七子社，是黑龙江的第一个诗社。

吴兆骞在宁古塔曾开馆授徒，传播知识，还创作了大量爱国诗篇。康熙十二年（1673），吴兆骞得到宁古塔将军巴海器重，任其为书记官，并教授其子课业。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派侍臣祭长白山，他献了《长白山赋》数千句，文章带到北京，康熙叹息不已。

吴兆骞被流放后，作为朋友的顾贞观为了救助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他义愤难填，挥笔泼墨，写下那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

当时，顾贞观担任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的老师。纳兰性德虽出身华贵，却非纨绔子弟，且自幼聪明好学。纳兰性德在读顾贞观写给吴兆骞的《金缕曲》深受感动，也和了一首《金缕曲》送给顾贞观，以表明自己营救吴兆骞当义不容辞。后经多方运作此事，并与徐乾学等人出资救赎，终于使得吴兆骞五十一岁那



◎ 吴兆骞宁古塔诗名远扬

年离开宁古塔，得以重返家园。

吴兆骞在宁古塔流放了 23 年，终于生还。到北京后他一直住在徐乾学家里，后来成为纳兰性德弟弟的老师。不久返回苏州故里，并在童年好友汪钝的资助下，筑屋三间。自己命名为“归来草堂”。然而长期的严寒生活，吴兆骞已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竟然大病数月。康熙二十二年（1683），吴兆骞复去京师，一年后在贫困潦倒中逝于京师旅邸，纳兰性德为他料理了后事。

吴兆骞流放宁古塔 23 年，被称为“边塞诗人”，一生著有诗集《秋笳集》8 卷、《归来草堂尺牋》1 卷以及与友人合编的《名家绝句钞》6 卷。

（参考资料：徐钊《孝廉吴君兆骞墓铭》、未央歌《绝塞生还吴季子》、李兴盛《边塞诗人吴兆骞》、《黑龙江第一个诗社》、《江震人物备考》、高亢《吴兆骞年谱》、《碑传集》）

徐 鉞 徐灵胎

徐鉞（1636—1709），字电发，号虹亭，一号拙存，晚号松风老人，又号枫江渔父、菊庄老人。吴江北厍西濛港人，迁居吴江县城松陵镇。父亲徐韞奇，原名允美，字季华，博学多闻，贯通经史。徐鉞十三岁时就和无题诗，十四五岁时，跟随父亲到南州草堂见计东，后来成了计东的大弟子。当时他加入“慎交社”，展露了才华。

徐鉞少年成名，但是科举考试却屡屡失意，于是就到各地游历，广交朋友。康熙六年（1667）五月，父亲去世，第二年，他的好友程康庄上任



◎ 徐鉞像

芜湖郡司马，就招他入署。徐鉞在芜湖，与程康庄二人在公事之余，以诗词酬唱，相得甚欢。康熙十一年，计东在京师写信给徐鉞，招他进京。这年夏天，徐鉞抵达京师，进入官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

徐鉞善画山水，曾作《移居图》卷和《闽中溪山图》卷、《仿黄鹤山樵山水》册页图等，还在康熙十四年（1675）请当时著名的画师谢彬为他作《枫江渔父图》。在京师任职期间，徐鉞就携带这画与当世文人索题，有九十多人题词和韵，得古文诗词曲一百三十五首，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盛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徐鉞因病回到吴江，二十五年（1686）还署。未及一月，遇到翰林院的官员转任外省同级官职，徐鉞因忤逆权贵在被黜之列。他本来不能在官场如鱼得水，二十六年（1687）就干脆乞求归乡。

五月份回到吴江，在盛泽南州草堂左侧扫除一室为读书之所，为其命名曰“松风书屋”。一方面闭门读书，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作豫章闽越之游。著述不辍，篇章日益，有《昌亭草》、《皖江草》、《齐鲁游草》、《西陵草》等。

徐鉉的词不仅得到当时文坛名流的高度评价，而且还流传到国外，引起轰动。他所刻《菊庄词》为朝鲜贡使仇元吉用金饼购去。晚年著的《本事诗》远地购求，洛阳纸贵。

康熙十二年（1673）徐鉉开始写作《词苑丛谈》，此书收录历代词人故实及词作评论，是词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二十一日，徐鉉卒。

徐鉉长子徐养浩（1663—1719），好读书。兼明水利，力行功过格，每日所言所行必书之。著有《水利考》，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徐鉉的孙子、徐养浩的儿子徐灵胎（1693—1771）名大椿，更名大业，字灵胎，是清医学者。当时松陵镇北门外有徐灵胎所居的洄溪草堂。他初学时文，后读《周易》、《道德》、《阴符》等，有机会就旁搜天文、地理、音律、技击之术，精益求精，得到了要领。

徐灵胎虽然早年也爱看医书，但仅仅是博览。中年的时候。他的三弟患病，父亲请遍了当地的名医，他在旁边听医生讲述，看他们配置药物，从中了解了一些医学的知识。三弟的病没有治好，他的四弟、五弟也都因病医治无效而相继去世，父亲兄弟无奈、悲恨的神态，激发了徐灵胎开始发愤学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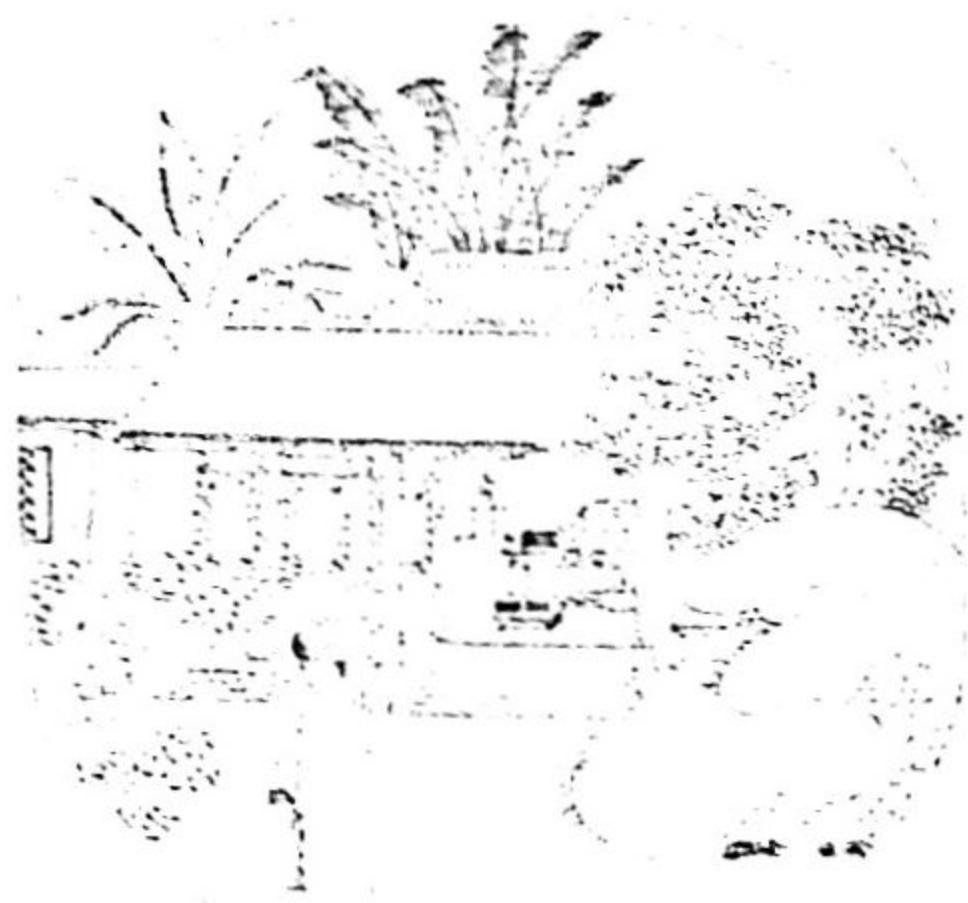
徐灵胎把家藏的几十种医书全部拿出来，日夜攻读，反复钻研，广求博采，他阅读了从《内经》到明清的几万卷医书。

徐灵胎朝夕钻研，废寝忘食，终于医业一天天变得清纯，四方求诊者纷至沓来，门庭若市。有一个病妇患关节炎，两腿像被针刺一样十分痛苦，这种病当时没有现存的治疗方案，他反复思考后，叫人把病妇用厚褥单裹起来，叫强健的妇人抱住，使病妇颠扑号叫，让病人流出大汗，然后再让病妇躺着，用手推拿，使她血液循环流畅，几次治疗，并没有用药，病妇的病就好转了。有一次他去东山访友途中，遇一人拦道呼救：“家人病死已三日，将入棺，忽见口唇微动，闻先生有起死还生之术，恳请救之。”灵胎诊脉毕，以为淤血冲心，厥后不返，配了黑神散两粒用冷水化了灌进病人口中，不一会病人就醒了。



◎ 徐灵胎像

乾隆二十五年，清朝文华殿大学士蒋溥患重病，皇上诏访天下名医，刑部尚书秦惠田首先推荐徐灵胎进京。他给蒋溥一把脉，就说：“病已经晚了，无法医治，过立夏七日就不行了。”到了第七天，蒋溥果然病逝。乾隆皇帝要留下他在太医院任职，徐灵胎婉言谢绝，医毕仍回家乡。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帝再次诏他进京，当时他七十九岁，正患病在床，但皇命难违。他自知归期不远，就在带病抵达京都时，自拟墓联一副：“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到了京城三天后，



◎ 徐灵胎发愤学医

他白天还从容议论阴阳生死出入之理，半夜却谈笑而逝，皇上勅赠儒林郎，赐银百两归葬。第二年十月葬于吴县越来溪之牒字圩，后迁葬于吴江县八坼大墩字圩，今吴江县八坼乡凌益村。

徐灵胎积数十年的医学经验，将古今学说融会贯通，知识渊博，思路独创，写下了许多著名医作，有《难经经释》、《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医贯砭》、《医学源流论》、《慎疾刍言》等医书七种。另有医学评注两种和《洄溪医案》一种。徐灵胎又工文辞，对声律也具神解，著《乐府传声》一书。他还著有《洄溪道情》，在道情的理论与创作上都有建树。他所著《道德经注释》和《阴符经注释》采入《四库全书》。

（资料来源：彭启丰《儒林郎徐君大业墓志铭》、《清史稿》、徐慧丽《清初诗人徐钊研究》、吴文治《略论徐钊的〈词苑丛谈〉》、徐伯春《江苏古代科学家》、费原子《清代名医徐灵胎》、徐慎庠《徐灵胎医论述评》、《江震人物续志》、《碑传集》）

潘耒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又字稼堂，晚号止止居士，吴江人，潘恂章同父异母的弟弟。潘耒六岁丧父，幼年靠潘恂章生活，自小过目成诵，自幼秉性聪明，记忆力强。

清康熙二年（1663），清大兴“文字狱”，哥哥潘恂章因南浔“明史案”遇难，嫂嫂连累充军发配黑龙江。当时他嫂嫂正怀孕，潘耒才十七岁，就随同嫂嫂一起远行千里到了黑龙江，备受磨难。她嫂嫂生了孩子后自刎殉节，潘耒护丧回乡。于是就隐姓埋名，他更名吴琦，字开奇，奉母避难灵岩山中。

顾炎武与潘恂章是患难之交，潘恂章遇难，他将失去恂章的悲痛，转化为对亡友胞弟的深切关怀，尽力为潘耒提供帮助，顾炎武将自己的多位朋友介绍给潘耒。潘耒决定奋志读书，对顾炎武的思想学说十分敬重钦佩，就跟着他游学，顾炎武破例收下这唯一的弟子。从此，潘耒受到顾炎武兄长般的关怀，顾炎武外出游历常将他带在身边，让他大开眼界，学识频增。

清康熙十八年（1679），潘耒以布衣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主纂《食货志》兼订纪传。不久，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纂修《实录》、《圣训》，又任会试考官。

潘耒本性聪明，才华出众，得康熙赞赏。康熙二十三年，因名盛众忌，终以“浮躁”降职回吴江，居平望烂溪，室名遂初堂。

南归后，潘耒在接受顾炎武思想之时，学业又进。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潘耒又作为随员，不离左右。当年，康熙曾御书赵孟頫《鱼乐楼》诗赐潘耒，并赐他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他进京做官，但他坚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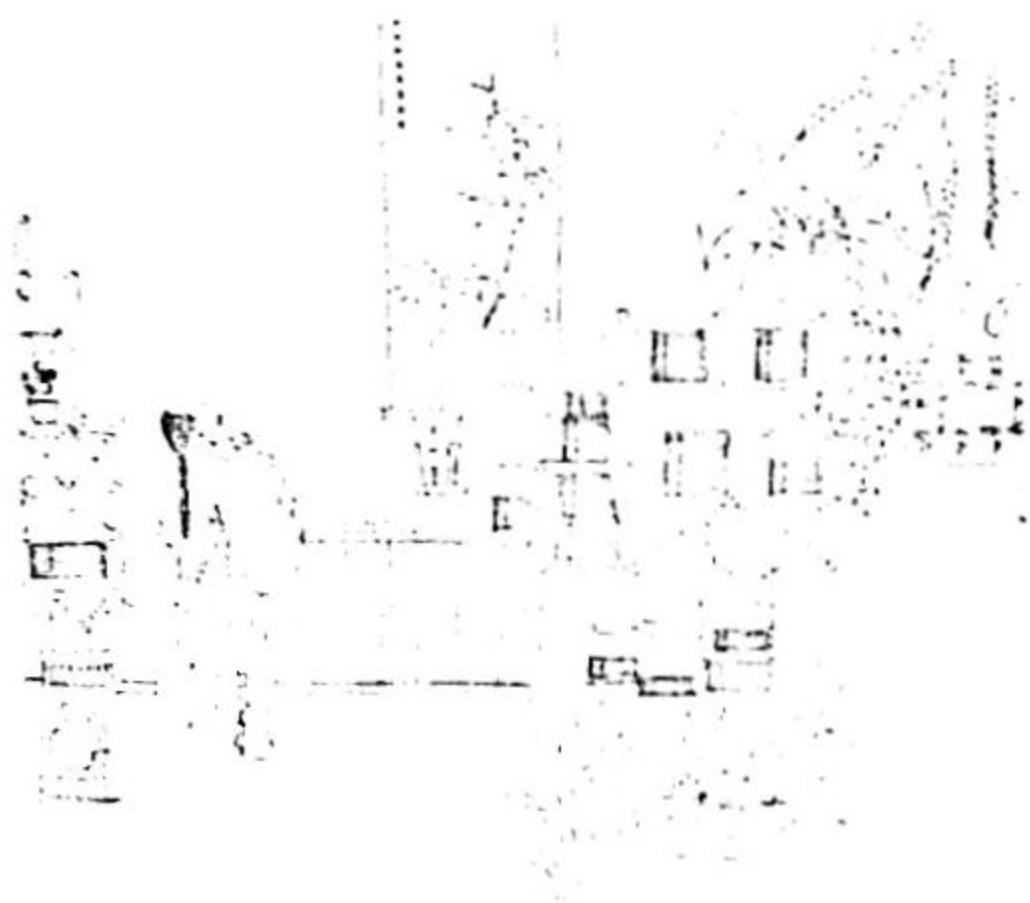


◎ 潘耒像

不受。顾炎武逝世后，《日知录》部分手稿在顾氏家族手中。潘耒时时想到先生的遗愿。为宣传先生的学识思想，使《日知录》全稿问世，他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初刻本30卷和其他全部手稿，反复研读，再三校勘，并缮写成本，写了序言。此书虽成于顾炎武谢世13年后，但其精辟的思想理论和通达的文化史观，在国内引起了轰动，研究、评说不绝于世。

潘耒隐居家乡，潜心学问，提出了“俗儒”要向“通俗”转变的观点，并批判了科举取士误导人才的时弊。他认为科举制度使学风浮泛，无用之学流行于世，提出“得浮华之士百，不如得实学之士一”。他的人才思想在中国古代人才发展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他也知历法。嘉兴人张雍敬，字简庵，刻苦学问，文笔矫然，特潜心于历术，久而有得，著《定历玉衡》时曾将文稿给潘耒看，潘耒告诉他历术之学十分深奥，不可专执己见，言下之意是指张所主的传统天文学已经过时，应该学习明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建议他去走访梅文鼎。张雍敬后来著《宣城游学记》一书，潘耒曾为他作序。



◎ 潘耒刻印《日知录》

潘耒一向以描述山水而傲视自恃，但面对《徐霞客游记》却自叹弗如了，他就为《徐霞客游记》作序。为《徐霞客游记》作序的人很多，只有潘耒写的序与整理出版游记无关，主要是写他对游记的评价并发表他对旅游的看法。梁启超将这序推荐给丁文江，丁文江读后认为“惟独吴江潘次耕的序言是深得先生求知之旨，乃真能知先生者”。所以在出版丁版《徐霞客游记》时放在第一篇。

潘耒康熙四十七年（1708）去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后人评价，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潘耒为最著。

（资料来源：《平望志》、《江苏人才思想史》、《日知录》、《清史稿》、陈去病《五石脂》、赖玉芹《试论潘耒对顾炎武学术的师承》、黄明泉《潘耒与〈徐霞客游记〉》、《碑传集》）

沈 彤

沈彤（1688—1752），字冠云，号果堂，吴江松陵人。家庭比较贫困。沈彤从小努力学习，树立志向。苏州人何焯，曾在皇八子府陪侍皇八子授书讲学，同时兼武英殿纂修官，学问很大。沈彤二十岁左右开始跟他学理学，读了许多书，后来愤意五业，著了《群经小疏》若干卷。

沈彤是县学生出身，中年时曾两次到京师，一次预礼馆编纂，一次举博学鸿词科。雍正间到京师，方苞见了他所疏三经，说他得圣人精奥，读了他的文章，又说气格直似韩非子。乾隆初元，他辑《三礼义疏》，既得师友之助，又沉酣典籍，为文深厚古质，被推荐入礼馆，名动京城。

沈彤为人，开始接触感到凝然以静，与他相处久了就感到温然以和，而且可觉察到他的学问渊然以深。在京师，他不注重与达官贵人交往，只与几位德高的老儒来往探讨学问。召试博学宏词，栖迟书局，因刚直不随流俗而未能录用。

沈彤生平诚朴宽厚，事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沈彤是长子，有两个弟弟，他还承担了抚育弟弟的责任，辛劳操持。父亲年老，沈彤告假回乡，然还没赶到，父亲已去世。沈彤哀号五天五夜，在守孝的三年中，不茹荤，不内寝，哀麻哭泣，比照古代丧礼细微详尽。这种丧礼已经废了很久，有几十年没见了，乡里人对他称赞佩服，说能像他这样克尽古制的人很少，被誉为乡邦的楷模。

沈彤喜游历好山好水，曾经客居南阳、经过泰安登泰山观日出，到桐



◎ 沈彤像

柏探淮河之源，过望诸上黄金台。在京师时经常骑着跛蹇弩弱的驴子纵情游览西山，炎暑的时候，总是租赁简陋的小车到西苑观荷花。

沈彤晚年居吴江家园教书，生徒日益增多，更加以礼法自持，家虽贫困但乐于布施，他当老师，把学生与教师初见面时奉赠的礼物全部给亲族之中需要的人。

沈彤在教书的同时专于著述，他长于经学，晚年尤精“三礼”。何焯的学术能继承的优秀弟子有陈季方、陈少章，而沈彤是后起之秀，他的论文可与二陈相当，而他极力钻研经籍是二陈所不能及的。他以六经为根柢，唐宋大家为准则，毕生夜以继日，专精殚思，追求自己独特的思维，成一家言。有《果堂集》十二卷，《周官禄田考》三卷，《仪礼小疏》一卷及《春秋左氏传小疏》等，并传于世。《果堂集》多订正经学文字，清代学者沈德潜对这本书很推崇。近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写道：“而乾、嘉、道朴学家集，除戴、段诸家刻本多而易得外，若程瑶田《通艺录》、沈彤《果堂集》……盛大士《蕴悛阁集》诸书，皆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

沈彤兼通医学，有《气穴考略》等。他著有《释骨》为释《内经》骨名、位置、联系的佳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日本丹波元简《素问识》多引《释骨》以为最精辟之诠释。

沈彤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朝，一生执著于考据研究和方志编纂，著作等身，并且许多著作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他的《果堂集》一书，总共十二卷，多是对古代经学的考订，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等篇都能引经据典加以考证，可谓严密至极。乾隆年间，吴江分为吴江、震泽两县，《吴江县志》自从叶燮纂定后，六十多年没有人修辑。沈彤应知县之聘修志，条目详细分析，考据详实明了，三年成书，人称“定本”。他还荐修《一统志》、《三礼书》，书成，授九品官不就，以诸生终。

沈彤与吴县人陈黄中两人先后都是出自吴

人勺山翁好古而善聚自商周彝器下至近代石刻間世
有精善可喜者必羅而致之以貯是樓翁又善考據築與
當時賢者游故辨證尤確旭樓先生善繪先志既老慮羣
從之析者散而不可復徵也先人之學識淫而未彰也則
取造目次第之而辨證附焉有所見則亦條繫之焉天下
之物其好之也雖至其窳之也誠力苟其得之自我雖舉
而稍之可也既已受諸人矣冠履之敬猶將藏焉其勢不
可以失守於此而無失其力有難者矣不賢而能之乎
張廷濟序

氏尚书房，两人在京都的邸舍时朝夕相处，在文章与德行上相互勉励，感情深厚，亲密无间，每次有著作，必定互相交流，商量讨论。沈彤在去世前几天为同族的人写墓志，写完后寄给陈黄中请他下定论，陈黄中为他改了数语，并且举欧阳修称许尹洙者，称其简而有法。书信在桌上还没有寄出，就听到了沈彤去世的噩耗，痛惜不能相见，于是就以诗当哭，其中有“论高疑近拙，志大本非迂”的句子，对沈彤了解的人都说很符合事实。

沈彤去世后，私谥“文孝先生”。他的《吴江县志》被称为善本，连同《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果堂集》均被录入《四库全书》；《尚书小疏》、《释骨》也被存目于《四库全书》。

（资料来源：惠栋《沈君彤墓志铭》、陈黄中《沈徵君传》、沈廷芳《徵士文孝沈先生墓志铭》、《清史列传》、《吴江县志》、《江震人物续志》、钱超尘《沈彤释骨研究》）

陆 燿

陆燿（1723—1785），字青来，号朗夫，吴江芦墟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父亲陆瓚，字虔实，擅长书法，精于汉隶。家境贫寒，陆燿从小遵循父亲教诲，有志于学，以古代君子自我激励。

陆燿学业优秀，品格端正，精析理义，详细地研究前人的言行、政绩，所以事理通达，没有被错综复杂的事难倒过。他处世淡泊，处世谨慎笃实，辨析裁断义利也是如此。相传他与纪晓岚曾一起在董邦达家求学，两人是要好的同学。纪晓岚看重陆燿的人品，曾经说陆燿以清操劲节为当代所称赞。



◎ 陆燿像

乾隆三十九年（1774），陆燿在任运河道时，山东省寿张有逆匪结伙为盗，离济宁州只有二百里，这里的百姓原本环境太平，如今因惊慌害怕而人心惶惶。陆燿就下令所有官员的住所不能远离本地，用来解除百姓的疑惑。当时城外的百姓都争着进城，有人提议要关闭城门。陆燿说：“盗贼未到，为什么要关闭城以显怯懦呢？并且拒绝百姓入城让他们四处逃逸，被盗贼害了或者胁迫作为诱饵怎么办呢？”于是城门洞开，他亲自坐在中间稽查百姓进城的情况，民心大安。

芦墟镇上有陆燿的住宅，里面挂着乾隆皇帝御笔竖题的“龙章珑赐”匾额，当时匾额两旁有一副对联：“修身治国无双士，教学传家第一人。”相传乾隆四十五年，皇帝南巡路过吴江，想到正在家奔丧的陆燿，就微服私访陆燿，见到陆燿，就问他有多少家产，陆燿回答：“九当十三车。”乾隆大惑不解，陆燿从门后拿出九张当票给乾隆，接着又指给乾隆看的是十三部旧纺纱摇车，乾隆感叹不已，回到京城就赐了他御书匾额。

陆燿为官清廉，并经常告诫部下守律，曾手书“廉政官箴”三则：一不受贿，二不贪污，三要“上下一心，各矢廉洁”。他一直把母亲缝的棉袄带在身边，时时拿出来看看，想想母亲的艰辛。他离开山东赴任湖南时，行李仅被褥和两只衣箱，且箱中大半是书籍。后来吴江任知县的唐仲冕当年就在山东任职，此事给他印象极深，多少年后还一直提起，以此自勉。陆燿在长沙任上曾有诗两句：“能开衡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可算是他的箴言。而“利，莫大于阜民之财；害，莫深于夺民之食”的格言，于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陆燿任湖南巡抚，刚去上任时，有盐商进白金三万两，问怎么回事，对方说：“这是旧规矩，先进献这点金子，以后当按时继进。”陆燿不受，并且说以后也不要再进。商人说：“大人不受，那么这些金子就没地方归属了。”陆燿就下令将这点钱平盐价，市场的盐价就低了下来。据史书记载，有年湖南大旱，湖广总督钮祜禄路经长沙亲抵衙门，陆燿招待尽是蔬肴，并说，“这里很长时间不下雨了，祷雨戒屠宰，因此已好长时间不吃荤腥了。”总督深深为陆燿虔诚求雨解民于倒悬之心感叹。

在湖南任上时，陆燿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佐杂人员壅积贫窘，请停止分发。湖南盐务有助公陋规，他到了就严厉禁行。当时遇上盐价特别的贵，就勒减其半。社仓捐谷还有没捐的六万二千余石，他计算储积的谷已充足，

就请停止催收。此外，他创葺书院、加惠生徒、刊印前贤的遗集、钞本朝的名文等等。

陆燿身体力行，洁身自律，持节不变。按先例，巡抚每年判决诉讼的案件，有轻罪重判或不当判刑而判刑的，中央各部的长官根据轻重论议定罪，有重罪轻判或应判刑而未判刑的，中央各部的长官议定其罪给予处罚。遇到朝内大官讨论重罪轻判或应判刑而未判刑的给予处罚，让巡抚自议当罚多少，陆燿都小心谨慎



◎ 陆燿洁身自律像

地做事，没有半点马虎。

陆燿持性善论，主张穷理尽性。交游者有沈彤、王元启、戴震、程晋芳、赵佑、胡祥麟等。还创立了“朗夫学派”，此派不立讲学之名，而研析义理，读书一归于实用，不作空谈。陆燿所选古文和著的书，都是百姓有用的，诗也和平雅正，传授的都是有德之言。

乾隆五十年（1785），湖南复旱，陆燿与当地官民一起抗旱救灾。六月，因带病在酷暑中求神降雨，劳累过度而歿，遗物只有几箱破衣。好朋友徐坚到他府中奔丧，一看这个情况，叹息道，“一贫至此，即使不死亦难度日子。”乾隆皇帝知其忠廉，朱批“可惜”赐祭。著有《济南信讫》、《任城漫录》、《甘薯录》、《大学合钞》、《切问斋集》、《扣槃集》等。陆燿又工诗文，兼长书画。水墨山水，磊磊有在家风。

（资料来源：冯浩《湖南巡抚陆君燿墓志铭》、《清史稿》、《清史列传》、《松陵文献》、《江苏清官》、《吴江县续志》、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江震人物续志》）

郭 麐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晚号蘧庵学人，又号复翁，因右眉莹白如雪，举止不凡，又号白眉生。吴江芦墟人。

郭麐从小就表现出超人的禀性、卓越的才情，很小的时候，郭麐就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读书，《古诗十九首》每首都抄录过，他在诗词方面悟性很高，七岁时已烂熟于心。九岁学作文，每天晚上在灯下学五经文，读鲍照、谢灵运等名家的文章，父亲对他很严格，学习不足规定，为诗文有谬误，就要叫他下跪，有时不许进门，一天不让吃饭。在父亲的严教下，郭麐年幼时就通读百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七岁补诸生，当时人称他为神童。

郭麐青少年时代有五位好友，徐涛、朱春生、潘眉、吴鷗、顾虬。他们一起读书求文，经常共同诗词唱和、游历玩耍，谈理想人生。

乾隆五十一年（1786），郭麐的父亲去世，家庭陷入绝境。郭麐一边求学，一边要养家。二十一岁时他离开延令书院，游学各地。

乾隆六十年（1795），郭麐又赶赴京城准备乡试。他在京城半年，又结交了一些名士，如法式善、赵味辛、张问陶、何砚龙等。这些人对郭麐的诗很看重，一时名声大振，但考试却名落孙山。他回到家乡，绝意科举，沉浸于诗文，往来于吴越之间。

嘉庆十年冬，他重游扬州，参与了销寒六会。这些年，他虽然贫困潦倒，但是精神生活很充实，他工于诗、妙于书、精于画、又精研金石之学，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郭麐对诗有很深的研究，初学唐代诗人李贺、沈亚之，后来转为北宋



◎ 郭麐像

诗人苏轼和黄庭坚。他认为，诗的风格各人不同，与各人的性情接近，如果一味照着古人的风格，恐怕诗体不能依照古人，诗句不能如古人那么工整，怎样能与自己的性情相匹配呢？郭麐博采众长，从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都沿流讨源，吸取精华，他的古文融会总体，自树风格，不屑拘守古人之说，写文章含义深远、内容渊博、文辞美妙、情深文明。写的词都自然书写，不讲究华丽，但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平易中见清晰，视角敏锐、创意独特，辞随意行，委婉传神，文风清淡而又不单薄，有一种内在的绮丽美。《明词综》作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价：“揽其词旨，哀怨为宗；玩厥风华，清新是尚。”

郭麐负其才识，但不能如意发挥，将所有积蓄化为愤郁无聊。他性情通爽豪俊，并且喜好饮酒，经常寓于咏歌酣醉，酣嬉淋漓的时候，时常透露出兀傲不平的气质。他的书法仿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秀俊超逸，间作篆隶，也古雅绝伦。醉后画石别有情趣，也称一绝。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画了《分湖水村图》，成为国宝级的文物，这幅画还催生了一个“水村图系列”，郭麐画了《水村第四图》。郭麐曾藏有河东君小像一幅，是吴江闺秀陆澹容所描。长不满尺，而眉目意致，生动自然，成一时之宝。

嘉庆二十年（1815），浙江钱塘人陈鸿寿任溧阳县令时，名流麇至，他聘郭麐进幕府，在那里郭麐与钱杜、汪鸿、毕简时常文酒画会。陈鸿寿在溧阳任职3年，督制的壶不下千百把。壶四周多铭刻文字，铭文除他自作



◎ 郭麐书法作品



◎ 郭麐专诣诗文

外，很多出于郭麐及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之手。

郭麐乃一代名士，他被姚鼐、袁枚等视为知己。他又很推崇有才学的人，吴江汪玉珍是袁枚弟子，其家境贫困，靠诗文为生，她的诗也很少为人所知。郭麐见了汪玉珍《题郭频伽水村第四图》中有“万梅花拥一柴门”句，惊喜异常，请画师奚铁生绘“万梅花拥一柴门”图，并请名士题咏，于是汪玉珍的诗名才为世人所知。

晚年，郭麐侨居嘉善以终。著有《灵芬馆诗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集》十二卷，《续集》八卷，《杂著》二卷，《杂著续编》四卷，《江行日记》一卷，《樗圃消夏录》三卷，《灵芬馆诗话》十二卷，《续诗话》六卷，及《衡梦词》、《浮眉楼词》、《忏余绮语》各二卷等，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资料来源：《清史列传》、《清史稿》、《江震人物续志》、《吴江县续志》、陈去病《五石脂》、芦墟镇《四围春水一芦墟》、黄丽琴《郭麐研究》、鹿苗苗、谢德胜《清代郭麐与姚鼐、袁枚交游及早期文学思想形成考论》）

杨龙石

杨龙石（1781—1855）名澹，字竹堂（一作琢堂），吴江松陵人，父亲杨刚。

杨龙石，原名海，一度入文字狱。出狱后更名为“澹”，暗喻曾囚于官廨冤狱中。他从小就喜欢弄石，并感到龙是最自由最威武的神灵，于是就号“龙石”。后因耳聋，又号聋石，晚号枯肠子等。杨龙石居住在吴江小东门内富家桥一号，原有亭台楼阁，是一园林住宅，他在吴江园中水池旁栽竹一丛。他便号“竹塘”“竹堂”以自戒。他一生布衣，没有求取功名，因而以“吴江野老”“野航”“野航客”“野航子”“野航逸民”为号。他终日刻印、刻砚、刻碑、弄石、玩石、刻石，终生与石头打交道，还编过《汉四皓石刻题跋集录附题跋集录》一卷。所以又号“石公”、“石公山人”。他在吴江时，与当地文人交往，互帮互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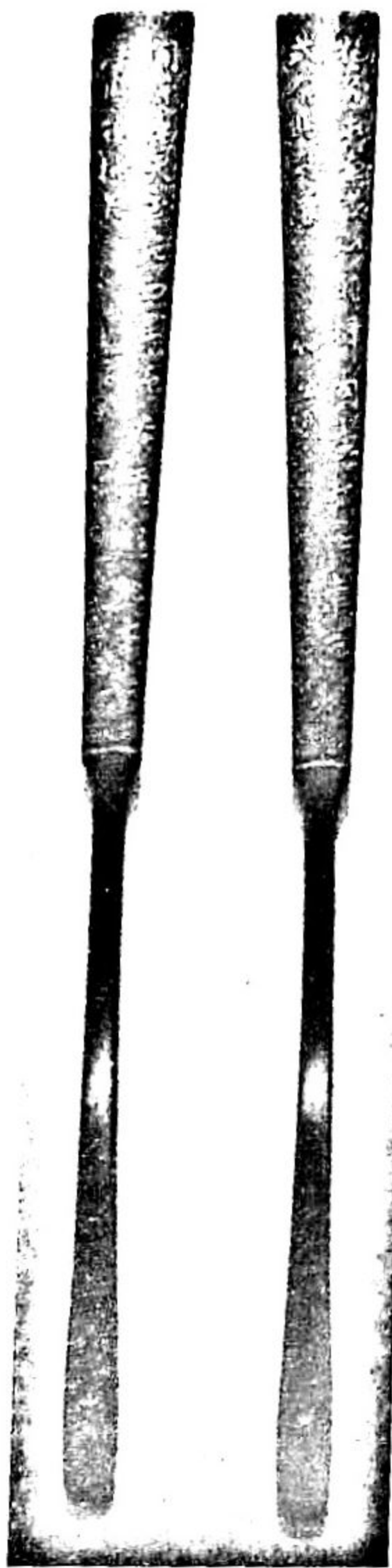


◎ 杨龙石像

杨龙石为人奇癖，喜好龟已近痴迷。经常把龟放入袖中，有一次曾得一大龟甲，他自己在上面刻了铭词，每天坐卧其中，作为平生的安乐窝，别人窃笑，他也全然不顾。

杨龙石的书法仿三国吴刻《天发神讖碑》，刻印如明篆刻家汪关。汪关，字尹子，家住太仓，原名东阳，对汉印情有独钟，以冲刀法开创了刀刻新格局。同时倚靠古堂谱中的诸多作品，不断创新。

杨龙石的篆刻，传承文彭和顾苓“吴门派”的风格。这两人都是苏州人。文彭是苏州文徵明的长子，明代篆刻家、书画家。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国子先生，他在篆刻艺术上开宗立派，成为文人篆刻的开山祖师，影响深远。顾苓，字美云，号浊斋居士，他的篆刻在清初首屈一指，风格



◎ 杨龙石扇骨竹刻作品

秀劲古拙，后人称他为“塔影园派”。

杨龙石雕刻的扇骨以金石文字取胜。他刻竹致精，在扇骨上摹刻金石文字，自顶至梢刻满箨边。刻仕女和人物小像，画像脸上的毫发都能刻上，栩栩如生。不论阴刻阳刻，底都深刻。古色古香，让人爱不释手，时人争相收藏。杨龙石还精于刻砚。曾在三块砚板上缩摹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字字与真迹无异。他在道光五年（1825）刻了一颗“一壶千金”印，是他的代表作。他刻的印不论朱白都是动静相得、刚柔相济，得到苏州文人的爱好和推重，嘉庆、道光年间他在苏州众多篆刻家中独占鳌头，《墨林今话》上评他“江南第一手”，开创了“松陵印派”。历史上杨龙石与李流芳、归昌世、赵宦光等人体现了吴门篆刻的源远流长。

杨龙石原住吴江城内，中年迁苏州，住在松鹤板场，以卖印和兼刻竹、碑为生。在苏州，他经常与当地文人相聚。当时，名家瞿中溶、钱泳居住苏州。瞿中溶，字镜涛，一字木夫，嘉定人，生平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能，亦擅篆刻，以刻印手法刻竹，另有风格。钱泳，原名钱鹤，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无锡人，工诗词、篆、隶，精镌碑版，善于书画，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道光年间，他们两人都在苏州，瞿中溶住都亭桥畔，钱泳在城内开设碑帖店，杨龙石与他两人经常会晤。杨龙石研究金石考据之学，著有《汉四皓石刻考》一册，里面有瞿中溶、钱泳的跋。湖南道州人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

他是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晚年寓苏州，与杨龙石为至交，杨龙石藏有南朝梁陈弘景书的《瘞鹤铭》木拓本，何绍基为他题记。

杨龙石作诗有奇妙的情趣。盛泽王楠家有珍贵的钱币“五铢泉范”，长三寸八分，阔二寸四分，杨龙石曾作《题五铢泉范景本》诗：“千泉万泉作虏守，何如一范宝其母。阴阳对列分布置，凿枘吻合辨枢纽。话雨楼中数金石，商爵兄与汉碑友。主人保此富寿康，子母长生永不朽。”杨龙石无子，将侄

子杨庆麟为嗣子，在他和杨庆麟的遗印上可见到他的三首诗，其中一首长歌，是他七十二岁时作。他儿子刻在“振甫画印”白文印上，最后四句为：“时史虽众何足数，士夫不与匠辈行。可惜世鲜明眼人，愿子自爱善刀藏。”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杨龙石六十四岁时患半身不遂之疾，去世年份不详。在黄瀛淑辑《先辈野航子镌印》中有“羨门”“渭甫”两颗朱文印，边款刻出“癸丑夏日七十三老人龙石作”，这年为咸丰三年（1853）。邵松年辑《龙石公印存》中有一颗杨龙石自刻的“七十五老者”白文印，推断他至少活到七十五岁，也就是1855年以后。

（资料来源：《盛湖志》、《吴江县续志》、《垂虹识小录》、矫毅《吴江野老杨龙石》、汝悦来《吴江印人丛录》）

殷兆镛

殷兆镛（1806—1883），字补金，一字序伯，号谱径，晚号硃（石己）老人，梦盦老人。吴江平望人。父殷增，字曜庭，号东溪，例贡生，作诗情韵悠长，吴江诗人都赞他。他是上海滩女明星殷明珠的曾祖父。殷氏家族祖居河南陈州（今淮阳），后迁江苏。嘉庆十一年（1806），殷兆镛生于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镇东溪湖村。

道光二十年（1840）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同治七年（1868）授礼部侍郎，并先后任兵、工、户、吏部侍郎。作为清廷四朝元老，殷兆镛不但是位政治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著有《松陵诗经》、《玉尺堂诗文集》等传世。

殷兆镛性格耿直，坚决抵抗列强侵略。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进犯天津，他积极上奏，力主抗战，在皇上和诸位大臣都犹豫不决时，他慷慨陈词，当面痛斥他们的胆怯和懦弱。次年，殷兆镛任兵部侍郎，召集各省组织团练，联合抗击英军。在中华大地被列强践踏的乱世，殷兆镛的奔走努力，无异于一支强心针，警醒了国人，振奋了民族精神。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圆明园，不少大臣主张议和，而殷兆镛抗疏数千言。虽然他的上疏未被朝廷采纳，但他的上疏被人传诵，而且传到了国外。英国国王钦佩他的才志，曾令在上海的英军头目到吴江查询。光绪五年（1879），日本国使臣竹添进一来到中国，写信给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想拜谒殷尚书、张太史，这殷尚书其实就是侍郎殷兆镛。他编了《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对京西名园及活动作了记述，尤其是描述了英法联军入京后焚掠园林的情况，内容翔实。这些园林变迁的细节，不但揭示了侵



◎ 殷兆镛像

略者的斑斑罪行，也让后世之人永远记住了历史和国耻。殷兆镛任大理寺少卿时，不畏权势，弹劾将军奕山丧失黑龙江以北国土的行径，奕山因此被革职留任。

虽然先后任兵、工、户、吏等部侍郎，但殷兆镛始终未能成为尚书。然而他一生侍奉过四代帝君，在大清王朝走向没落的年代，清廷一片混乱之际，他始终保持着中庸和儒雅，坚持原则，本分尽职。在列强蚕食中华大地，百姓生灵涂炭，陷于水火之际，他挺着铮铮铁骨，拯救河山，为国尽忠，写有“高风肃瞻拜，忠孝一遗民”，“草堂怀旧迹，杜宇吊吟魂”的诗句。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水木清华轩外的抱柱上，悬挂着殷兆镛书写的一副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皆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它深化了园林人文意境，更为秀美的庭园增色不少，已成为清华校园内的一处名景。除在清华园留下墨宝外，不少西郊园林也有他的足迹。

光绪七年（1881），殷兆镛辞官，带着一身病患，归隐姑苏。光绪九年（1883），殷兆镛病逝。在今天苏州城内的萧家巷，仍然保留着殷兆镛的玉尺堂，存有一部传世的《玉尺堂诗文集》，留给后人凭吊。

殷兆镛一生勤奋办事，殷兆镛立朝四十年，清操自励，著有《齐庄中正堂诗文集》、《殷谱经侍郎自定年谱》、《齐庄中正堂日记》、《松陵诗征》、《玉尺堂诗文集》、《澄怀园日记》、《江震殷氏族谱》等。《清史稿》评论：“陶樾为文学老宿，吴存义、殷兆镛并侍从清望，存义视学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慷慨论事，于乡邦疾苦冀有补苴，何言之深也！”

（资料来源：据《清史稿》、《光禄大夫、礼部侍郎殷公墓志铭》、《平望志》、黄兆桎《平望续志》、殷恭毅主编《吴江殷氏平望东溪河支系谱》、《清华风景——水木清华》、刘征《殷兆镛年谱与京西名园》）

月照青山松柏香
風生碧潤魚龍躍

蘇州府人元大人謹題

清廷殷兆镛

◎ 殷兆镛书法作品

沈桂芬

沈桂芬（1818—1881），字经笙，吴江同里人，寄籍顺天宛平（北京丰台）。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自顺治元年（1644）九月定都北京，八旗人马大量涌入，加之清廷强令盛京（今沈阳）附近农民全部移居北京，到同治三年（1864），北京已是人满为患，而且八旗子弟太多，且不农不商坐吃皇粮，以前骁勇善战的精神消退殆尽，养成了无事生非的恶习。沈桂芬上了“筹费迁屯”的奏折，他认为，移屯边疆有利于巩固边防，重振旗人的战斗力。沈桂芬的奏折正合皇上旨意，解决了朝廷的一大难题。四年正月以筹解甘肃军饷无差错，受到吏部表彰。



◎ 沈桂芬像

当时，国门已被打开，不准洋药进入的禁令有所松动，在鸦片的高额利益驱使下，民间种植已大有泛滥之势。种鸦片占去大片田地后，粮价一路攀升，社会更加动荡。发现这种情况后，沈桂芬就下死令禁种，取得了成效。四年二月，沈桂芬将实行的结果禀报朝廷。这件事很受两宫太后的赏识，通令各地督抚一律严禁。

沈桂芬针对山西省大同、太原两镇及省标两营，征调防堵均不得力的状况，着手进行整顿，裁弱募强，添置精兵，明定章程，委派文员会同营员分练合操。尤其对大同、杀虎口两处营伍进行了重点整顿。沈桂芬派遣营员按日检较训练。在练兵活动中，他采取奖惩的办法，每日应练各兵，人给练费三分，技艺娴熟者酌增，劣者革除。沈桂芬意图通过整军经武，达到朝廷有可用之师，以固边圉的目的。

光绪元年（1875），沈桂芬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宰相），二年担任

玉牒館總裁。三年五月任教習授庶吉士，九月任實錄館總裁，十月代表清朝與日斯巴尼亞使臣伊巴里訂立《古巴華工條約》，保護了華人僑胞的利益。四年二月，陝甘總督左宗棠克服新疆南路和闐（今和田），沈桂芬等參與策劃的人都得到吏部表彰。光緒二年武英殿大學士文祥去世，在朝中幫助恭親王拿主意的真宰相只有沈桂芬。沈桂芬主持外交，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做到了維護主權。

沈桂芬雖然位居首輔，但自奉儉素，家中生活如貧戶人家。位於東廠胡同的相府，也是借用兩廣總督瑞麟的漪園。門外狹窄，騎馬無法轉身。門庭冷落，沈桂芬安之若素。外任官赴任前都向他進行饋贈，他却從不接受。人稱“持躬清介，為同朝所無”。他乘了一輛黑驢車去上早朝，車剛到東華門，就被守門的太監呵止住，等到沈桂芬從車上慢慢下來，太監們大驚失色，趕緊賠罪不止。從此，他就得了個“驢車宰相”的雅號。

沈桂芬抱病主政長達六年，琉球一直是清政府名義上的藩屬國，日本政府為取得清政府對其吞并琉球的承認，於光緒五年（1879），派宍戶玘為駐華公使，就琉球問題與總理衙門展開交涉，第二年六月，談判重啟。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與戶玘會談。當時中俄關係因伊犁問題相當緊張，總理衙門恐日俄勾結，肋以謀我，欲早結琉案。沈桂芬也認為如與日本決裂開戰，勞師海上，易損國威，遂主張對日妥協。談判的結果，日本完全實現了既定的分島計劃，而清政府喪失利權。

這種結果自然引起清廷上下的不滿。清政府決定採用李鴻章的延宕之法，拒絕批准總理衙門與日本簽訂的琉球條約，此後，中日關於琉球的交涉也就不了了之了。此次琉案風波，再加上以前錯用崇



◎ 沈桂芬自奉儉素

廟堂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以養元氣為本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使羣黎百姓無腹诽之語則元氣固矣

庚辰七月上游為 馮國璋書 沈桂芬

休心八中論語一則

◎ 沈桂芬書法作品

厚一案，使沈桂芬精神上备受打击。他本已有病在身，经此冲创，病情遂越发严重。光绪六年十二月以病告假。

1881年除夕，积劳成疾的沈桂芬在家中溘然长逝。光绪帝闻讯后悲痛万分，特颁上谕：“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清慎忠勉，老成端恪，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虑，劳瘁不辞，加恩晋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寺。”追封太子太傅衔，谥号文定。

（资料来原：《清史稿》、张杰《晚清名相沈桂芬宦海事迹评述》、史谭《冯桂芬与沈桂芬》、震钧《天咫偶闻》、《明珠璀璨——同里历代名人选》）

张曜

张曜（1832—1891），字企青，号朗斋，浙江钱塘人，顺天大兴籍。父世桐，候选知州，侨寓汴梁。张曜幼年随亲人来吴江黎里蒯贺荪家投亲。蒯贺荪即蒯士芴，字则钦，号士芴，自幼聪颖过人，十九岁时在京城就已经小有名气。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恩科顺天举人，后官至直隶州知府。张曜为蒯贺荪的内侄，幼年随蒯贺荪来黎里读书，蒯贺荪离开黎里后，张曜便在镇上以做买卖为生。

咸丰三年（1853），蒯贺荪率军镇压捻军，正逢战事不利，蒯贺荪军队被困的时候，张曜前来投奔，并协助蒯贺荪与捻军作战，屡立奇功。蒯贺荪十分欣赏这位内侄的军事才能和危难时刻的舍身相助，就将族弟蒯善培的女儿蒯雪如嫁给了他，于咸丰四年在黎里完婚。蒯雪如相貌娟秀，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开始读书识字，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才女，且受父亲熏陶，很懂得官场之道。咸丰四年（1854）黎里完婚。次年，张曜在与捻军作战中，又立功，被升为总兵，后又升任河南布政使。

同治三年（1864），张曜来黎里新蒯家弄底居住，并将居所题名“退一步处”，有归乡退隐之意。本想在江南小镇上就此安居的张曜，却适逢清末年间，中华大地屡遭列强侵犯，民族陷于危难之际。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张曜再次出仕，征战边疆。六年五月，张曜统嵩武军进入了战场，取得了胜利，以提督记名遇缺简放。以后又接连建了战功，九年二月授广东陆路提督，十年赏加云骑尉世职。

同治十年（1871），沙俄悍然出兵强占伊犁。面对这一情势，清廷一片



◎ 张曜像

厚一案，使沈桂芬精神上备受打击。他本已有病在身，经此冲创，病情遂越发严重。光绪六年十二月以病告假。

1881年除夕，积劳成疾的沈桂芬在家中溘然长逝。光绪帝闻讯后悲痛万分，特颁上谕：“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清慎忠勉，老成端恪，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虑，劳瘁不辞，加恩晋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寺。”追封太子太傅衔，谥号文定。

（资料来原：《清史稿》、张杰《晚清名相沈桂芬宦海事迹评述》、史谭《冯桂芬与沈桂芬》、震钧《天咫偶闻》、《明珠璀璨——同里历代名人选》）

张曜

张曜（1832—1891），字企青，号朗斋，浙江钱塘人，顺天大兴籍。父世桐，候选知州，侨寓汴梁。张曜幼年随亲人来吴江黎里蒯贺荪家投亲。蒯贺荪即蒯士芴，字则钦，号士芴，自幼聪颖过人，十九岁时在京城就已经小有名气。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恩科顺天举人，后官至直隶州知府。张曜为蒯贺荪的内侄，幼年随蒯贺荪来黎里读书，蒯贺荪离开黎里后，张曜便在镇上以做买卖为生。

咸丰三年（1853），蒯贺荪率军镇压捻军，正逢战事不利，蒯贺荪军队被困的时候，张曜前来投奔，并协助蒯贺荪与捻军作战，屡立奇功。蒯贺荪十分欣赏这位内侄的军事才能和危难时刻的舍身相助，就将族弟蒯善培的女儿蒯雪如嫁给了他，于咸丰四年在黎里完婚。蒯雪如相貌娟秀，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开始读书识字，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才女，且受父亲熏陶，很懂得官场之道。咸丰四年（1854）黎里完婚。次年，张曜在与捻军作战中，又立功，被升为总兵，后又升任河南布政使。

同治三年（1864），张曜来黎里新蒯家弄底居住，并将居所题名“退一步处”，有归乡退隐之意。本想在江南小镇上就此安居的张曜，却适逢清末年间，中华大地屡遭列强侵犯，民族陷于危难之际。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张曜再次出仕，征战边疆。六年五月，张曜统嵩武军进入了战场，取得了胜利，以提督记名遇缺简放。以后又接连建了战功，九年二月授广东陆路提督，十年赏加云骑尉世职。

同治十年（1871），沙俄悍然出兵强占伊犁。面对这一情势，清廷一片



◎ 张曜像



◎ 张曜故居

混乱。在朝廷急需人才之际，张曜以提督名义跟随时任东阁大学士的左宗棠，率军讨伐入侵中国喀什、占领南疆的中亚浩罕汗国高级军官阿古柏。相继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至光绪三年（1877），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重创阿古柏军队，

阿古柏身亡，残部逃往境外。清军取得粉碎殖民主义的胜利，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张曜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予协办新疆军务之职。光绪十年（1884），张曜东归，同年，中法战争爆发，张曜马不停蹄，奉命保卫京畿，后历任海军帮办，广西、山东巡抚等职。在山东，张曜办海岱书院于青州（今益都），亲自督治黄河水害，最终鞠躬尽瘁，为国操尽最后一分精力，病死在工地上。

黎里人并没有忘记这位将军女婿。1986年7月，吴江县人民政府将张曜故居“退一步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修复，让人们更加了解和怀念这位清末爱国将领。

（资料来源：《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张曜传》、《黎里续志》、魏长洪、李晓琴、郑平《张曜在新疆》）

陆恢

陆恢（1851—1920），初名友奎，一名友恢，字廉夫，一字狷齋，号狷叟、廉道人，别署破佛齋主人、话雨楼主、客膝轩主人等，吴江同里人。祖父经商，没有儿子，在顾渚择女婿，陆恢的父亲到陆家做了女婿。父亲有才干，经营十余年。事业兴盛、家业富饶。但在陆恢十四岁的时候，父亲不幸早逝。祖父当时已八十岁，因为悲痛过度也溘然逝世。这突然的变故让陆恢的境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母子俩孤立无靠，面对外人的侮辱，内部的偷盗，家业也就败坏了。陆恢放弃了家里的经营，开始攻科举考试。他下笔超俊，让师友都非常吃惊。但一应童子试，却未能录取，于是，放弃科举而一心专攻画画。



◎ 陆恢像

陆恢从小喜爱画画，每天在私塾读书后回到家里，就向母亲要钱，说是买糖果饼饵等食品，其实是去买纸，戏作鱼鸟舟车状，都生动有意。放弃产业与科举业后，陆恢在家里读古诗书，临古碑拓，摹名人画，还邀朋友吟诗谈艺，悠然自得。高情逸韵，萧然物外。

当时，吴中画画有名的人主要是刘德六、陶焘、王礼、任翥璜等，陆恢就与他们接触，有的成了他的老师，有的成了他的朋友，有的与他们交往切磋艺术。刘德六和王礼都是吴江人，刘德六是夏之鼎的弟子，他画的花卉出笔秀逸，画的草虫、蔬果都达到了奇妙的境界，还擅长画胡蜂，人称“刘胡蜂”。王礼，号秋言，蜗寄生，幼从沈石芹学写花鸟，劲秀洒落，有隽逸之气。在这些名人的教习下，陆恢的画技进步很快。

在同里，陆恢与同乡金心兰结为朋友，金心兰性情豪爽，擅画梅花，



春江水暖鸭先知
癸丑夏月陆恢画

自署为冷香馆。陆恢好学不倦，一次经过黎里罗汉寺，见里面塑的十八罗汉灵动精妙，非常喜欢，就拿了纸和笔，坐卧在罗汉的下面，把他们的形状全部画摹后才回家。他年过三十画技已绝精能。

陆恢痴迷于画画，不治生产，家业日落。光绪十三年（1887）到苏州以卖画为生。用卖画的钱购得碑拓，朝夕临摹，书法长进也很快。他的书法入汉魏六朝所书碑志，雄茂遒劲，有古金石刻风度。

家居苏州的吴大徵对鉴别字画很精通，一天经过装裱书画的店铺，在墙壁上见到了陆恢的一幅画，凝视后，拍案叫绝：“三百年来没见过这样的作品了。”就邀请陆恢到他家里去。

陆恢和吴大徵也是有缘。陆恢拜陶焘为师，吴大徵也是陶焘的学生。因而两人相见后非常投机，研文谈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吴大徵拿出家中所藏的历代名帖让陆恢观赏临摹，在吴大徵家里，陆恢上窥唐、宋，下抚元、明，艺事大进。

光绪十八年（1892），陆恢搬到苏州桃花坞居住，陆恢成了吴大徵家的常客。吴大徵当湖南巡抚，陆恢在母亲去世后，进了吴大徵的幕府，从军出关，随吴大徵游历三湖、辽东等名胜。在洞庭湖泛舟，在衡山览胜。在游历中，更是注意观察浩瀚山海，四季变化。所历既广，见到了峭拔雄伟的山峰，笔意苍

◎ 陆恢（春暖鸭先知）

劲遒丽，古拙幽深。他创作《衡山记游图》八幅是生平杰作，有人认为可以和清画家黄易的《嵩洛访碑图》相媲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任两江总督，他召集海内外名画家来补绘王元恽所进的《承华事略图》，得知陆恢画艺精湛，就请他担任总领。图中衣冠、彝器悉准历代制度，而运笔遒劲，布景古雅，无匠气。有见识的人看了这图，认为是承制著作之冠。当时朝廷也对这图褒扬有加。

完成了《承华事略图》补绘工作，陆恢就回到了苏州桃花坞，与吴大徵、王同愈、吴昌硕等人在顾氏怡园结社，潜心绘画，成了江南老画师，有数十人跟他学画。陆恢又精书画鉴定，曾应南浔庞元济之聘前往鉴别宋元古本，后庞元济辑有《虚斋名画录》，陆恢实总其事。陆恢晚年的画雄厚变化，睥睨古人，画姿出类拔萃，超过一般人。陈去病曾经人介绍，带了文章和书法作品，到陆恢的住处求教。陆恢见陈去病年少好学，出于喜爱，不吝殷勤地指点。一次，谈得兴奋，陆恢即兴提笔，亲自为陈去病作了一幅画示范。与陆恢的交往，使陈去病大开眼界，在文章和书画上大有长进。后来陈去病的书法秉承明清遗风，秀丽独特，这与陆恢的教导很有关系。

陆恢卒年七十。出版有《陆廉夫冷香居记事图册》、《陆廉夫画册精品》以及有陆氏子孙所影印《陆廉夫先生编年画册》等。

（资料来源：《吴门画史》、《吴江书画》、陆翔、陆永瑞《先府君事略》、吴国良、吴旭江《翰墨留香——吴江书画篆刻人物录》）

金松岑

金松岑（1873—1947）先生，原名天翻，后改天羽，笔名有“麒麟”、“爱自由者”、“金一”、“K. A.”、“金城”、“天放楼主人”、“鹤望”、“鹤舫”等。吴江同里人，父亲金光照是一介书生。金松岑七岁时隐约懂得诗词的基本常识，在上学前，已经能将《九经古义》初次通读完毕，还参加了金家诗社。1886年，在同里最有声望的顾言处求学，1891年考上秀才。在顾言的指导下，他写了两篇很有分量的《长江赋》和《西北舆地图表》参加会试，成绩名列前茅。顾言去世后，金松岑就到钱焕处读书，在他的思想影响下，金松岑对封建社会的弊病有了深刻认识。



◎ 金松岑像

金松岑与同里陈去病、黎里蔡寅成了好朋友，他们三人模仿《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义结金兰，金松岑老大，陈去病老二，蔡寅老三，还公开取号，金松岑号“壮游”，陈去病号“壮图”，蔡寅号“壮怀”。1897年金松岑与陈去病共同发起成立了“雪耻学会”。

1899年3月，金松岑在金家办起了私塾，还担任了同里区教育会会长。在家乡同里创办第一所学校“同里自治学社”。金松岑后来被称为“家乡新式学校的鼻祖”，开了家乡办新学的先河。

1902年4月，金松岑和陈去病参加了由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回乡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牌子挂在同川学校门外，金松岑任会长。1903年金松岑到上海爱国学社工作。回到吴江，接到了陈去病从日本的来信，说他在主编《江苏》杂志，约他写稿。于是，金松岑就自己关注的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东三

省事件为线索，以赛金花一生历史为主线，写了《孽海花》第1、2回寄给了陈去病，陈去病就在1903年10月在《江苏》第8期刊载了，署名“麒麟”。此后金松岑又写到了第六回。当时常熟人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书社，出版《小说林》杂志，金松岑就将《孽海花》前六回投给了曾朴，曾朴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金松岑就顺水推舟，请曾朴续写下去，两人共同商量的预定的六十回目。结果，曾朴仅用了三个月，一气呵成了二十回。1905年春出版。《孽海花》被鲁迅先生列为清末四部谴责小说之一。

1923年应邀担任了吴江县教育局局长。在教育局长的岗位上任职2年，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实事。金松岑离开了教育局长的岗位后，又投身了水利事业。1927年，被任命为江南水利局局长。

1932年夏天，金松岑与张一麟、李根源、陈石遗3人缔结金兰之谊，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抗战时期的金松岑身心备受煎熬，但他大笔如椽，断断续续写了60多首乐府诗，内容都是抗日救亡，抒发自己傲骨之情，他的学生称他此时的作品为：“一代悲歌成国诗。”

金松岑晚年生活十分凄凉，断了经济来源，除了变卖同里章家浜“大夫第”的房产外，别无长物。物价的不稳定，使他饔粥不继，靠几位亲近的学生接济勉强度日，但他还是铮铮铁骨，宁死不肯屈从于日伪。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初，他奋笔疾书进谏蒋介石，对抗战后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腐败现象直陈利弊。2个月后，金松岑在上海遇到学生柳亚子，通过与柳亚子的交谈，他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1946年4月，金松岑曾返家乡一次，由当时的吴江中学二院主任金仲禹陪同到吴江中学作了一次讲座，他列举吴江先贤们足为楷模的事迹，要青年们继承和发扬先贤的传统，他提到了王锡阐、吴日生等，特别提出到乡贤陆燿的事迹。这些是他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而生发的感慨，是他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沈



◎ 金松岑勤奋好学

崇的暴行，金松岑在1947年1月1日元旦的早晨，不顾天冷风大，到苏州的东吴大学找驻校的美国传教士文乃史论理。这一折腾，第二天就病倒。10天后，于1947年1月10日，不治而亡。临死前，他还想把呼声和要求写下来，但他已经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涂了几张纸，团一团丢弃，他带着内心的压抑和遗憾走了。

金松岑一生著作等身，才气横溢。他融古通今，尤工诗文，章太炎盛称他为“一代作手”，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现存世的主要有：《女界钟》、《孽海花》（前6回，及后60回设想）、《孤根集》（上下集）、《新中国歌唱集》、《天放楼诗集》（正、续集）、《天放楼文言》（正、续集）、《皖志列传稿》。另外还有一部分佚文，如《滇志》、《元史纪事本末补》十二卷、《日俄战争未来记》（薛公侠同译）、《摩哈默德传》、《清三大儒学粹》、《词林撷隽》、《新中国唱歌集》（第4本）等。译著有《自由血》、《三十三年落花梦》（恭公全侠口译，金松岑笔述）、《妒之花》等。他去世后，光华大学弟子集资刊行《天放楼文言遗集》、《天放楼诗季集》、《鹤望中年论坛》等。

（资料来源：徐宏慧《金松岑传》、《金松岑》、赵承祖《同川学堂与中国教育会》、祁龙威《追怀先师金松岑先生》、任传济《同川小学和金松岑》、杨友仁《金松岑先生年与著作简谱》、金立初《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吴江市同里中学金松岑纪念室《金松岑生平事迹》）

陈去病

陈去病（1874—1933），吴江同里人，出生在苏州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出生时取名庆林，后又得名佩忍，去病是他后来参加革命后，要效仿汉朝爱国将领霍去病而自己改的名。陈去病还在母亲腹中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倪太夫人抚养长大。

陈去病少年时期，就有了宏大抱负，攻读阴符六韬，愤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897年，与金松岑一起在同里镇成立了“雪耻学会”，1902年参加中国教育会，与金松岑一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1903年3月赴日本，与中国留学生



◎ 陈去病像

江苏分会的同志一起创办机关刊物《江苏》杂志，担任文选编辑，参加中国日本留学生在东京召开的拒俄大会，成为义勇军的一员。6月他回国在上海爱国女校当教师。1907年，陈去病利用与华兴会、复兴会、兴中会都有密切联系，与各会党领袖都有交情的条件，与高天梅、柳亚子等人商议发起组织了一个联络革命文化人士的团体“神交社”，就是南社的前奏。

1908年1月12日，陈去病与柳亚子、高天梅、刘师培、黄节等人在上海酒楼小饮，相约结“南社”。特别喜欢“南”字，他读“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诗句后，不仅改名为巢南，还将他的诗集命名为《巢南集》。1909年，他与高天梅、柳亚子一起发起成立了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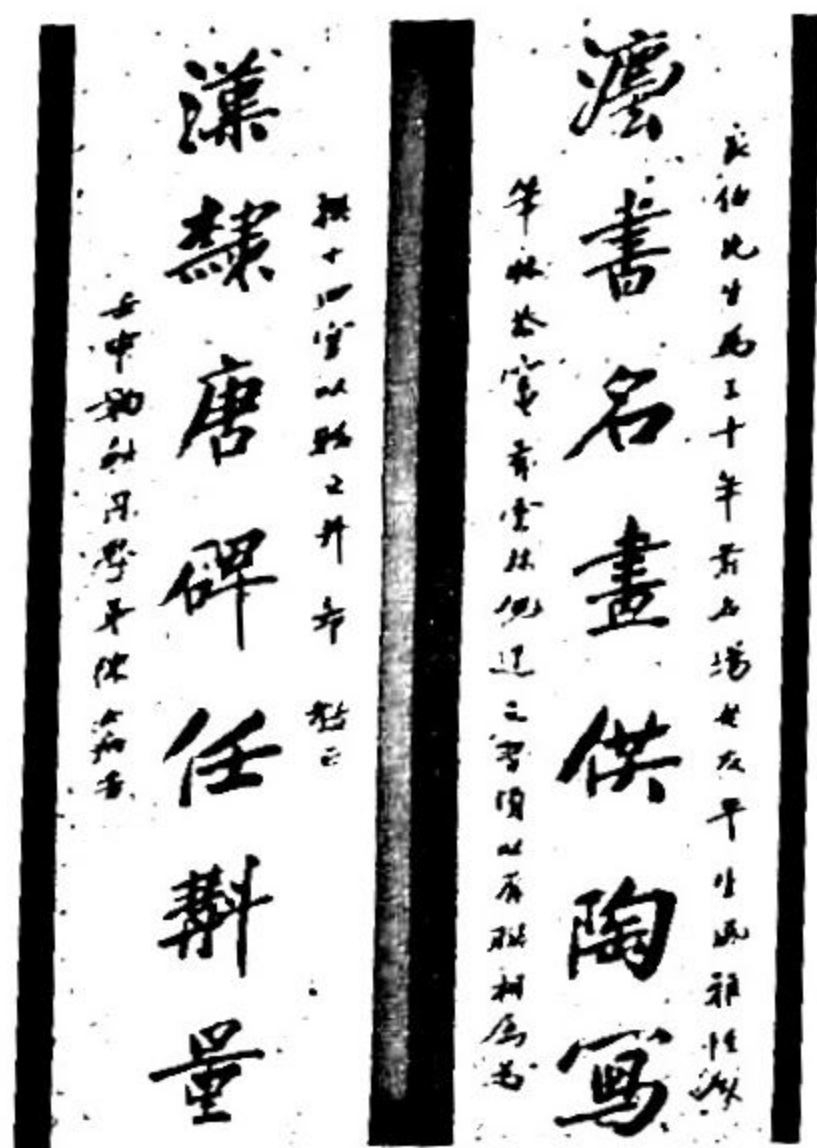
陈去病积极投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6日光复苏州，江苏都督程德全请陈去病等人办了《大汉报》，宣传革命。1912年1月1日就职，1月3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组成。这时，陈去病与高天梅、朱少屏、陈布雷、胡朴安等人筹办了《黄报》。

1916年春，浙江宣告独立，陈去病与徐自华在苏州发动起义，事泄化装逃逸，又应吕公望邀请到了浙江都督府担任秘书。1917年9月1日，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陈去病正在杭州欲护秋社，听到了孙中山在广起事的消息，就从杭州到了宁波，想在浙东举兵起事响应孙中山，但是，因兵力单薄而失败。这次战役，屡次险遭不测，化装突围才转危为安。

1918年，陈去病到了广州，先后担任非常国会秘书长和参议院秘书长。1919年1月，他与蔡哲夫等人在广州发起了南社临时雅集，此后，又参加蔡哲夫发起组织的禺楼雅集。1919年10月，陈去病因受南方瘴疠侵袭，卧病百子岗，于是，辞去广州的职务归乡，回到上海。

1921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他再次奔赴广州，为苏曼殊营葬四出奔走后回到家乡。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离开广州，亲临韶关督师，北伐大本营也移到韶关。陈去病听到消息，感到北伐形势紧急，想起了前时对孙中山的承诺，5月中旬，立即赶到广州，出任孙中山韶关行幕大本营宣传主任。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观音山住所粤秀楼，大本营撤离韶关，孙中山命令陈去病保护一批文件只身北返。陈将孙中山的手笔信函讲稿、规划、指令及大总统府委任存执，装了两大书筐，雇用挑夫，历经艰险，终于在6月底辗转到了同里。

◎ 陈去病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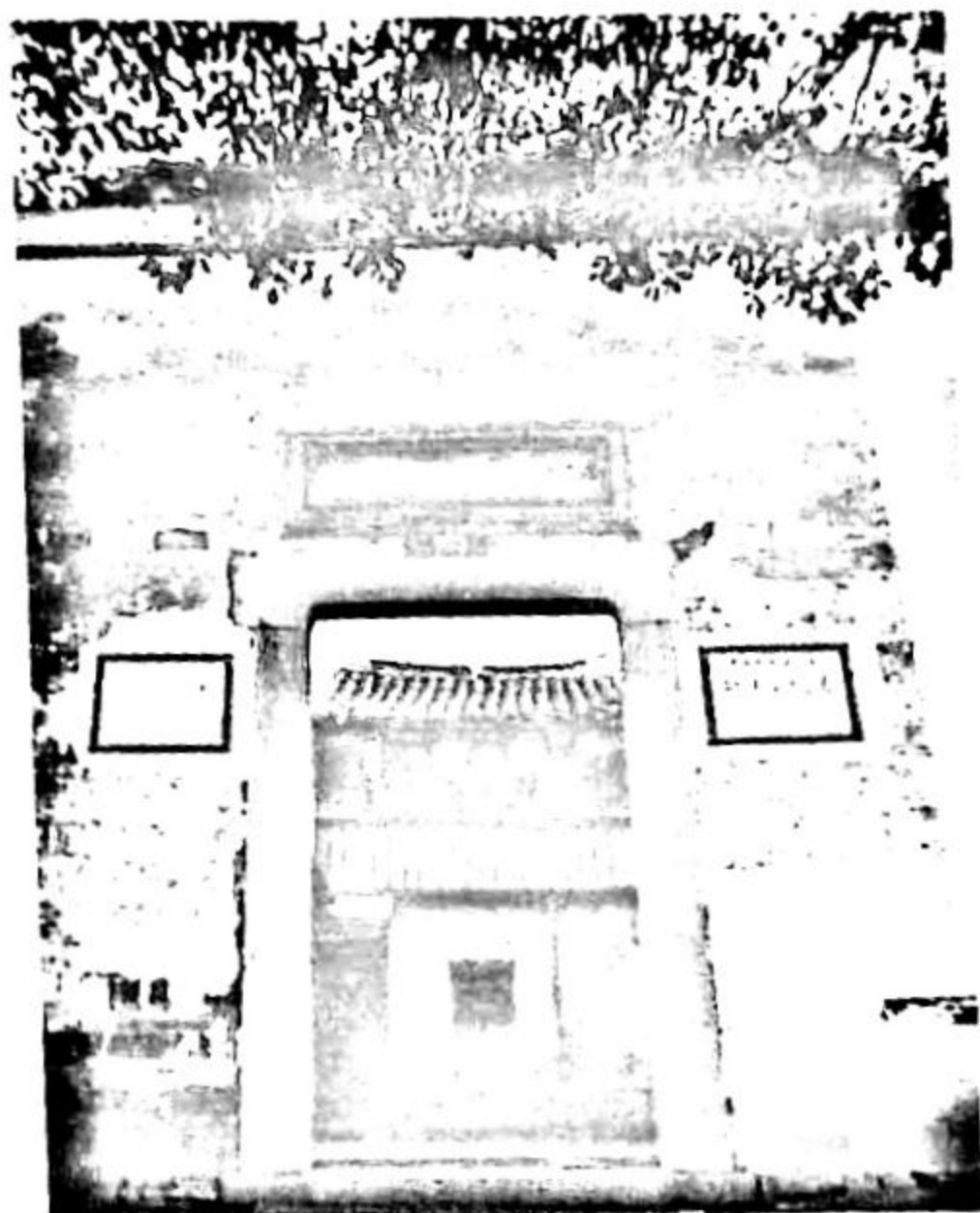
此后陈去病在东南大学任教，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陈去病担任了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还参与组织了江苏省民治建设会，也参加了柳亚子发起成立的新南社。

孙中山逝世后，他担任了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在沪非法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沪方中央监察委员。陈去病与沈进等人通电支持西山会议，受到了柳亚子的批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4月30日，有人提议孙中山治丧委

员会“加推蒋介石等七人”为委员，陈去病深痛蒋介石等违反孙中山先生遗教，就发誓“终身勿与蒋氏共事”辞去委员。

陈去病是南社发起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南社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参加南社的正常雅集外，他还参加在长沙烈士祠、上海愚园、北京中山公园、广东禺楼、西塘西园、周庄迷楼等地举办的临时雅集。1928年，还发起在苏州虎丘冷香阁举行纪念南社成立二十周年雅集。

1931年，由于年老多病而陆续辞去所任各职，在同里度过晚年，1933年去世。柳亚子和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发起在上海举行追思大会，国民政府曾明令致哀，其生平事迹录入国史。陈去病墓位于苏州阊门外虎丘西南麓，1982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 陈去病故居

陈去病不仅是辛亥革命风云人物，还是中国近代文史学家、诗人。陈去病搜罗了众多的乡邦文献、明清史料，整理或编著了《陆沉丛书》、《正气集》、《清秘史》、《五石脂》、《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遗集》、《松陵文集》、《吴江诗录》、《笠泽诗征》等，其中《明遗民录》是为明末遗民、义士所作的传记集，《五石脂》是记载东南文人抗清事迹的笔记，兼具诗话、文话的性质。他的诗大多为咏怀之作，集中抒发了诗人推翻清朝统治的壮志，体现了清末《国粹学报》派的特点，即借历史做反清的宣传，存有《浩歌堂诗钞》、《浩歌堂续钞》、《浩歌堂补钞》。

（资料来源：杨天石《陈去病》、张祖一《陈去病的结社与革命活动》、《南社人物传》）

施肇基

施肇基（1877—1958），字公立，号植之。吴江震泽镇人。父施善增，号静庵，国学生，在乡经营蚕丝转运业务，清廷封为荣禄大夫。施肇基五岁入私塾读书。

施肇基在中学毕业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就读，师从史蒂文森教授，为中国学生在该校入学之第一人。第二年，赴俄并被派赴海牙出席“弭兵会议”，任中国代表团参赞官，后居俄京圣彼得堡及海牙一年。1900年返校，次年毕业，得文学学士学位，又深造一年后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02年夏，施肇基学成回国，9月参加新科举考试，得最优等法政科进士，成为第一批“洋进士”。



◎ 施肇基像

1906年唐绍仪入京接任督办铁路大臣，约施肇基同行考察，取得唐赏识，推荐他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任京汉铁路局总办。1907年秋，调任京奉铁路局会办，到天津赴任。1908年，奉命到沙俄铁路公司谈判，使霍尔瓦特同意撤销俄罗斯在哈尔滨的水利会，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权。11月21日，代表中国政府接收了水利会。同时主持制定《水利会暂行章程》。施肇基在哈尔滨经办两件历史性的重大案件，一件是伊藤博文被刺案，另一件是张勋兵士伏法案。

1910年施肇基奏补外务部右丞。时东三省发生严重瘟疫，致德国太子取消访华之行，影响国家声誉。施肇基在东北治疫圆满完成后回到北京，受到摄政王接见嘉勉，赠以金牌一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中国等二十七个国家准备在1919年1月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行和会。中国派

出了五人代表团，施肇基作为中国代表团二席代表出席了会议。施肇基在1918年年底先到巴黎，与顾维钧一起进行会前准备。由施肇基和顾维钧两人共同拟定了七个问题。和会是在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操纵下进行的。他们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虽然决议将原来德国控制的胶东半岛主权交还中国，却又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所有经济特权，对这件事，施肇基、顾维钧等人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对这款保留意见，并且一致决定拒绝签字。就在施肇基他们拒绝签字的时候，中国北洋政府却已经作出了愿意签字的决定。施肇基和同事们商量后，不顾北京当局的决定，尊重和附和民意，果断地拒绝签字，同时，在巴黎各报还发表了正式声明“庄严声明中国代表团因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签字会正式举行，但施肇基等人已经在这之前离开巴黎，签字会中国代表缺席，这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整个世界都感到愕然。

1929年，施肇基复任驻英全权公使3年。1930年奉特命兼任出席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及该盟理事会中国全权代表。在施肇基向国联的呼吁下，1931年9月3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把军队从东北各地特别是从辽宁省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以内。当时日本政府提议和中国直接交涉，日本代表接到外相币原男爵训令，提出五项所谓“指导中日直接谈判的基本原则”，妄图用舆论欺骗世界，好像日本并非侵略，而只是力图保护在满洲的权利。施肇基代表中国政府在国联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于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1932年10月30日，驻欧各国公使联名通电呼吁停止内战，施肇基也签了名。

1932年施肇基又被调任驻美全权公使，1935年使馆升格，政府特任他为驻美全权大使。1937



◎ 施肇基拒签和约

年5月辞任返国，那时他年已花甲，遂寓居上海。

施肇基辞任后，本想在上海颐养天年。未久，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救国救民之心，担任了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的职务，并创办了上海防务协会及附设医院，任董事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受宋子文外交部长的邀请，赴美国华盛顿担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年6月12日，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被聘为“美国南非洲国际和平五人委员会”非美籍委员，代表美国处理南非事务。1945年6月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国际组织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他被委派为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1948年至1950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这年已届七十三岁，他退出了政界，罗斯福总统挽留他在华盛顿定居养老。

1954年秋施肇基脑出血，经治疗有好转，但记忆力渐趋衰退。1958年1月4日逝世于美国华盛顿。生前著有《施肇基早年回忆录》。

（资料来源：施嘉远、周毅平《职业外交家施肇基传略》、李廉琛《职业外交家施肇基博士传略》、周德华撰《江苏历史文化名镇震泽》）

郑辟疆 费达生

郑辟疆（1880—1969），字紫卿，吴江盛泽镇人。1900年考入杭州蚕学院，1902年毕业。由于成绩优良，就被派往日本留学，进了长崎农林商等专科学校蚕丝科，他在学习的同时利用课余和假日进行育种和培桑试验，育成了一种成熟快、个体大的新原种和生命力旺盛，极易栽活的山地桑。

在日本，他访问了主要蚕区和蚕业界，回国后，先后在山东青州蚕丝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其间曾拟就《提倡蚕桑十二条陈》送呈山东巡抚，提出振兴中国蚕丝事业的办法与主张。他吸收日本蚕丝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写了《桑树栽培》、《蚕体生理》、《养蚕法》、《蚕体解剖》、《蚕体病理》、《制丝学》、《蚕丝概论》、《土壤肥料论》等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是我国蚕丝教育最早的、有系统的一套教科书。

1918年郑辟疆应史量才邀请接任女蚕校校长，亲自制定了女蚕校的教育方针。一方面安排费达生和郑蓉镜远赴日本留学，另一方面也积极争取从日本聘请有经验的蚕丝界人才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

费达生（1903—2004），吴江同里镇人，父亲费璞安曾留学日本，历任吴江县议会议长。此后，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等职。母亲杨纫兰毕业



◎ 郑辟疆像



◎ 费达生像

于上海的女子学校，在吴江创办蒙养院（幼儿园）。费达生六岁就入同里丽则女校，1916年夏毕业于松陵爱德女校，后考入女蚕校。在郑辟疆的安排下，费达生于1920年9月和郑蓉镜乘船到了日本。1921年春，两人一起考入了东京高等蚕丝学校。费达生所学制丝课程成绩优异，她的缂丝实际操作成绩居全班之首，多次得到老师的表扬。1923年费达生毕业回国，继续在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任教。

郑辟疆组织开展蚕业技术推广指导工作。1922年，郑辟疆出资在家宅“潜庐”内试养改良蚕种，取得成功后开办蚕种实验场一壬戌馆，成为苏南最具代表性的蚕种场之一。1923年女蚕校成立蚕业推广部，费达生担任推广部主任。

1924年费达生等4人来到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说服蚕农们用新蚕种和新方法养蚕，建立了一个由21户蚕农组成的共育组。在费达生等人的努力下，新蚕种和科学养蚕技术逐渐得到了蚕农的信任，随之推广开来，取代了土种并且传播到了浙江、皖南等地。1925年蚕业推广部改名蚕丝推广部，先在吴江县开弦弓村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郑辟疆开创了学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女蚕”模式，不仅受到产业界和乡村农民的欢迎，而且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赞赏，其影响更波及海外，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于昭和四年（1929）四月五日发行的《支那蚕丝业大观》上称赞他的成就，郑辟疆也被日本友人尊称为“中国蚕丝业的圣人”。

1929年费达生帮助蚕农们在开弦弓村创设了“开弦弓丝厂”，这是中国



◎ 郑辟疆与友人合影

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自办的合作企业。费达生被称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之母”。1930年，郑辟疆主张引进国外的循环式自动烘茧机，并加以改造和推广，以代替农村土灶烘茧。同时支持张复、费达生研制成功“女蚕式立缂车”。

1934年郑辟疆任全

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进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蚕业改进委员会委员，同时兼江苏省无锡蚕丝试验第一任场长。1937年日华侵华战争爆发，女蚕校迁往四川重庆。1938年费达生先到重庆，为学校迁川作准备。1939年春天，郑辟疆一行从上海经香港，辗转万里来到重庆。在重庆费达生担任四川丝业公司制丝总技师及四川乐山蚕丝实验区主任，为四川蚕丝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辟疆与费达生回到苏州重整女校。在中蚕公司接收瑞丰丝厂时，费达生和几位同事参与了接收工作，亲手摘下了“瑞丰丝厂”的厂牌，挂上了“苏州第一丝厂”的牌子，并担任苏州第一丝厂厂长。后费达生回到女蚕校任实习丝厂经理和教员，协助郑辟疆为恢复女蚕校正常的教学科学试验工作不断地奔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南行政公署决定女子蚕校与蚕专科学校合并为苏南蚕丝专科学校，郑辟疆先生担任校长，费达生任该校实验丝厂厂长。1950年3月，七十一岁的郑辟疆老先生和四十八岁的费达生女士恋爱已有20余年，在苏州浒墅关举行结婚典礼，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第二天，夫妇就一起应邀出席了苏南行署召开的蚕农代表会议。

1958年丝绸工业学校改为丝绸工业专科学校，郑辟疆为校长，费达生任副校长。1960年升格为苏州丝绸工学院，郑辟疆任院长，费达生任副院长。

“文革”期间，郑辟疆和费达生也受到冲击，被隔离审查。郑辟疆在晚年，还致力于学术著作，校释出版了《蚕桑辑要》、《幽风广义》、《广蚕桑说辑补》、《野蚕录》等，1969年11月27日病逝。

费达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仍然奔波于江南的农村和工厂，指导养蚕和制丝，发表了若干篇有关蚕丝制作和蚕丝业的论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九三学社，生病期间，她仍未停止自己的蚕丝工作，继续着蓖麻蚕的研究。2005年8月12日在苏州逝世，被赞誉为当代“黄道婆”。

（资料来源：曹鄂《经纶天下衣被苍生挽回权利谁之任？我国现代蚕丝科技革新的先驱者——郑辟疆费达生》、朱跃《当代著名蚕丝教育家，郑辟疆与其同志们》、周一川《春蚕到死丝方尽——记蚕丝专家费达生女士》、沈国抚《新中国蚕丝事业的奠基人——记当代黄道婆费达生二三事》、周德华《吴江丝绸志》）

杨天骥

杨天骥（1882—1958），原名锡骥，改天骥，字骏公，号千里，别署茧庐、天马、东方、闻道等，吴江同里人。父亲杨敦颐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学政。儿时，杨天骥跟随父亲到驻地镇江读书，非常用功，袭承父学，善于撰写各种诗词文章，尤其擅长书法和篆刻。

1899年，杨天骥进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受教于唐文治，1901年8月曾在东文学堂学日语。1903年民主革命者邹容在上海爱国学社撰写《革命军》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章炳麟为此书作序，杨天骥与同乡金松岑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苏报》案发生后，血气方刚的杨天骥积极奔走参加营救章炳麟的行动。

1904年，杨天骥到上海澄衷学堂执教，新的思想新的教法深受学生爱戴。胡适当年就是澄衷学堂的学生，受杨天骥影响很大，成为一个适者生存《天演论》的信奉者，将自己的名字“胡洪骅”改为“胡适”，字“适之”。

1904年2月25日，蔡元培任主笔的《俄事警闻》停刊，杨天骥积极参加重组，停刊的第二天即以《警钟日报》继续出版，刊登揭露英、法、德等帝国主义欺凌中国主权的事实并加以抨击的文章。此后，他参加了同盟会并先后任《民立报》、《民呼报》、《民吁报》编辑，与于右任、陈其美、宋教仁等结成了莫逆之交。武昌起义后，参加了陈其美所领导的进攻江南制造局及道台衙门的战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仓皇出逃，留下一辆马车，车髹黄漆，非常醒目，陈其美得到后转赠杨天骥。民国初年，杨天骥历任教育、司法、外交等部参事、秘书等职，曾一度主笔《申报》。



◎ 杨天骥像

1913年杨天骥离沪去湖南湘岸樵运局任稽核官，不久即去北京，任教育部、外交部、司法部秘书、参事等职务，前后共4年时间。

1917年7月，第一次护法战争爆发，杨天骥南下广州，加入中国国民党，任护法国会参议员。1920年又到北京政府国务院任秘书。民国十年（1921）太平洋会议召开，任中国代表团咨议出席会议。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粤军将领的邀请下，从上海到广州，3月2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张绍曾还以内阁全体名义，派王宠惠与杨天骥二人持函到广州见孙中山先生。函中劝中山先生取消大元帅名义北上合作。杨天骥、王宠惠是老国民党员，他俩到了广州，在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大本营中供职。

1927年1月，同乡钱涤根在上海组织军队准备配合北伐大军，事泄被驻沪直系军阀李宝璋捕杀，杨天骥亦被李宝璋的流氓暗杀队所跟踪。暗杀队携枪在交通要道和杨家寓所附近频繁活动，情势危急。杨天骥陪伴老父佯病躲藏于法租界广慈医院，10天过后租界当局与院方对他们警告，限他们出院。杨天骥无奈乔装后，由上海乘夜船回到吴江家乡，再到浙江，与北伐军21师严重部会合。严重部进攻江苏，1927年3月到达松陵，击溃孙传芳的两个混成团。在松陵镇成立吴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杨天骥任主席，下设民政、财政、公安、教育、实业、公益等部门。1928年1月杨天骥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1929年7月被委任为吴江县县长。1931年4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代秘书长，1933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1月25日，杨天骥到香港以经济委员会委员身份协助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主持港澳地区党政工作，募集捐款，购买物资运到内地以供抗战所需。

太平洋战争爆发。杨天骥先是联络留港抗日志士进行潜伏，后取道东江游击队驻扎区到达重庆，抗战胜利之后才回上海。1946年8月，吴江旅

身孝廣南孤根崛起計署為郎循
 繩維軌京國迴翔悽懷鄉里文酒流
 連忽焉傷逝集几塵封甄雷書史
 孰復起予臨風雪涕
 廣南仁兄千古
 楊天驥

◎ 杨天骥书法作品

沪同乡会获准恢复活动，公推杨天骥为理事长，由毛啸岑等6人为常务理事，严宝礼、范烟桥、唐炳麟等18人为理事。1947年6月，吴江同里发生南濠弄小学教师邹月娥遭5名国民党军官轮奸致死的惨案。杨天骥召集同乡会理事商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声援家乡民众，强烈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态度坚决，行动迅速。并电函吴江县政府、江苏省民政厅。又电呈国府，力主正义。嗣后辗转呈主席，奉谕严惩。省民政厅、教育厅及国防部派员到吴江同里查处案件，最后邹月娥惨案的5名凶犯被判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千里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担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受聘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特约顾问。1958年12月27日在上海因病去世。

杨天骥从政多年，仍不改文士之习，文字功底深厚，喜作诗，擅长书法篆刻。他的书法俊逸，深于理法，于右任编纂“标准草书”时，曾经邀请他一起参与。平时勤研篆隶，博涉金石文字，篆法刀法雄肆，存有《茧庐吟草》、《茧庐印痕》、《茧庐长短句》、《茧庐治印存稿》等。

（资料来源：郑逸梅《南社丛谈·杨天骥》、沈昌华《同里骄杨》、李海珉《吴江与南社》）

邵力子

邵力子（1882—1967）出生于浙江绍兴陶堰村。父亲邵霖，字诚斋，又名实斋，是前清科举出身，担任了江苏省吴江县县丞，分防在盛泽镇，母亲张氏是吴江盛泽人。

邵力子的童年在陶堰村度过，从小聪颖好学。1896年父亲病倒了，邵力子从绍兴到盛泽。1898年，受戊戌维新影响，去上海读书，进入了严开第办的求志学堂。未过一年，考入“广方学馆”学习法文，后进入苏州中西大学堂，也就是江苏高等学堂学习。因父亲去世家庭经济窘迫，不得不中途辍学，到盛泽镇任教。



◎ 邵力子像

邵力子身在盛泽小镇，心里装的是中国大事。1902年，他离开家乡，再次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特班”，特班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06年他与于右任一起去日本学新闻学，经同盟会员康心孚介绍拜访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回国，到上海后参与创办《民呼报》、《民立报》。1912年由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1914年加入了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华革命党。曾在复旦公学任教，后来担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

1914年邵力子在复旦公学任教时加入南社。1916年1月22日，中华革命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正式出版，他与叶楚傖担任总编辑，该报成了南社社友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邵力子还是新南社的发起人之一。10月4日，新南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等人为编辑主任。

1919年，邵力子得到“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当天夜里就亲自编排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闻稿。“五四”运动后，邵力子就积极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8月的一个晚

上，陈独秀来到三益里看望邵力子。陈独秀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我们欢迎你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发起人之一。你愿意吗？”邵力子望着陈独秀，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救国，我义无反顾。”不久，他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邵力子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后转移嘉兴南湖也是他参与建议的。7月31日“一大”在嘉兴南湖续开之际，邵力子就在《觉悟》上刊登了署名“光亮”的《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明确宣称：“我所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此的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

1923年在上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他与毛泽东都在办事处工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1931年12月，邵力子被南京国民政府

委任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935年9月8日，毛泽东致函邵力子劝告他应振“觉悟”旗帜，努力促进国共合作，共同团结抗日。邵力子深为毛泽东的大义所感动，同年10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多次与冯玉祥、张之江、骆介子一起研究推动抗日救国的紧急措施，



◎ 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与邵力子（前排左起第2人）等合影

虽然屡遭当权派陈立夫、陈果夫的压制，但是还是率先对两党团结合作抗日有所表示。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邵力子努力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两党重新合作创造了条件。

1937年1月，邵力子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桥梁。此间他批准出版了《新华日报》和《鲁迅全集》、《毛泽东传》。7月，由他与蒋介石、张冲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庐山会谈，促使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

从而奠定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1940年初，他为维护抗日大局避免内战，争取苏联援助，毅然决定接受驻苏大使的使命。1942年回国。

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邵力子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10月8日，双方代表以邵力子起草的《会谈公告》为基础修改成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作为定稿。他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谈判结束又送毛泽东乘飞机回延安。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他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同年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67年12月25日，在北京病逝。邵力子熟悉国共两党，热心国共合作，成为国共两党称誉的“和平老人”。

（资料来源：傅学文《和平老人邵力子》、邵黎黎、孙家轩《我们的祖父邵力子》、舒风《周恩来与邵力子》）

钱涤根 钱康民

钱涤根（1887—1927），名刚，字涤根，父亲钱达知，字澜庆，世居吴江松陵镇，原在吴江县衙房科为吏，光绪八年（1882），任江西知县。钱涤根生于江西南昌，自小在江西读书。性情豪爽，器宇轩昂，思维敏捷，酷爱武术。

钱涤根还不到十九岁，就经胡懋臣、廖伯琅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进入江西常备军随营学堂，后改入陆军宪兵学堂学习，1911年毕业。第二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他随从李钧烈的新军，参加了光复江西的战斗。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钱涤根担任江西都督府副官长兼内卫队队长，加入国民党。

1913年（民国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钱涤根在江西湖口协助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被委以江西省军政府军法处处长。他执法如山，令行禁止，深得江西军民拥护。

1913年9月，讨袁斗争失败后，钱涤根避居日本。1915年8月，秘密回到家乡吴江。他经常外出联络革命同志，每次回来，都不断向好友、邻居宣传革命。

1917年7月，第一次护法战争爆发，钱涤根奉命赴上海，组织国会护法议员前往广州。1919年11月，第二次护法战争爆发，钱涤根积极参与其中。1922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钱涤根被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大本营命令传达所少校副官长。1923年3月，钱涤根任广东省增城（现为广州市所辖县级市）警备司令，随后因病回到吴江。

1925年7月，钱涤根到达广州，参加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战斗，担任



◎ 钱涤根像

东征军总指挥部谍报主任。12月，钱涤根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上尉处员，兼入伍生招待所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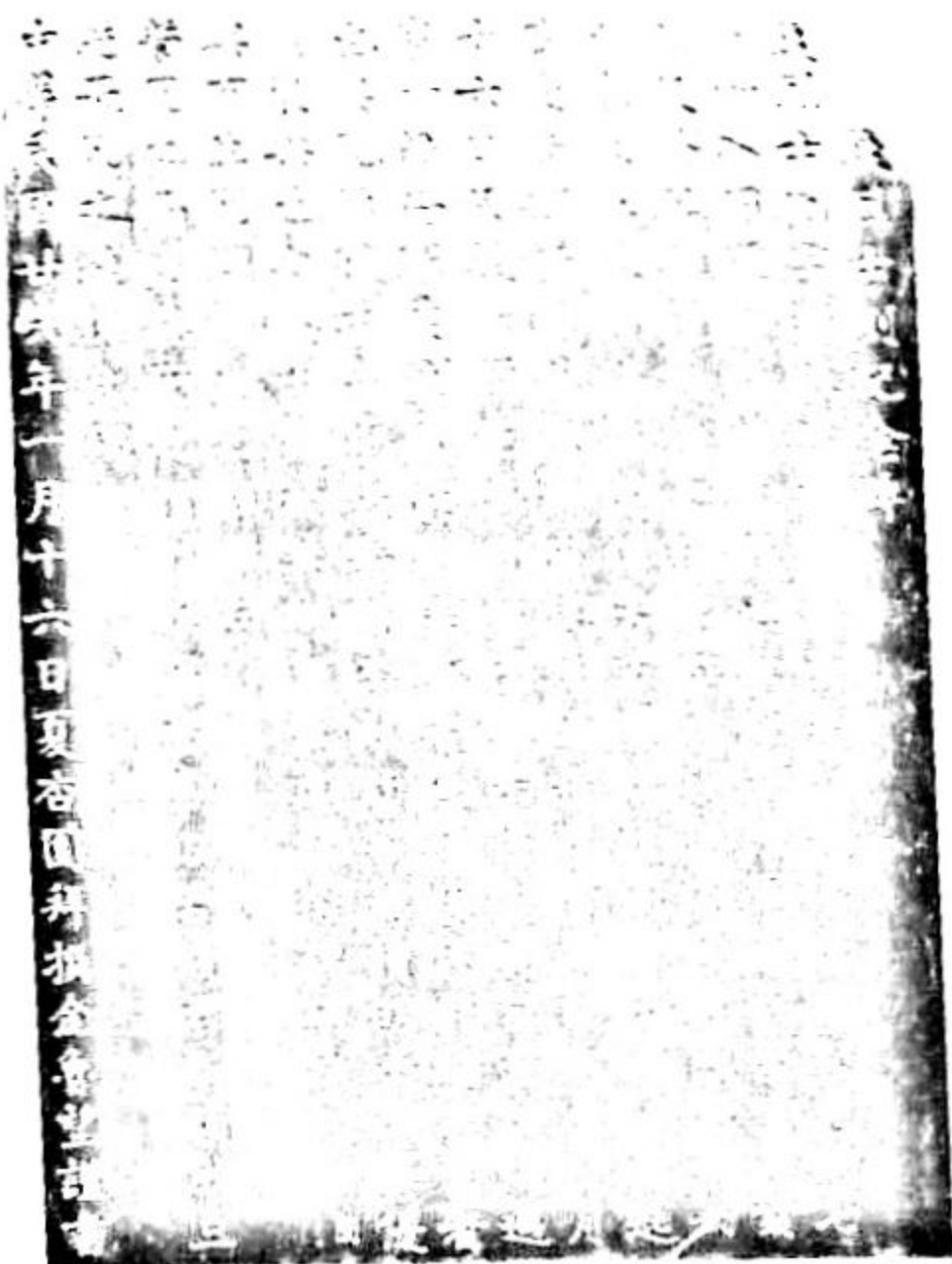
1926年5月，钱涤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处上校副官长，离开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组师正式北伐，钱涤根受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部的派遣，秘密潜入上海。在上海组织江苏省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以响应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14日，钱涤根部下第五支队司令许坦被捕遇难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钱涤根在同乡金天鸿的安排下搬往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1月15日傍晚时分，钱涤根进入新居时，碰到了原在上海市党部的熟人。他错愕之间以为市党部也有人住在此，未加注意，还是回到了家中。不到两小时，李宝章的便衣30多人包围了钱涤根的住地，冲到楼上，将刚吃完晚饭正在刷牙的他绑架而去。妻子刘氏被便衣击伤。

1927年1月16日清晨，钱涤根便在近郊龙华镇殉难。国民政府追授钱刚少将军衔，褒恤在案。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徐汇区龙华西弄171号附近钱涤根殉难地点为“涤根路”。民国二十六年（1937）5月，吴江公园内建“钱刚烈士纪念碑”落成，南向镌刻“钱涤根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系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写。抗战时遭日军破坏，胜利后修治，“文革”中破坏，1982年重修。

钱涤根儿子钱康民（1907—1939），在父亲牺牲后，入上海大学政法系，与父亲的好友何香凝、柳亚子及中共党员廖承志、王绍鏊来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在上海财政局工作，后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进入国民党江浙联防处任参谋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钱康民利用职务之便，将倾向共产党的同乡同学赵安民介绍给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特派员黄秉英。1938年8月，钱康民和赵安民分析了形势，同意“太湖别动队”收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挺进队独立大



◎ 钱涤根墓志铭

队。10月，日军大规模扫荡杭嘉湖地区，钱康民和赵安民率独立大队在双林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但终因孤立无援、弹绝粮尽而失败。

江浙太湖义勇军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仇视。8月23日，钱康民、丁秉成率部队行进到吴江七都吴淞附近时，遭到早已埋伏的国民党28军62师的袭击。在指挥部队突围时，钱康民左肋及前胸中弹牺牲。解放后，由浙江省长兴县追认为革命烈士。

（资料来源：江尔逊《追忆钱涤根将军》、朱建明《黄埔军校中的吴江人》、吴江党史办、民政局编《吴江英烈》）

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吴江黎里人，谱名慰高，字景山，后自改安如、人权，号亚庐，后称亚子，以亚子名世。笔名别号众多，有弃疾、弃疾子、青兕等。

柳亚子出生于江苏吴江分湖之滨北厍的大胜村，五岁入家塾，八岁读杜甫全集，十二岁开始作长篇史论。1900年，年仅十四岁的柳亚子私撰了《上清光绪皇帝万言书》，四个大纲，十多个子目，主张废黜西太后，确立光绪皇帝的正统地位，效法日本走维新改良的道路。1902年，柳亚子进学成了秀才，考试时结识金松岑和陈去病，后进入上海爱国学社读书。结识了邹容并约了二位同乡共同捐资出版了邹容的《革命军》。1905年在家乡创办《复报》，鼓吹革命，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沪淞口的海轮上秘密地谒见了孙中山先生。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了进步文化团体——南社。1923年，柳亚子又和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创建了新南社，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说：“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继新南社之后，1935年又成立了南社纪念会。从南社的前身1907年“神交社”开始，到1935年南社纪念会结束，南社存在了28年，柳亚子领导南社，共出版《南社丛刻》22集23册，其中第3到7集，第9到20集都由柳亚子编订印行。1918年冬，柳亚子集聚了有志保荐乡里文献的同人，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



◎ 柳亚子像

1923年，柳亚子受“五四”运动影响，在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提倡新文化。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

策，柳亚子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加入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始终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与党内的右派进行斗争。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柳亚子第一个起来反对



◎ 柳亚子全家福

这一提案，并且与蒋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5月8日，蒋介石从苏州派遣了十几个军警直扑黎里，搜捕柳亚子。柳亚子藏身于卧室后面的复壁之中，口占《绝命词》一首。由于前来做客的妹夫作了替身，柳亚子才幸免于难。他亡命日本。1928年回国。1932年被聘为上海通志馆馆长。1940年移居香港，因公开发表宣言斥责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8年元旦，柳亚子与宋庆龄、李济深、彭泽民等人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常务主席。1949年柳亚子从香港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此后

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柳亚子与毛泽东主席有着诚挚的友谊。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同毛泽东在珠江畔的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里首次相见，两人一见如故。1926年5月17日，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对柳亚子这位国民党元老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立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两人的友谊和“诗交”。1929年春，柳亚子写了《存歿口号六首》，每首怀念活着的和死去的各一人，其中第一首：“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两列宁，

原注：孙中山、毛润之。这首小诗把毛泽东和孙中山相提并论，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以后，知识界为之轰动。1932年，柳亚子作了《怀人四截》，其中第一截怀念并赞颂的就是毛泽东：“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看了何香凝为抗日所作的国画，上面有柳亚子的题画诗，在写给何香凝的信中称柳亚子为“人中麟凤”。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先生和毛泽东主席终于再次会晤，交往频繁而密切。柳亚子因从外面抄得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想请毛泽东抄录一遍以校正错误，结果毛泽东把自己于长征结束后填写的一阕《沁园春·雪》手写相赠。柳亚子一读，叹为千古绝唱，马上和了一阕，并且把它们放在“柳诗尹画联展”上展出，被重庆的报纸刊出，形成《沁园春》词大和特和的高潮。1949年2月，柳亚子在香港，接到了毛泽东主席从西柏坡村拍出的电报，欣然起程来到北京，这期间与毛泽东有几次和诗。1949年5月1日，毛主席亲自到颐和园益寿堂拜访柳亚子，后来又多次与柳亚子一同观看文艺演出，进行《浣溪沙》词的唱和。

1958年6月21日，柳亚子因长期患脑动脉硬化症逝世，首都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主祭并执绋送葬。

柳亚子是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近代诗人，他以诗歌为武器，呐

長征難明亦知天不難
私親念在德心國國一唱
雄師天下白首為樂亦有
不測請人與會更無前
和柳先生詞一首
毛澤東

◎ 毛泽东送柳亚子诗

恩樹兄鑒一考來函收到所云前之函書弟並未接
得能無遺失予未知信中何事有足備告弟者否
在梨與世功兄同在者財較中担任教課亦足樂也
惜弟才學淺薄况有誤人耳恩培兄在處否
兄代課諒世錄也梨地將成初中于教育事業有
大發展矣四高在建築中新屋宏偉門徑煥然
已非昔日而日兄何日來梨一談藉傾積懷乎此請
近安
弟無忌 啟
八月一日

◎ 柳亚子手稿

喊呼吁，鼓吹革命。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评论家茅盾对他的诗作过评价：“柳亚子是前清末年至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称他的诗为“史诗”。柳亚子非常珍重搜集的乡邦文献，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他“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不论古代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见存上海图书馆的这些吴江地方抄件、稿本，很多留下他所写的题跋。这些题跋，有记述文献来源，流传始末，收集经过；有涉及撰著年代、著者、辑者及收藏者情况；有交代校勘、增补、参订缘起；有与各种刊本、抄本的比较；更有若干有价值而一般不易查询的，还广征博引，多加考证。20世纪八十年代初，顾廷龙在谈及柳所写图书题跋时就说：“柳先生的题跋很有用，如果收集起来，可以考见其藏书之故实及吴江文献的史料。”

柳亚子一生著作宏富，主要有《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录》、《南社纪略》、《南明史纲史料》、《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等。

（资料来源：李海珉《吴江与南社》、曹雪娟主编《南社百杰》、张夷主编《南社百位辛亥人物与苏州·山塘》）

郑桐荪

郑桐荪(1887—1963),名之蕃,又名庚鑫,号桐荪,又号仲蕃、焦桐、无竞庵主人。吴江盛泽人。父亲郑慈毅,字式如,旧学功底深厚,性情纯厚,喜结交宾客,他建郑氏小学,也就是后来的盛湖公学,为镇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兼任商会会长,提倡实业。

郑桐荪就读震旦大学,后转复旦大学。1907年考取江苏省留美公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数学系。清末归国,曾先后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上海南洋公学,安徽高等学校和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等校授课。1920年到当时的清华学校任教,前后在清华执教共25年之久。他为清华大学原算学系创办人之一,也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郑桐荪回国后,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在清华学校,他与卓有贡献的数学教育家熊庆来、杨武之等人创办算学系,培养了陈省身、吴大任等出类拔萃的数学英才。

1922—1923年间,郑桐荪用英语教学生算术,让学生在班上练习用英语回答问题,回家后用英语做要交的练习题。他全用英语讲课,条理明晰,把一本《解析几何》讲得头头是道。有个叫周培源的学生,听了郑桐荪讲授的解析几何受到启发,开始用解析几何中的高平面曲线法求解,得出了两种解决三等分角的解析几何方法。郑桐荪对周培源取得这成果十分喜悦。在清华大学出版的第一期《清华学报》上,郑桐荪用周培源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周培源读到文章后深为感动。周培源1978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且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也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两家都住在清华园



◎ 郑桐荪像

西院，关系很亲密。杨振宁与郑桐荪的儿子郑师拙是同班同学。杨振宁小时候常去郑家玩，在杨振宁的印象中，郑桐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他们在郑家玩一种用五副牌九拼起来、四个人玩的游戏，规矩相当复杂，是郑桐荪教他们玩的。他偶而也参与孩子们的游戏，在游戏中开发孩子们的智力。

1932年起，郑桐荪被公推为清华评议会评议委员，作为教授代表参加了评议会的评议活动，此外，他还曾被学校聘为校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委员会主席，1933年一度还兼理系务。郑桐荪对学生，尤其是有才气的青年学生，关怀备至。有一次，郑桐荪谈到当时清华的杰出青年华罗庚，说这样有才气而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的成功。华罗庚在清华破格升为专任讲师，这是教育界别开生面的事，这应该归功于郑桐荪、熊亲来、杨武之对他才华的肯定。

1934年，郑桐荪受教授们荐举担任教务长，工作积极负责。1935年，中国数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中国数学会就应运而生。在成立大会上，郑桐荪被选为董事会的九名董事之一，其名字列陈建功、苏步青之前，成为我国数学界的顶梁人物。

古道热肠的郑桐荪对学生很爱护。解放前夕，教学系有一个研究生突然在一个寒夜悬梁身亡，这人来自福建，北方没有亲友，家乡未通邮，无法与家人联系。平时性格孤僻，与学生极少往来，后事办得很简单。郑桐荪为他选了坟地，立了墓碑，碑下还落款：郑桐荪立。这事让其他学生都深受感动。

郑桐荪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史掌故相当熟悉，对于中国的朝代和历代帝王的称号了如指掌，同时又颇爱研究字画，闲暇时到琉璃厂转转，也收罗了不少珍品密刊。晚年，郑桐荪著《禹贡地理新释》和《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当时，他与清华大学的国文老师汪鸾翔关系



◎ 郑桐荪爱护青年成才

密切，常常与汪鸾翔诗词唱和。他曾油印《河清歌》分送好友。柳亚子是郑桐荪的妹夫，当时，柳亚子家来访的人很多，他常到柳亚子家，代柳亚子接待客人。

1963年郑桐荪病逝于清华园。郑桐荪曾翻译柯痕的《微积分方程初步》，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他还翻译了薛尔伍德·戴劳乐的《微积分》，当时已年近七十，但没有付印。他著有《墨经中的数理思想》和《四元开方释要》、《吴梅村诗笺释》、《宋词简评》等。

（资料来源：复勃《悼念郑桐荪先生》、徐晋如《文理会通的典范郑桐荪》、柳无忌《舅父郑桐荪家传》、段学复《郑桐荪先生生平简历》、周培源《忆桐荪师》、王信忠《追念郑桐荪老师》、杨振宁《回忆郑桐荪先生》、萧树铁《怀念郑老先生——记几件小事》）

蓝公武

蓝公武(1887—1957),吴江同里人。1906年,十九岁的蓝公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张东荪介绍,他在日本结识了梁启超。他与张东荪、冯心支在日本共同创办了《教育杂志》。

蓝公武于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国,到德国学习哲学。不久,正遇长子出生,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回了国。这时,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蓝公武回国不久,即写成了《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较早地打出了反对尊孔复古的旗帜,及时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3个月后,受到袁世凯政治迫害威胁的蓝公武,追随梁启超等秘密离开北京赴上海,去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 蓝公武像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等人回到北京,把进步党改组成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蓝公武仍是它的重要成员,时人称他和张君勱、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

1918年11月13日,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世界大革命》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作了正面的评论。此后,蓝公武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连续发表15篇专论。他还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研究,连续发表了59篇论文,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评论。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每天的报道中心都是这场爱国运动。6月13日,该报又首先刊登了蓝公武所写的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受到当局严厉警告。陈独秀被捕不久,胡适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蓝公武

立即以“知非”的笔名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文章对胡适开了第一炮。

“九一八”事变后，蓝公武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在课堂上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的大儿子蓝铁年参加了反帝同盟，邀集同学创办火星读书会，并出版《时代青年》杂志进行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4月蓝公武参与了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活动，受到特务的严重警告。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蓝公武一家都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战爆发后，大队日本兵开进北平的时候，蓝公武几乎气得发疯。他在家拿起刀要把儿女们都杀掉，然后自杀，以免当亡国奴。他还拿把铁铲跑到街上，用冒火一样的眼睛瞪着一队队日本兵。日本兵把他痛打一顿，还要抓他，邻人说他是疯子，才把他救出送回家来。蓝公武由此大病一场。

病愈后，蓝公武继续去中国大学教书。他给学生讲经济学，完全按《资本论》体系讲述，对马克思主义再没有保留。人们开始说蓝公武是“粉红色的教授”。

蓝公武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宪兵队突然越墙闯进蓝公武的宅院来抓人。父子三人同时被捕。蓝公武在日本人面前毫不畏惧。后来因为蓝公武是日本留学生，把他放了出来。蓝公武出狱后，立即陷入破产的境地，租了一所极简陋的房屋，靠典当和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

抗战胜利的前夕，蓝公武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毅然决然地向党提出要求到解放区去。1945年8月下旬，蓝公武到了解放区，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中国共产党纪念建党25周年之际，蓝公武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感想》。

1948年4月，毛泽东从聂荣臻那里知道蓝公武在北区工作，派车函请蓝公武。蓝公武偕夫人郭英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谈了新中国的建设问题。9月，华北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蓝公武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与了主持，会上他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会后不久，他率领华北人民政府代表团去天津前线，慰劳参加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部队。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蓝公武以华北地区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大会，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副检察长。

1952年春节期间，毛泽东主席举办团拜会，并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爱

国民民主人士，蓝公武也在被邀之列。酒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提到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读过蓝公武的爱国反帝诗篇，还当场背诵了蓝公武1906年作的8首《民族祖国歌》中的一首。

蓝公武1957年逝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资料来源：冯晓蔚《蓝公武的传奇人生》、田露《蓝公武与“五四”前后的国民公报副刊》、《明珠璀璨——同里历代名人选》）

王绍鏊

王绍鏊（1888—1970），字恪臣，又作恪尘，后改为却尘，吴江同里人。王绍鏊出生时家道中落。父亲没有做官，在镇上当了名中医，热心为乡亲治病，很有人缘。王绍鏊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的王绍鏊体弱多病，母亲抚育他十分辛苦。母亲喜欢阅读历史故事小说，对古人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备受感动，反复地给王绍鏊讲薛仁贵征东、岳飞抗金以及杨家将、文天祥的故事，对王绍鏊影响很大。

王绍鏊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抱济世报国、科学救国之志。康梁变法时期，十二岁的他就写了《变法论》，引经据典，让长辈十分震惊。有一次，他偶然读到了一本由卢弼、黄炳言翻译的日本清水澄著的宪法书，立即被吸引住了，于是放弃了对理化学习，考入江苏省教育总会办的法政讲习所，开始探索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新的知识。

1908年，二十岁的王绍鏊东渡日本，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日本，他一面不断探索新的思想，一面认真苦读。三年后学成回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很欣赏王绍鏊的气度和才识，就邀请他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1912年5月，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并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王绍鏊感到十分失望，于是就离京南下。

1912年底，王绍鏊参加竞选，当选了众议院议员。他当了十年的议员，奔波于议会政治，还致力于国家政治改革，倡导明政，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1926年初，王绍鏊在中共党员侯绍裘的帮助下，



◎ 王绍鏊像

回家乡组织“新苏公会”，后又暗中联络了“全浙公会”和“全皖公会”组成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孙传芳的活动，策应北伐。

回到上海，他到横浜桥书店买了一批日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他把这些书带到天津，足不出户地闭门研读。1930年参加了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绍鏊先在上海发起“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接着又去北京，和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联络各方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王绍鏊写了一本名为《协力主义》的小册子，积极宣传他的“协力”理论，还联络各界，秘密组织“中华协社”。就在王绍鏊极力宣传他的“协力主义”理论的时候遇到了黄申芑。黄申芑是中共党员，给他讲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让王绍鏊豁然开朗。1933年秋，王绍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绍鏊以开明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暗中担负中共的重要任务。他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党组织派他利用以前与阎锡山交往的旧谊，到山西策动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

根据需要，中共党组织委派他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情报工作。同时委派他参与中共中央特科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

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

1945年12月30日，王绍鏊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

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王绍鏊和马夷老、许广平、徐伯昕等一起研究斟酌，制定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



◎ 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小组合影（前排右起第1人为王绍鏊，第2人为许广平，第3人为马叙伦，第4人为周建人）

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和政治纲领》的文件。1949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王绍鏊和马叙伦、许广平代表民进在东北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1948年底，他从香港经朝鲜抵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绍鏊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10月1日，王绍鏊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他还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和制定。

1970年3月31日王绍鏊在北京逝世。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王绍鏊的中共党员身份。

（资料来源：民进中央文史工作委员会编《王绍鏊》、林芷茵《王绍鏊传略》、严隽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顽强奋斗》、清华《王绍鏊：先天下之忧而忧》）

孙本文

孙本文（1892—1979），原名彬甫，曾用名孙共。字时哲，一字行健。吴江七都人。七都孙氏世代都是读书人，祖父为生员，在本乡教私塾。父亲孙祖福是贡生，也是私塾老师，科举制度废除后，曾任本乡小学校长。

孙本文从五岁时进入私塾，1906年入震泽民体学堂，第二年转入县城的江震小学，190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在吴江县立小学当了半年小学老师。1915年考上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大学——北京大学。

1925年6月，孙本文完成了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心理社会学著作，由此获得博士学位。当年9月，孙本文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进修高级社会学理论，兼学经济学，接受文化学派创始人乌格朋的教导，深受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1926年初学成回国，9月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回国当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介绍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的文章。第二年，出版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和《社会问题》两本学术著作，成为国内社会学提倡重视文化研究的第一人。1928年他又连续推出三本新著：《社会学ABC》、《人口论ABC》、《文化与社会》。

1929年2月转到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任教。9月起，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0年，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正式成立，孙本文当选为第一届正理事兼社长。《社会学刊》成了全国刊物，他仍为主编。孙本文“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作为奋斗目标，并于1930年在《社



◎ 孙本文像

会学刊》上首次明确提出。

抗战时期，他随中央大学迁校重庆，抗日战争胜利返回南京。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四大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孙本文在中央大学时期，发表社会学专著20多种，另主编的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有七八十篇。他的著述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有四种：《社会学原理》（上、下册），《社会心理学》（上、下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四册），分别探讨中国的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为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提供了线索和大量资料，而且提出中国社会学今后应从事的工作，为当今社会学者所称道：“孙本文是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书最多的社会学者。”

孙本文还编写了《统计学大纲》、《国民经济计划》运用于大学教育。这期间开始，他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经济学会理事、副会长，还担任了《江海学刊》编委。1955年起担任了江苏省政协委员。1957年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八亿人口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著名文章。1957年6月“反右派”以后，孙本文被迫参加对社会学的批判和对别人、对自己的批判。1962年起，孙本文调到新组建的政治系，讲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等课程，1965年讲授“哲学英语选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孙本文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升级为“专政对象”，一度下放到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劳动改造。“文革”中，他仍撰写了《论我国人口计划问题》一书，从而形成其中国化的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1972年上半年南京大学恢复教学活动，孙本文参加了《瑞士史》、《摩纳哥史》等国别史的翻译出版，后又参加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联合国文献资料。1976年前后，孙本文完成了《评论美国现代两位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威·杜威》、《评论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等译著，还着手著《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简介》，完成了《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草稿。

孙本文1979年2月1日逝世，一生著作丰硕，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

（资料来源：明强《孙本文先生评传》、万国雄《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孙本文教授》）

金诵盘

金诵盘（1894—1958），学名金日新，吴江黎里人，父亲金沧柏，通晓中医，是清末四大名医之一，被人赞誉为“江南独秀”。金诵盘耳濡目染，自幼喜爱医学。

金诵盘先在黎里读私塾，后随父亲行医到嘉兴。1908年进入同济医学院求学8年。毕业后，在上海嵩山路开设了一家“崇仁医院”。这时，经柳亚子介绍，金诵盘结识了孙中山。

1917年7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他决定随孙中山去广州。到广州后，孙中山成立了大元帅府，金诵盘一直在孙中山身边，担任保健医生。为了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2年秋，金诵盘关闭了崇仁医院，变卖了大部分医疗设备，又将张静江送他的环龙路公馆卖掉，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孙中山。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应孙中山之邀，金诵盘也带领全家南下广州。金诵盘到时，恰逢孙中山病重，他不分昼夜，守在孙的身旁，终于使孙转危为安。孙中山病好之后，派邓彦华和陈耀祖送来一块匾，上书“是医国手”四个烫金大字。

孙中山先生常常因为操劳过度而病倒，都由金诵盘医治。1925年孙中山北上，未到北京，肝病已经复发，抱病坚持到达北京，急忙电召金诵盘进京。可是，等金诵盘风尘仆仆赶到，孙中山先生已于3月12日病逝。

金诵盘由北京回到上海，正遇上“五卅”惨案，他带上红十字袖章，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员的工作。1926年3月，蒋介石为了反对共产党，挤走汪精卫，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押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把周恩



◎ 金诵盘像

来软禁在造币厂。金诵盘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造币厂，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干？劝他不要步陈炯明的后尘，做陈炯明第二。在金诵盘的责问下，蒋介石不得不放了周恩来。

北伐开始后，金诵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部野战卫生处处长，随军出发。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金诵盘十分愤懑，于是称病告了长假。1930年他愤而辞官为民，回到上海，租下张静江之弟张澹如的房产，开设了一家静安医院。不久，他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医师公会理事长。这期间，治好了宋美龄的神经性皮肤病，他为西安事变后被关押在雪窦寺的张学良看过病。

1937年“七七”事变突起，转瞬波及淞沪，金诵盘将资产颇丰的静安医院捐献给红十字会，包括所有的医疗设备和一切药品器械。9月份到南京，被任命为野战救护处中将处长，组织成立了第二救护总队。他在战火中指挥救护队抢救伤兵，还亲自操刀为伤员们动手术。11月底，南京战况越发吃紧，各机关纷纷迁往武汉。野战救护处留下来的只有金诵盘等5人。他指令几名官佐陪同，顶着凛冽的寒风视察了陆军总医院、海军医院和宪兵医疗所，向千余名伤病官兵分发了慰问品和现金，稳定军心。

蒋介石以政府名义聘请盟弟金诵盘出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中将军衔，负责全国野战医院的领导和战时后勤支援、救护、防疫等工作，再兼国民政府侍从室医生。

随后蒋介石请他赴延安劳军。慰问团由金诵盘任团长，抵达杨家岭时毛泽东接见了。金诵盘向毛泽东说了运送救援物资及慰问西北战区的情况，也谈到了蒋介石要联合抗日。延安之行对他教益很大，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南京，对蒋介石的作为深感不满，借口辞去官职，一心从医。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1948年底，金诵盘尽辞一切职务回到上海，租了一幢小楼，深居简出，避免社交应酬。此时，金诵盘接到周恩来手书，信中劝他不要轻易离开大陆去台湾，请他郑重考虑，并且告诉他蒋介石拟定了一个党国要员去台的名单，其中就有金诵盘之名。果然，没有几天，蒋介石派行政院李秘书长送来一张机票，请他去台。他表示不想再离开故土。

1949年解放前夕，他离开上海，与夫人带着儿子金定国，一家人返回故乡黎里开业行医，以医术服务桑梓。之后，金诵盘先后担任苏南行署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顾问等职，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年，患胰腺癌医治无效逝世。

（资料来源：檀力《“是医国手”金诵盘先生》、陈凤尤《蒋介石的拜把金诵盘》、李海珉《是医国手金诵盘》、《“是医国手”金诵盘在南京陷落的日子》、金甯《金诵盘延安之行》）

金国宝

金国宝(1894—1963)，字侣琴，吴江县同里镇人。少年时代读私塾，有较扎实的古文功底，1910年底同川小学毕业，第二年春天进入苏州两级师范学校。

1914年2月金国宝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学习经济学。他在复旦公学时参加学生会工作，结识了一批有识志士，关系比较密切的有太仓人俞颂华等人。1917年金国宝从复旦公学毕业，曾在吴江中学任英语教员。

1919年4月，俞颂华留学日本回国，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金国宝经常为《时事新报》撰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

当时，俞颂华参与《解放与改造》杂志编辑工作。《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是张东荪主编，上海出版，当时是一份相当进步的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刊物。1919年9月1日，金国宝用金侣琴名字在《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他在复旦公学时从英文转译的李宁（即列宁）论《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一文，这是我国最早中译的列宁著作。其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先生的资助下，金国宝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攻统计学，获硕士学位。

从1924年起，他即着手编写统计教材。他最早的著作是《英国所得税论》。1925年，金国宝的第一部统计学专著《统计新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第二年，金国宝出版了《统计新论》和《物价指数浅说》。《物价指数浅说》一书，着重介绍了伊尔文·费喧的指数理论和方法，是我国最早论述有关指数编制理论、方法的著作之一。同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文，从统计学的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此，



◎ 金国宝像

使国内学术界对这位留美统计学硕士刮目相看。上海复旦大学聘请金国宝任教授，讲授统计学原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金国宝所在的中央银行先迁汉口，后迁重庆，他亦随之西行。同年8月，淞沪战役开始了。金国宝对文学也有造诣，曾自署《侣琴诗存》一书，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所作。金国宝的女婿是年轻的中国空军中的一员，参加了“八一四”空战，给来犯的日本空军以沉重的打击。金国宝怀着一腔爱国之心，写下《从军行》诗。

1938年8月24日，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新六和交通银行总行董事长胡筠，被国民政府定为赴美争取美援的代表团首席代表，应召从香港飞重庆，飞临广东中山海面上空时，被日本飞机击毁，机组人员、旅客同时罹难。金国宝曾在胡筠的交通银行干过，公私私谊都是很好的。师友不幸罹难，金国宝痛哭胡筠写下了《哭二先生诗》。

1947年9月，金国宝与朱君毅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统计学会第25届会议。1930年，金国宝与朱祖晦、刘大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统计学社，金国宝当选为社务委员会副主席。1948年8月，金国宝还著有《凯恩斯之经济学说》，这是我国较早探索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国宝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统计专修科、贸易专修科主任。1950年，他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会员。他在教育岗位上任劳任怨，已经五十六岁了，还不满足已有的知识，自学俄文，参阅苏联的统计资料，增添新的内容。为开设高级统计学这门课，他还曾到数学系旁听微积分方程。他教工业统计时已年逾花甲，还亲自带学生到上海橡胶厂、自行车厂实习。在复旦教学其间，他又写了《工业统计学原理》和《高级统计学》两书。1952年，金国宝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市委委员，1956年，金国宝以上海市特邀代表身份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听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在小组上发言，他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1963年2月15日，金国宝在上海逝世。

金国宝主要著作有：《统计学大纲》、《英国所得税议》、《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中国币制问题》、《工业统计学原理》、《高级统计学》等。

（资料来源：柳浪《中译列宁文著第一人——复旦校董金国宝》、王晓华、吴菊英《金国宝及其〈侣琴诗存〉的史料价值》、钟风《金侣琴——最早中译列宁著作的人》、《明珠璀璨——同里历代名人选》）

孙本忠

孙本忠（1897—1968），字颀绳，吴江七都人。父亲孙祖禄是贡生，当过小学校长。哥哥孙本文是社会学家。

孙本忠的家乡七都一带是无地不桑，无家不蚕，孙本忠年幼时在课余时间跟随母亲养蚕，耳濡目染，萌生爱蚕的心，以后就走上了研究蚕学的道路。1917年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公费就读。当时，邹秉文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高校农科的教材，多采用日本欧美的课本，并不能结合中国实际，邹秉文就带着学生，经常到郊外去采集病虫害标本，并根据实地考察之所得，反复修订讲义，夜以继日地工作，孙本忠得益匪浅。

1924年，孙本忠由邹秉文推荐和资助赴法国留学，先入蒙贝里农业专科学校蚕科。二年后毕业，再考入里昂大学动物学系研究蚕体生理，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任江苏省农矿厅蚕丝技正，负责全省蚕丝改良工作。两年后，经梁希介绍，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

应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之聘去该所，孙本忠任技正兼蚕桑系主任。这时他风华正茂，决心以改良蚕品种作为终身事业。于是，在南京孝陵卫开辟桑园，建造蚕室，购置设备，开展正规化的家蚕选种工作。他一手抓本地种的选择改进，一手抓引进改良种的利用。他除了在实验室亲自养蚕选种外，还非常关心祖国蚕丝业的发展，曾在电台广播了《中国蚕业复兴有望》的演讲，在我国蚕丝业奄奄一息的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1937年他发表论文《家蚕育种时试验技术之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本忠随中农所内迁，颠沛流离，先后借用湖



◎ 孙本忠像

南省长沙农校蚕室、四川丝业公司北碚制种场蚕室、南充蚕丝试验场、西充制种场等蚕室继续他的育种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第二年中农所迁回南京孝陵卫。1947年孙本忠继续开展双杂交试验。1948年在《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了《家蚕双杂交试验》的论文，指出双杂交种有利于提高蚕种繁育系数。年底孙本忠到中农所的嘉兴工作站工作，借中国蚕丝公司嘉兴蚕种场进行研究工作，同年任中国蚕丝协会委员。

孙本忠从1949年开始从事褐园斑纹伴性种和普通斑纹伴性种的杂交培育工作。华东蚕业研究所（后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正式成立。孙本忠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养蚕系（后改为蚕种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已经年逾半百，但以旺盛的精力和顽强的毅力，领导全系开展家蚕育种工作。还刻苦钻研俄语，学习米丘林学说，借鉴其挚友朱洗教授的选择受精、混精杂交理论，创造出一雌变多雄的混精交育种法，还吸取日本田岛弥太郎的辐射育种成就，进行黑白卵诱变育种试验。

1955年在全国桑蚕选种与良种繁育会议上，孙本忠主持制定家蚕选种工作试行方案，经中央农业部批准后，成为我国家蚕育种的基本准则。后又详细制定蚕种保育选育鉴定方面的一系列细则。1960年，他亲自编写了《中国养蚕学》的第二章《蚕的品种及其选育》，总结了新蚕品种选育的方法和经验，加上他历年发表的有关蚕育种试验等论文，以及生物统计等方面的各种讲义，构成了他对我国现代家蚕育种工作的规划、设计、理论、技术、经验总结的大全，堪称为我国现代家蚕育种学的奠基人。

孙本忠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江苏省常委。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他被聘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理事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迫害。1967年患食道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68年8月10日去世。临终前，他叮嘱子女将他最后写的论文交给国家，将专业书籍捐给蚕业研究所。“文革”结束后，1978年在镇江蚕研所举行了孙本忠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推倒了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资料来源：吴玉澄《我国现代家蚕育种的奠基人之一——孙本忠》、高一陵《怀念孙本忠先生》、周德华《吴江丝绸志》、王福海《华东蚕业研究所成立及其筹建工作回眸》）

严宝礼

严宝礼（1900—1960），字问聃，号保厘，吴江同里镇人，以运算敏捷精确著称。1920年进铁路局任会计稽核，又集资开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的广告。

1938年1月25日，严宝礼等人创办的上海《文汇报》正式创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为《淞沪之战六周年纪念》。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进步作家柯灵为副刊编辑，创刊初期的《文会》刊载了从延安和敌后寄来的书简和上海一些进步作家的文章、小品。《文汇报》创刊后，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但被敌伪当局视作眼中钉。2月初，上海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备组织伪政府，温完尧、梁鸿志等跃跃欲试。2月18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民族败类作出警告。

2月10日，报社的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从大门口窜进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穿蓝布衫裤的汉子，只见他拿出一颗木柄手榴弹往里掷，“轰”的一声顿时一片烟雾腾腾，四周的玻璃窗全被震碎，写字台被毁坏，顶上的天花板吊灯也都掉了下来，营业员陈桐轩殉职，广告员毕祉芬、萧岫卿被炸伤。报社面临严峻的考验，但严宝礼的办报方针没有改变。2月11日，副刊《文会》改为《世纪风》，开始连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以后《文汇报》编辑部恐怖事情接连发生，如：收到的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血淋淋的手臂；有人送来一筐水果，里面所有苹果和橘子都注射了毒药；敌伪买通了一个印刷工人，把一枚小炸弹带进机房等等。在频频威胁下，严宝礼依然坚持抗日立场，不改初衷。



◎ 严宝礼像



◎ 严宝礼创办《文汇报》



◎ 文汇报

正因为《文汇报》在读者中声誉卓著，汪伪政府想收买《文汇报》，严宝礼予以拒绝。1939年5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一则题为《汪派分子白日做梦》的新闻。5月16日，《文汇报》刊登重庆来电“蒋介石在生产建设会议上的演讲辞”，同时还配发了社论。5月18日接到英国驻沪领事馆通知，判令《文汇报》及《文汇报晚刊》停刊两星期。至6月1日，由于克明（英国人，时任《文汇报》董事长，后被日本人收买）的阻挠，报纸未能复刊。

从《文汇报》被迫停刊到抗战胜利前夕的六年多时间中，严宝礼以经商为掩护，并挂名为国民党中央宣部东南办事处专员，经常往返上海和屯溪之间，与内地互通生气，时刻为抗战胜利后复刊《文汇报》做些准备。1945年春，日本宪兵队对上海文化界的一次大逮捕中，严宝礼以及柯灵、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均遭逮捕，囚禁在日本宪兵队，备受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后经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后，《文汇报》正式复刊。严宝礼因对宣传抗战有功，获得蒋介石颁发的“胜利勋章”。《文汇报》开始走上民主进步道路的转折点。3月29日，《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在和谈破裂，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和公开发动内战之际，国民党有关方面曾三度派人与严宝礼接洽，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遭严宝礼拒绝。

1947年5月，《文汇报》连续以大量篇幅如实地报道了上海和各地爱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轰轰烈烈运动的真相，触怒了国民党最高当局。5月25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悍然下令将《文汇报》停刊。《文汇报》社遭查封搜查，由于严宝礼拒绝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复刊条件，《文汇报》一时无法在上海出版。

1948年9月9日，在严宝礼、徐铸成等人的努力下，香港《文汇报》创刊。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文汇报》再度复刊，严宝礼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

总经理。

严宝礼后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因积劳成疾，1960年11月18日在上海病逝。

（资料来源：钟凤、存真《〈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李伟《报人风骨：徐铸成传》、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汤海山《严宝礼初创文汇报》、《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从风雨中走来》）

徐蔚南

徐蔚南（1900—1952），原名毓麟，笔名半梅、泽人，吴江盛泽人，父亲擅长诗词，为当地医生。徐蔚南幼年跟从当地名儒孙星华求学，后毕业于盛湖公学。稍长进入上海震旦书院（震旦大学前身），由法国神甫执教，受到严格的教育，打下了很好的法语基础。十七岁时考取官费留学生留学日本，毕业于庆应大学。



◎ 徐蔚南像

1923年7月，因《新黎里》报被封，徐蔚南与徐遽轩激于义愤，斥资创办《新盛泽》报，徐遽轩为主编，与各镇陆续创办的新字头报纸相互呼应。《新盛泽》报在徐氏兄弟的主导下，敢于刊登列宁的文章，刊登宣传和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文章。在孙中山北上谈判时与《新黎里》报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吁请召集国民议会，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纪念活动、发表纪念文章。徐蔚南在《新盛泽》上连续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研究》、《孙中山先生不死》、《列宁死了》等文章。

1923年徐蔚南主办了《前进》半月刊，不久，加入上海青年进步学社。徐蔚南创办的《前进》引起了柳亚子的注意。柳亚子在黎里读到后，十分赞赏。徐蔚南回函柳亚子，记述了他在绍兴的游历。柳亚子读了书信，爱不释手，立即将此信在《新黎里》报上刊登出来，还在信后加上赞语。两人由此而缔结了忘年之交。

徐蔚南客居绍兴时，足迹踏遍古城内外、会稽山巅，饱览越中山水，写下了许多轻灵而优美的散文，这些作品最初发表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后来收入与王世颖合著的散文集《龙山梦痕》一书，

此书是徐蔚南的代表之作，为稽山鉴水添上了多彩的一笔，其中《山阴道上》收入中学国文教材。

徐蔚南与沈雁冰相识在1923年，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沈雁冰的赞赏。于是，沈雁冰就介绍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3年开始，徐蔚南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有新诗《狱中人》、《微笑》、《勃来克》等，从此步入文坛。

1924年，徐蔚南经柳亚子介绍加入了国民党。8月24日，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大会在盛泽召开，徐蔚南赶回盛泽，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并在家接待会议代表。

1926年，徐蔚南到复旦实验中学任教，后历任浙江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28年出版了《小小学温情》、《艺术家及其他》、《三民主义教育》等。1929年出版了学术论著《艺术哲学ABC》。在新南社社刊中，徐蔚南发表了其译自日本国木田独步的《一张画的悲思》、法国梅特林克的《赞剑》。他精通英、法、日、俄等语，对法国文学尤其有精深的研究，后来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上海通志馆成立，柳亚子为馆长，聘请徐蔚南任编纂主任。徐蔚南收集和出版了大量的上海资料，组织了通社，在《大晚报》上开辟了“上海通”专栏，对上海的历史沿革、政治外交、租界、金融、教育、社会事业、学术团体、出版刊物等情况作了广泛的考查和深入的研究。

1932年出任《民国日报·觉悟》、《大晚报·上海通》、《ABC丛书》主编。1933年，徐蔚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奔波》、散文集《春之花》、《水面落花》，1935年出版了小说集《都市的男女》，1936年出版了散文集《乍浦游筒》等。

1935年南社纪念会成立，徐蔚南任编辑部主任，在南社纪念会中，徐蔚南素有“天英星小李广”的雅号。1937年春，邵力子任南京中央宣传部长，徐蔚南被邀任主任秘书。

1938年秋，在上海与南社社员胡朴安一起创办《正论》社，制造抗日舆论。徐蔚南曾两次与共产党驻沪人员晤面，商谈抗日反汪事宜。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各报馆关闭，《正论》社也解散。日本军队进入上海，徐蔚南闭户不出，以典卖衣物度日。日方东亚文书院院长大内原与徐蔚南相识，胁使他当研究员，徐蔚南断然拒绝。他的居处受到监视，处境艰险。1942年底，他于夜间从屋顶露台翻出逃亡，赴浙江屯溪，转往桂林，直抵重庆。中宣部长张道藩约请他当专门委员，徐蔚南婉言推辞。他孤身一人在重庆靠卖

文苦度光阴。当时，他生活窘迫，身患疾病，无力顾及沦陷区的妻子儿女。

抗日战争胜利，上海通志馆恢复，因柳亚子去香港，改由胡朴安任馆长，徐蔚南任副馆长，继续致力于上海通志的编纂工作，还出版了《上海市大观》一书，徐蔚南作序。后上海通志馆改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徐蔚南任副馆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徐蔚南任职于文献委员会，致力于翻译《苏联短篇小说选》、《胡志明传》等。徐蔚南多才多艺，不仅在文学和翻译上有所建树，他平生爱护、提倡美术不遗余力。著有《中国美术工艺》、《顾绣考》、《翦画选胜》。由于积劳成疾，1952年1月病逝于上海。

（资料来源：李海珉《吴江与南社》、李炳华《吴江才子徐蔚南》、《徐蘧轩徐蔚南》、胡一鸣《画坛逸事三则》、萧海铭《直将歌哭换乾坤——徐蘧轩、蔚南昆仲及其家族两三事》）

毛啸岑

毛啸岑（1900—1976），名兆荣，字啸岑，吴江黎里人。1914年树人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毕业后在黎里任教。1923年，任第四高等小学校长。

1924年1月，毛啸岑由柳亚子先生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4年至1926年，吴江县党部先后举行五次代表大会，毛啸岑积极配合柳亚子参与筹备工作，又协助柳亚子创办《新黎里》担任副总编，宣传国民革命与三大政策。吴江县署奉省长公署之命，勒令《新黎里》报停刊，毛啸岑则雇了一条小船遍游吴江18乡镇，向各界人士说明事实真相，为《新黎里》复刊做了大量工作，后任《新黎里》总编辑。

1925年10月，毛啸岑被县教育局选为县督学。翌年，遭孙传芳通缉，幸亏提早得到消息，即离开黎里遁迹上海，到暨南大学任教。

在上海，毛啸岑结识了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的中共党员侯绍裘，出任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兼任《神州日报》与《中南晚报》编辑。1927年2月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侯绍裘遇害而手续未办。

1927年初毛啸岑在上海相遇了同乡王绍鳌，参加了三省联合会和新苏公会的工作，参与了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侯绍裘遇难后，毛啸岑回吴江。又遭查捕，便往浙江西塘镇避难。同年9月，受吴江乡村师范之邀，出任教师。

1930年初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就是“第三党”。毛啸岑在吴江发展“第三党”党员。短短几个月时间，吴江“第三党”党员在城区内已达六七十人。不久，成立了区党部。吴江乡师后来发展到50多人，成立了支部。还意图配合“第三党”建立武装队伍。1931年，邓



◎ 毛啸岑像

演达被捕，毛啸岑受命辞去乡师教职，以南京国民党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员的身份担任联络员，在南京营救邓演达。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被杀害。当时，毛啸岑拒绝与汪伪合作，并在上海与张曙时他们一起继续组织“第三党”党员进行反蒋活动。1932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毛啸岑被派遣至杭州与团长许源浦会面，进行军事活动以声援上海。积极向各界人士宣传“第三党”抗日《紧急宣言》，曾被提名为中央委员。谭平山在汉口宣布“第三党”解散。毛啸岑辞去了遗族学校的任职后到了上海，先后任南洋高级中学、私立中学、正风文学院等教职。1935年9月，毛啸岑进入招商局会计室工作。

1939年，毛啸岑离开上海赴香港，由王绍荪介绍，在中共党员徐明诚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香港沦陷后，毛啸岑又辗转到达重庆。经柳亚子介绍与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等相识。1946年5月，毛啸岑回到上海，在王绍荪领导下参加情报工作。不久结识中共地下党员叶景灏，在上海筹建了“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毛啸岑担任了总经理。一方面，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利用金融界的地位，团结一批中小银行中的上层人物，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好准备。公司建立起一套暗账，逐月将账面的盈利暗暗转入，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1949年初，毛啸岑积极配合叶景灏等中共地下党员，对金融界上层人士做工作，为安定人心，迎接解放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后没几天，毛啸岑就找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刘晓，后来中共党组织让他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更有利于为党工作。1952年在上海工商业中组织联营集团，又把联营集团推向公私合营，任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53年3月20日，出席上海市第一届第三次工商业代表大会，1954年出席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到迫害，1976年2月13日在马鞍山因病去世。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毛啸岑被错划为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毛啸岑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在上海龙华火葬场大厅为毛啸岑召开了追悼大会。

（资料来源：邵子敬《南社人物传·毛啸岑》、李海珉《吴江与南社》、毛安澜《我的父亲毛啸岑》、俞前《毛啸岑》）

张应春

张应春(1901—1927)，名蓉城，字应春，后又取字秋石，曾化名金桂华，吴江北厍葫芦兜人。父亲张农，原名肇甲，字都金（一作多金），号鼎斋。清末秀才，自小喜好吟咏，与四位堂兄堂弟并称“葫芦兜五子”，南社社员。张应春自小在当地私塾读书。悟性好，进步很快。1916年，张农应聘黎里女子小学（高小部）任教，张应春随父去黎里住读。黎里女校校方迫于政治压力，规定学生记载《课堂日志》时，一律使用“洪宪”年号，张应春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在《课堂日志》填上“民国五年”四字。



◎ 张应春像

1922年张应春毕业于上海中国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在校时，她曾作为女子体校学生代表，前往青年会参加上海各校学生代表会议，还参加了上海各界国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罪恶阴谋。毕业后，她到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担任体育教员。第二年，因患丹毒，回家乡医治，留家期间张应春与柳亚子先生相识。

1923年秋天，张应春经柳亚子介绍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任教，先后结识了共产党员侯绍裘、国民党左派朱季恂等同志。1924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张应春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8月24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盛泽镇东庙书场秘密召开，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正式宣告成立。张应春与柳亚子、侯绍裘、朱季恂、邵力子等一起出席了大会。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成立之后，《新黎里》等“新”字号报纸发刊，张应春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6月2日张应春与柳亚子、毛啸岑等十三

人出席第四区分部会议。6月30日，黎里全镇罢工、罢市、罢课，张应春与三千多群众怀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当日的“五卅”殉难烈士公祭大会。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张应春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1925年张应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张应春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她认真撰写并递交了江苏妇女运动书面汇报，提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两项议案。

1926年3月8日，由张应春担任主编的《吴江妇女》创刊，她亲自撰写文章，阐述妇女解放与国民革命及阶级解放的关系。《吴江妇女》发行工作也由张应春亲自承担，为了广泛联系读者，她勇于承担风险，特在每期刊物封面注明了通信处：“上海望志路永吉里41号张应春转”。她为编印《吴江妇女》呕心沥血，亲自撰稿、约稿、编辑、筹划经费。

1926年3月12日上午，江苏省党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登台讲演的人很多，一个接着一个，听讲的连声热烈赞叹。张应春以省党部妇女部长的身份登台讲演。她阐述了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关系，猛烈抨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政策，号召妇女起来为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努力奋斗。会后，大会组织与会群众在夫子庙贡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张应春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精神抖擞地走在各界妇女队伍的最前面。

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她四出奔走，连日参加开会演讲、游行示威。张应春一面领导更为激烈的实际斗争，一面坚持主编《吴江妇女》。



◎ 张应春（左一）在上海中国女子体育学校与同学们习刀舞

1926年下半年，张应春被推选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济难会委员。

岁暮时节，张应春因繁重的工作积劳成疾，被迫回家疗伤。国民革命军进驻黎里后，镇上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张应春在会上慷慨演说，欢迎

北伐军的到来。

1927年4月，张应春在黎里家中接连收到侯绍裘三封急电，要她速往南京赴职。她不顾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毅然前往南京赴职。4月9日，蒋介石下令逮捕共产党员，捣毁了省、市党部。10日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在大纱帽巷10号召开省、市党部及各革命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应变对策。刑侦队包围了会场，张应春、侯绍裘等10人遭到逮捕。

张应春等人被秘密关押在珠宝廓（今白下路西段）的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张应春等坚贞不屈，坚持斗争。张应春被吊打了一天一夜，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可是除了“我是共产党员”一句话外，敌人一无所得。

大约在被捕后三四天的一个黑夜，张应春等被捆入装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活戳死，偷偷用汽车运至南京通济门外，抛入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殉难南京，张应春虚龄才二十七岁。

革命是我唯一的
依靠于是对了主
义的理海方面
策略的书籍
多是欢所先
注重
勤妇女
的工作

◎ 张应春手稿

1928年，柳亚子和沈长公及张氏亲属在北库莲荡南滩营建了张应春烈士的衣冠冢，墓碑铭文“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题。1986年北库建张应春烈士纪念馆，1991年扩建为张应春烈士纪念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和苏州横山烈士陵园都展出了张应春事迹的资料，吴江公园尊立张应春烈士雕像，张爱萍将军为雕像题词：“张应春烈士永垂不朽！”

（资料来源：柳亚子《秋石女士传》、顾美珍《张应春传》、倪新宇、纬月林《巾帼英雄张应春》）

费 巩

费巩（1905—1945），原名福熊，字香曾、寒铁，吴江同里人。父亲费树蔚，喜读近代名人传记，过目诵心，称为奇才。辛亥革命后，为肃政厅肃政史。袁世凯称帝，他直言极谏，不被采纳，于是拂衣而归，退隐苏州。与吴县张仲仁以诗文相质，世称“二仲”。母亲是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女儿。

费巩七岁时在苏州读书，十二岁时，与哥哥费仲焘一起到上海读书。1923年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1926年复旦大学毕业后，离开上海，赴法国巴黎，后又去了英国伦敦，1929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1931年获硕士学位。

费巩回国后，在中国公学任职，还兼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发行了费巩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1933年秋，费巩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并兼注册课主任。

费巩在浙江大学经常在文章中指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政治。1935年夏天，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想让几名同学退学。费巩一经查核胡乔木的成绩明明是80多分，而布告上说不及格，这是个阴谋，因为浙江大学发生了驱郭运动时，胡乔木是领导成员之一。费巩拿着学生的成绩册直言责问郭任远：“学生们一股爱国热情，要求政府抗日，他们的精神非常可贵，这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怎能说成是煽动闹事呢？”郭任远仗着国民党后台的支持，还是将胡乔木等进步同学强行开除了。费巩得此消息，专门约请了胡乔木到家里。他肯定了胡乔木等同学的正当活动，并对未能阻止校方开除一事表示歉意。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江大学举行全校大罢课，费巩站在了学生的一边。最后郭任远被迫离校。1936年4月，竺可



◎ 费巩像

楨到浙大任校长。

1940年7月，浙大学生训导长姜琦在学生的一片反对声中黯然下台后，竺可桢希望费巩来继任，最后，他以代理、不拿薪水等条件接受了这一任命。

费巩公正刚直，胸襟坦荡，他推行导师制、改善学生的食住行用、请医生、除臭虫等政策；他表明要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用感化而不用压力的立场；他寄希望于学生做到合作、守法、自治、虚心这四点。

在任训导长期间，他见学生宿舍的油灯太暗，严重影响视力与身体健康，就拿出自己的薪金，亲自试验植物油灯，最终发明了亮度稳定又可以加罩的油灯。他出资制作了800多盏分送到学生宿舍，供学生们学习之用。学生们感动其关爱之情，亲切地称这种油灯为“费巩灯”。

费巩曾一次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他教学非常认真，同时也强调民主、言论自由，他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批评时弊，关心国事。“生活壁报”也由此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就以纵容学生、阻碍国民党党务活动等罪名迫使费巩去职。

费巩对国民党特务统治十分憎恨，分别在《宪政》、《东方杂志》、《民宪》、《思想与时代》、《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还多次公开演讲，申明政治主张，这些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5年1月，费巩在浙江大学任职满十年，获准休假一年，他答应复旦大学的邀请，前往北碚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

3月5日凌晨两点多，费巩和学生邵全声去码头坐船。到达码头时，邵全声到二三十米外的囤船舱库去取寄放的行李，费巩在船仓门口等着。等邵全声一离开，就有特务上来哄骗费巩离开码头，费巩一离开码头，一群隐伏的特务蜂拥而上，把他拖上了囚车，关在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内，后来关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的特别监狱。

费巩的失踪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都召开了



◎ 费巩自制“费巩灯”

营救会议，《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都有报道。1946年1月，旧政协开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八条要求，其中第七条提出：立即首先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费巩5人，这些都使国民党当局陷入窘迫的境地。

社会上，反对迫害民主教授，反对特务统治的呼声越来越大，于是，蒋介石指令要迅速杀害费巩。在杨家山附近有一个化学池，里面注满了猛烈的硝酸水。特务们把费巩杀害了，为了灭迹，惨无人道地将尸体投入镗水池里“化”掉了。

1978年9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批示：“同意追认费巩教授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1979年10月，浙江大学召开费巩烈士纪念会，1980年3月16日，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怀念会暨费巩衣冠盒安放仪式。

（参考资料：正棠、玉如《费巩传——一个爱国民主教授的生与死》、邵全声《暗杀？避难？扑朔迷离的费巩失踪案》、张燕《“费巩亭”寻踪》、傅国涌《再说费巩之死》）

倪征燠

倪征燠，吴江黎里人，父亲倪寿康是个秀才。他三岁时，一场大火烧毁了他家的祖屋，全家迁居平望镇。倪征燠相继在平望和黎里读了私塾和小学。儿时酷爱看《包公案》、《施公案》一类的公案小说。八岁的时候，常和父亲对对子。有一天，他在书桌上写了两行字：“今日貌乎一学童，他日中国主人翁。”父亲看后高兴地称赞他：“此子今后非池中之物。”

倪征燠考入上海虹口区的私立澄衷中学两年后，转学考入沪江大学附中就读。1923年，十七岁的倪征燠因成绩出色，直升沪江大学。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转学进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在读书时候，倪征燠就十分关心社会事业。1922年前后，他与平望人凌景埏、吴文均等人发起成立了“平望旅外学生会”，利用暑假举办“平望暑期义务学校”为家乡服务，连续办了四期。

1928年倪征燠远涉重洋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留学。1930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院长。1947年初，担任司法行政部参事，主管外事。

1946年初，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倪征燠以中国检察团首席顾问，同时也是国际检察团成员身份与上海律师鄂森、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仪等中国法官顾问，一并赶往东京。

到东京上任时，检察起诉阶段已过，进入被告提出反证阶段。为了取得法庭上的胜利，倪征燠四处奔走收集证据。他一是在东京就地取材，查阅大量资料；二是冒着大雪从日本回北平取证。他走访了曾去过远东国际



◎ 倪征燠像

军事法庭的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将军，找到了被日本人毒死的吴佩孚的遗孀，甚至还找到了已成阶下囚的“华北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魁首王揖唐、梁鸿志等人。还通过中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组人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找寻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从这些被查封的档案资料中，他们找到了这批被告在中国的犯罪记录，历时7个多月，获取了大量的罪证，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取得了审判的主动权。

在法庭上，倪征燠抓住战机给被告土肥原贤二以致命打击，他当庭展示几份证据：“这是当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向美国当局发回的电文，伪‘满洲国’3000万居民中有900万人经常吸鸦片，销售鸦片日益成为伪‘满洲国’仅次于关税收入的主要财源。”他还举着手中的一张《奉天特务机关报》，字字千钧地说道：“华东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这原是日军的表功记录，现在却是最好的罪证……”由于我方代表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终于在审判终结时，让战争恶魔，受到了法律制裁。

东京载誉而归，国民党政府先后以司法部次长、最高检察长的高位相聘，倪征燠都拒绝了。他宁愿退隐，回到了书斋中，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6年暮春，周恩来总理电邀倪征燠到北京，担任了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开始从事外交工作。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后，倪征燠多次作为代表出席国际海洋法大会；1981年，在联合国第36届大会上，他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11月7日经联合国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征燠当

选国际法院大法官。次年2月，他前往海牙和平宫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倪征燠在国际法院大法官任上干了9年，卸任时已近八十八岁了。他离任后仍不辍耕耘，继续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和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2003年9月3日，倪



◎ 倪征燠严审日本战犯

征奥在北京逝世。

倪征奥身为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在国际法学界有着崇高的声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律的进化》、《法律的假设性》、《美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理论和实践》等。他1964年出版的《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一书，则成为国际法领域的经典著作。

（资料来源：刘守珍《倪征奥的传奇人生》、汤海山《倪征奥海牙归来》、东方亮《倪征奥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片断》、唐灏《远东国际大审判》、宗道一《炮轰金门前夕的一次会见》、倪征奥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凤凰》周刊第127期《世纪法官倪征奥》）

蒯斯曛

蒯斯曛（1906—1987），也作世勋，笔名施君澄。吴江黎里人。早年在黎里读小学，勤奋聪明，学校师生将他与柳亚子儿子柳无忌及傅伯伦、汝人玉、汝人铸兄弟合称“五虎将”。

1924年，蒯世曛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勤奋，成绩优良，爱好新文学，1926年开始创作小说。1926年11月，上海进社文艺研究会创办《白露》半月刊，发表进步文学作品，蒯斯曛担任负责人。1927年，蒯世曛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悼亡集》。

1932年，柳亚子先生任上海通志馆馆长，主编《上海通志》，蒯世曛受柳亚子的邀请，出任编纂。任编纂期间，撰写出了诸如《上海公共租借史稿》等一批颇有价值的史料性文章。1938年，他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1939年9月《大陆》杂志创刊，蒯斯曛与梅益、裘重、柯灵、满涛、包天笑、王小逸等为主要撰稿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党组织动员他和林淡秋等同志到苏中根据地去工作。因为患了疟疾不能随军行动，组织上就临时安排他到如皋县邱升中学当英语教师。在那里，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团结教育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后来不少人成了根据地的干部。

1943年蒯斯曛奔赴苏中抗日根据地，开始在苏中行署文教处编国民教育课本，他埋头苦干作出了贡献。后任《滨海报》（后改为《苏中报》）编辑，白天伏在木桌上，晚上凭借油灯之光，圈圈点点，耕耘不断。当时苏中文化单位集中到报社整风，由于他是从沦陷区来，许多同志不了解情况，对他产生了一些误会，他从无怨言。整风结束，他得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更大信任。

第二年调入部队，跟随粟裕司令从苏中去苏浙军区，先后担任新四军



◎ 蒯斯曛像

一师师部秘书、华中军区司令部秘书、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处主任等职。他是秘书主任，不但配有战马，还配有专门的通信员。苏中战役结束的时候，蒯斯曛专门写了常胜将军粟裕的报道，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称粟裕为常胜将军。蒯斯曛一直在粟裕身边工作，1951年患肺结核，才离开去疗养。

1954年蒯斯曛转业到上海，担任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与新文艺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蒯斯曛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深知编辑工作的辛苦，无名无利，埋头为他人作嫁衣，却得不到社会重视，1962年他向出版局局长罗竹风作了反映。罗竹风听了蒯斯曛的反映后，便写了《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为编辑讲话，希望负责同志最好也能“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同他们谈谈心”等。文章在出版界、新闻界引起很大反响。不久姚文元却写了《两个编辑的想法》的批判文章，对《杂家》一文无限上纲，叫嚷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出版社刮起了一股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歪风”。为此，蒯斯曛在出版社内部受批评、作检查，罗竹风被撤销局长职务。

蒯斯曛后来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他工作孜孜不倦，富有事业心、责任心，“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受到种种磨难，他依然坚持工作，不仅担任了《新英文辞典》责任编辑，还参加《法汉辞典》的编纂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办理了离休手续，但离而不休，仍然埋头于翻译和校阅文稿。1986年，那是他去世之前的一年，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翻译并出版了萧伯纳的小说《不合理的结合》。

蒯斯曛1987年去世，一生勤奋，精通数国语言，翻译过多种作品，诸如左琴科中篇小说《新时代的曙光》、埃德加·斯诺的《在敌人后方》、宁姆韦尔思《续西行漫记》等等。他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小说，主要有《总董老爷》、《两兄弟》、《训导主任》、《伴侣》、《粟裕将军》等，著有短篇小说集《悼亡集》，译著短篇小说集《呼唤的声音》、中篇小说《新时代的曙光》、电影文学剧本《三天》等。

（资料来源：1992年版《黎里镇志》、张军《想起了那个年代》、张雄文《粟裕秘书蒯斯曛的亲人给张雄文的一封信》、马达《执笔一生 不求闻达——怀念蒯斯曛同志》）

刘天韵

刘天韵（1907—1965），祖籍山东，出生于吴江盛泽。他从小喜听评弹。1918年，夏莲生到盛泽畅乐园说《三笑》，见台下有一小童伶俐可爱，愿收为徒，从此，虚龄十一岁的刘天韵，辍学从艺。半年后，就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挂牌登台，艺名“十龄童”，帮先生唱开篇，竟一炮打响，此后随师登台，在上海、天津等地演出，艺名大显。

刘天韵学唱时，每日学开篇一只，背熟为止。刘天韵的师母是琵琶高手，刘天韵将师母巧妙的手法都学到了手。出名后的刘天韵，依然刻苦学习，跟老师夏莲生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演出时，就钻头觅缝地观看其他戏曲，还喜欢看话剧和卓别林的电影。有一次在剧场听京剧，如醉似痴，皮袍的背面被小偷剪掉一大块也未发觉。

1938年与徒弟谢毓菁拼档，说唱《三笑》、《落金扇》，世称“刘谢档”，名噪一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天韵在“大百万金空中书场”电台表演红极一时。解放前夕，他见解放军露宿街头，心情激奋不已。当闸北尚有残敌顽抗时，他不顾特务寄给他的恐吓信，毅然上电台播唱喜庆上海解放的开篇。

1951年，他放弃单干的高额收入，带头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为首批入团的18位演员之一，任团长后更加精神振奋，经常深入工厂农村，满腔热情地为群众演唱。他参加上海文艺界治淮工作队赴安徽淠潼河、佛子岭工地，进行文艺宣传。1953年随团赴广东中南海军基地慰问演出。

刘天韵身处江湖，三教九流朋友很多，为提高技艺，他善于观察，善于交流。经常与三轮车工友谈心，与大饼摊主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工



◎ 刘天韵像

作、收入等。他接触最多的是社会底层人物，演得最好的也是这些小人物。为了说好新书《三雄怨美记》中三轮车夫一角，他深入生活，与附近的三轮车工人打成一片，还学踏三轮车，从感情上理解工人阶级。刘天韵善演丑角，在旧社会，他常常不得不以嗝噓媚俗；而在新书坛上，他认识到“噓”应从人物性格和情节出发。他擅演丑角的艺术才华在新社会得到充分发挥，往往一曲唱罢，彩声满堂。

刘天韵还对评弹艺术进行革新，整理旧书，创作新书，弹唱的书目益多，技艺益精。《玄都求雨》、《老地保》为其代表作，演出时既有欢快喜悦，让人大笑不止，又有悲怆沉郁，使听众流出辛酸之泪。这些节目电台争相播送，脚本刊于《人民文学》并译成外文发表，在当时影响很大。

1954年，刘天韵改任团艺委会主任，与徐丽仙搭档演出长篇弹词《杜十娘》、《王魁负桂英》。1956年开始对长篇弹词《三笑》结合演出整理加工，1958年后，与华士亭搭档演出。他对《三笑》一书，钻研极深，博采广征，兼得王（少泉）谢（品泉）二派之长，对主次角的塑造都很到位，使听众越品越有味。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最爱听刘天韵说书，曾说：“我很敬佩刘天韵，他说的书，不管是正面或是反派角色，都唱得出神入化。春夏秋冬四香，把这四个人物的性格和神情都从他的口、眼、身、手中表演出各个不同形象，使我对武松的表演很受启发……”

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时，刘天韵为中央首长演出，弹唱陈调唱段“林冲踏雪”。毛泽东主席听后赞许道：“唱得好！”周恩来总理聆听后与刘天韵切磋书艺，建议说：“悲哀的方面似应减少些，反抗的方面应增加些。”今世传“林冲踏雪”唱段，已突出林冲的一团怒火，满腔义愤了。《求雨》一折又为刘少奇同志演出过。酷爱评弹的陈云同志称赞“刘天韵也是个好角色”，并说：“青年演员要多听说表好的传统节目，像刘天韵的《求雨》、《老地保》等。”



② 刘天韵与徐丽仙剧照

1962年，赴港演出，任上海

评弹团副团长。他与侄女刘韵若搭档，合作演出《三笑·追舟》，其中刘天韵表演的船工唱山歌，被称为评弹界一绝。1963年，刘天韵因病辍演，在家授徒并记录整理《三笑》脚本。曾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65年病逝，评弹界将刘天韵推崇为“现实主义说表艺术大师”。

（资料来源：李炳华《弹词名家刘天韵》、刘韵若《刘天韵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周德华《锦绣盛泽》）

费彝民

费彝民（1908—1988），笔名执中、夷明。吴江人，出生上海。1925年毕业于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曾在北京陇海铁路总公所工作。1930年费彝民被调到沈阳工作，就开始担任《大公报》驻沈阳兼职通讯员，撰写了大量新闻和通讯稿件。1931年5月是《大公报》发行“一万号”纪念日，张季鸾约他为“特刊”撰稿，费彝民写了《谈大公报的使命》一文，对《大公报》提出了三条建议。这篇文章见报后，在报社内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沈阳，费彝民逃难到了天津，正式加入了《大公报》的行列。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发刊，费彝民担任副经理。由于战况，上海版《大公报》在当年12月停刊，费彝民留在上海保管存于瑞士银行仓库的大公报馆的财产。

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不久，费彝民任经理，后还兼任上海《大公报》经理。

1949年元旦，香港《大公报》发表元旦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费彝民和他领导的香港《大公报》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逐渐为人所知。1949年以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1952年起任香港《大公报》社长。由于《大公报》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曾一度受到困扰，处境不佳，但费彝民力挽狂澜，团结报社员工，齐心努力，使报纸办得富有生机，营业额不断上升。

费彝民由于长期在英国治下的香港工作，且是无党无派的特殊身份，一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50余次接见。费彝民接受周恩来的嘱托，要保护好



◎ 费彝民像

两岸密使曹聚仁的安全。曹聚仁在香港为逃避各方面的监视，不得不频繁搬家，曾写信给费彝民，谈到自己所作的秘密工作。费彝民不仅帮助曹聚仁联系去澳门，还帮他圆了夫妻团聚的心愿。曹聚仁去世，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的费彝民致悼词。

1967年春，费彝民和《大公报》积极投身于反英抗暴的狂潮中。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10月周恩来总理召见费彝民，指示他立即用《大公报》广州专电发布消息，揭露“苏联表面装出和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拖延谈判。”，更进一步指出“据记者了解，还看不到谈判有取得积极进展的迹象”，《大公报》发布的消息让苏联散布的谣言不攻而破。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谈判中日建交，当双方商议《中日联合声明》英文版本时，日方认为“深刻反省”的“反省”一词的英文翻译过于严厉，谈判一度中断，周恩来总理找到费彝民，费彝民很快从法文中找了一个词，译成英文后为“reproach”，取代了原来的用词，一场外交风波得到平息。

1982年，法国政府授予费彝民法国“骑士荣誉勋章”，代表法国政府授勋的法国驻香港总领事艾高乐在致词时说：“在生活还没有演变成革命的时候，生活本身也是处于永值的变化之中。关键在于能够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亲人，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费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1982年的夏天，邓小平召见费彝民，第一次正式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59位委员，费彝民位列其中。1985年后费彝民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8年费彝民去世，全部退休金成立了“费彝民新闻基金”，资助南京大学与美国高等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费斐《女儿眼中的费彝民：文人傲骨丰盛人生》、陆铿《我所认识的费彝民》、《“新闻骑士”费彝民——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接受法国“骑士荣誉助章”》、王鹏《费彝民是怎样进入报界的》、周兴旺《港岛“新闻骑士”——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

黄文熙

黄文熙（1909—2001），吴江平望人，出生上海。年轻时，在上海私立中学学习，后报考暨南大学商科。学习半年后，改入大同大学理预科学习。后考入了河海大学正科当插班生，随后，又考入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25年，太沙基出版了他的《土力学》一书，土力学形成了一门技术科学。

1933年，黄文熙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一届留美公费生，一年后出国。1934年进入美国依阿华大学，1935年春，转入密歇根大学，师从铁木辛柯和金两位教授学习力学和水工结构。在取得硕士学位时，因成绩优秀而被授予斐陶斐荣誉奖章，

并被批准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受到导师和答辩委员的赞誉，当时的《底特律日报》和《密歇根日报》都发表专文，赞扬他是密歇根大学多年来才华最出众的学生。

1937年接受南京中央大学的邀请，黄文熙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国。由于该校已内迁，他先后在杭州浙江水利局和西安东北大学临时工作，于1937年才辗转到达重庆。1939年，他把力学这一新兴科学引入中国，在国内第一个开设土力学课程，并建立了国内大学第一个土工实验室。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校迁返南京。在40年代，他不顾身患肺结核病，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创建了水工建筑物土壤地基的沉降量与地基中的应力分布理论，成为应力路径法的先驱。多次受到当时水利部的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6年，黄文熙除先后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任教授外，还兼任南京水利实验处处长。他积极筹划，开创了泥沙、潮浪、结构材料等新的研究领域。承担了治理黄河、



◎ 黄文熙像

治理淮河及华东地区水电工程等试验研究任务，解决了大量的实际工程问题。研制了许多水工、土工实验仪器，编制了实验手册，培训试验技术人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黄文熙调任清华大学任教授，兼任水利部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参与制定我国《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8年，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三个水利水电科研单位合并成立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他仍任副院长，负责学术领导工作。他使国内岩土工程界摒弃了门户之见，联合了水利、土木、力学、建筑和水力发电五个学会创办了《岩土工程学报》，并亲任编委会主任。他又推动了北京市培养岩土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各单位，联合开设《高等土力学》课程，亲自主编了《土的工程性质》一书作为教材。使研究生们既能听到著名教授讲课，也能听到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师们的精彩讲课。

“文革”中他曾被隔离审查，但仍关心国际土力学的发展，为土的本构关系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注意到电子计算机和有限元法的发展，必须要求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的弹塑性模型对屈服面和硬化参数人为假设过多的缺点，提出了从试验资料直接确定土的弹塑性模型的理论。1978年，他以古稀之年出任清华大学水利系土力学教研组主任，创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八十年代以后，他看到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间在水工模型试验方面的差距，于1984年带队到西欧、美国考察。归国后又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在我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土工离心模型试验装置，这对我国岩土工程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另外，他还组织专人进行渗水力模型试验，支持对旁压仪实验的理论研究，对土工合成材的应用和研究工作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并兼任所属的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

2001年，黄文熙因病去世。有《水工建设中的结构力学与岩土力学问题》、《黄文熙论文选集》等存世。

（资料来源：李广信《黄文熙》、吴江《黄文熙：结构和水利的巨人》）

费孝通

费孝通（1910—2005），吴江松陵人，四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十四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转学社会科学。他先后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又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 费孝通像

1936年初夏，费孝通回到了吴江，他参观了震泽丝厂后，到庙港开弦弓村参观了合作丝厂的各个车间，走家串户访问了当地的村民，记录下了大量的调查笔记。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就是对开弦弓调查的成果。这本书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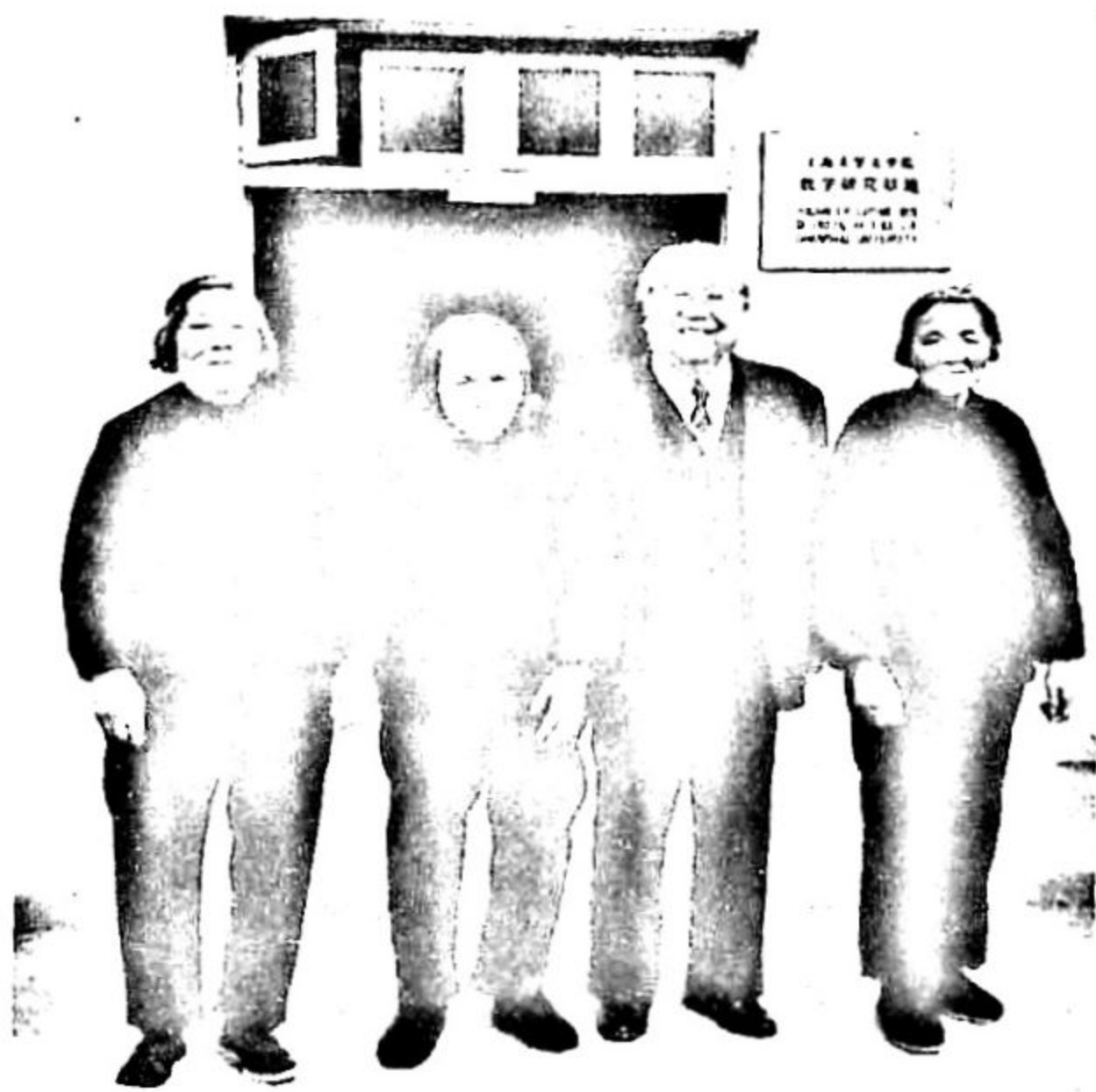
费孝通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任教授，后来担任了清华大学副教务长。在这期间他仍注重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等不同类型的社区，著有《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1947年他在西南联大开《乡土社会学》一课，他的讲课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当时《世纪评论》杂志跟费孝通约稿，他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凡14篇，集成《乡土中国》一书，成了学界公认

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1952年起，费孝通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7年，费孝通再次回到开弦弓村调查，他调查后发现：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副业出了问题，农民的收入下降了。于是他写了《重访江村》一文，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1957年4月的一个座谈会上，费孝通作了发言指出了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转眼间费孝通受到了批判划为“右派”。“文革”又受到了批斗，进入湖北汉口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回北京。

费孝通1979年起历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民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在这期间，他的学术生命又激活了，获得了一个个奖项：美国丹佛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亚洲文化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大英百科全书》奖、“霍英东杰出奖”。还先后荣获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

1981年，费孝通实现了三访江村的愿望。他再次来到开弦弓村，见到了



◎ 费孝通二十四访江村（与老缫丝厂工人合影）

了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化，在农业增产的同时，副业和乡村工业的蓬勃兴起。此后，费孝通有了连续26次访江村的纪录。他见证了江村跨世纪的沧桑巨变。他追踪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变化，见证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追踪了小城镇的发展，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

费孝通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花在了社会调查和文化思考上，并在学术上，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对于

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都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孝通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为人们指明了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社会。

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被誉为“今日中国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

(资料来源：张冠生《费孝通传》、余广彤《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赵唯辰《费孝通的传奇一生》、李强《费孝通与今日之中国社会学》、钱一舟《吴江之子：费孝通七十年的乡土足音》)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费孝通

◎ 费孝通手稿

唐长孺

唐长孺（1911—1994），吴江平望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在多所中学任教，1940年任上海光华大学讲师，1944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等。



◎ 唐长孺像

唐长孺自少年时代起就对历史学有浓厚兴趣，受史学前辈吕思勉教益不少。他开初钻研辽、金、元史，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的活动，在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后，重新考察、认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历史。

解放后，唐长孺教授任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5年，他开始兼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应邀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的编制。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国内史学界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国际上，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以及狩野直禎、池田温等日本学者在《东洋学报》、《史林》等刊物上纷纷写出书评，给以肯定和推崇。1957年，出版的《唐书兵·志笺正》和《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1959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在学术界影响都很大。1961年，他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

1963年至1966年5月唐长孺从武汉到北京，与陈仲安一起整理《北齐书》、《周书》，因“文革”爆发，点校工作一度中断。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71年恢复了对二十四史的点校，他又继续参与，到1974年完成。1975

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籍。

从北京回到武汉大学以后，学校考虑到他的贡献、学术成就，欲将他升为一级教授。唐先生闻知，坚决加以制止。以唐先生的学术地位、学术成就，升为一级教授是完全够格的，但因为职称是有指标的，他就将这荣誉让给了其他人。

唐长孺在培养学生上独具慧眼。1977年初，唐长孺收到了一位叫王素的年轻人的来信。王素向唐长孺讲述了自己业余学习的经历。唐长孺读了王素的信告诉他，中央可能要恢复高考了，要他坚持自己的学习精神，积极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不久高考恢复，王素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成了唐长孺的弟子。根据王素扎实的古文基础，唐长孺鼓励他直接考硕士研究生。这样王素的本科生毕业证书，比研究生毕业证书还晚拿了半年。

1978年以后，唐长孺被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史学会会长，考古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全国唐史学会会长。1980年10月至翌年3月，唐长孺应日本京都大学邀请访问日本，他作了“新出吐鲁番文书的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的简单介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客与部曲”的演讲。这两次演讲给予日本之相关学界以深刻的影响。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副会长。同年他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学术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985年，他又被推选为“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唐长孺教授在他创办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 唐长孺

唐长孺始终表现出诲人不倦的态度，八十二岁时讲起课来仍滔滔不绝，三个小时中休息 15 分钟，却不显倦意。他眼力不好，但记忆力惊人，讲课不用讲稿，所引资料，包括一些数字，都能准确地顺口道出。

唐长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史兼长。唐先生本人诗词写得好，学术研究中也是文史结合，除了他已经发表的有些文章涉及文学与历史，还有关于刘勰《文心雕龙》和西晋“二陆”（陆机、陆云）的论文。他多才多艺，金石书画、旧体诗词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功力。唐长孺与书法家启功关系很好，在一起交流书画，他的书法很有特点，刚劲古拙，超凡脱俗。

1994 年 10 月 14 日，唐长孺因病去世。留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和《山居存稿》等著作。

（资料来源：胡国宝《走近唐长孺》、张忱石《唐长孺先生琐记》、魏连科《唐长孺先生二三事》、石云涛《细微处见精神——忆唐长孺先生》、池田温著、冷国栋译《怀念唐长孺教授》、丁晓禾《老三届朝歌·涅槃》、黄积苏《唐长孺的贡献与乡情》）

杨承宗

杨承宗（1911—2011），吴江八坼人。父亲杨蔼如从事民族实业。杨承宗二十一岁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秋他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从事放射化学及测量研究，师从玛丽·居里夫人的高足郑大章先生。1936年，为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挑起的事端，杨承宗受严济慈先生之托，单枪匹马赴上海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为北京的研究所南迁作准备。1944年7月，南京伪政权教育部长褚民谊派接收大员“接收”了实验室，他说上级授意想挽留杨承宗和陆学善继续在实验室工作。杨承宗和陆学善不肯与贼人为伍，回到家乡继续整理旧日的工作，研修物理和法语。抗战胜利后，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向玛丽·居里夫人的长女、著名科学家伊莱娜·居里夫人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事迹，伊莱娜·居里深受感动，欣然接受杨承宗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 杨承宗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承宗立即给钱三强写了一封信，要求回来建设祖国。1951年，杨承宗接到了钱三强欢迎他回国的信函，同时给他带去了一笔钱，请他代购一些仪器设备。

就在回国之前，杨承宗曾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说明继续聘任两年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555300法郎，另加补贴”。但是对杨承宗来说，建设新中国更有吸引力。虽然明知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只有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谢绝了法国科研机构的聘请。

杨承宗回国了，他不仅从法国带回来这么多的器材、图书和向居里实验室要的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还带来了约里奥·居里请他传话给毛主席

席的话。“反对原子弹，首先自己要拥有原子弹”，正是这句话，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加快创造“两弹一星”的决心。杨承宗亲手将居里夫人实验室所赠予的10克碳酸钷镭标准源捐献给国家。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所长钱三强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他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放射化学”和“钷化学”等专业课，并筹建了全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小楼。

1953年，为了开展中子物理研究工作，近代物理所需要一些氘。可是氘从哪里来？杨承宗想到，抗战前协和医院从国外买来一台含有507毫克钷的提氘设备被密闭在一个特殊的玻璃装置后，又牢牢地锁在保险柜中。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竟把这个玻璃装置弄坏了。杨承宗决定把这套装置修好，可那时没有防护装备，只能以血肉之躯去面对能够穿透金属板的射线。为不伤及他人，他不让别人靠近，自己凭着技术，处理好了破损的装置。但是，因为他过近地接触强射源，导致了他后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下降。

1960年，苏联政府毁约停援，撤走了全部专家，杨承宗1961年4月到北京钷矿选冶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接替撤走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在一次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向周恩来总理举杯敬酒时，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我拜托你们了！”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杨承宗终于领导所有的科研人员提前3个月提炼出了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高纯度钷，这时他才舒了一口气说：“可以向周总理交待了。”

“文革”期间，杨承宗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71年离开原子能研究所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下迁队伍到了安徽合肥。“文革”结束后，1978年11月他开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曾带过20多名博士和硕士生。在60多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他编著了《关于 β 射线的散射现象》等专著多种。他的学生，有的成为院士，有的佩戴上共和国勋章。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对安徽科技协会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期间，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为中国大学体制改革走出第一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曾在杨承宗90寿辰之际为他亲笔题词：“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

2010年9月16日，中国科大为杨承宗举行了“百岁华诞及从事学术活

动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科教界专家学者和杨先生曾工作过的单位代表以及他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齐聚一堂，温家宝总理专门寄来贺信。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在北京逝世，被誉为“没有勋章的‘两弹一星’功臣”。

（资料来源：边东子《杨承宗》、张志尧、远泽清《科技创新添华彩 居里风范传后人——记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教授》、王怡《吴江赤子学界巨擘——记吴江籍著名科学家杨承宗先生》）

冯新德

冯新德（1915—2005），吴江同里镇人。在同里丽则女校读小学，1933年考入东吴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他感受到了学校的学习氛围，那里的学生一是不修边幅，二是认真读书，培养了他的学习意识。1937年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在清华园准备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时，“七七”事变爆发，北方各大学南迁，他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昆明。1938年至1939年执教于云南大学，1940年转到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化工科任教。当时，遇到重庆大轰炸，校园荒乱，学校欠薪三个月，他自告奋勇作为教员代表向校长交涉没有结果，只得离开学校自谋出路。1941年12月，到浙江大学，做了化学系主任李寿恒教授的研究生，后当讲师教有机化学。当时浙江大学从校长、系主任直至学生朴实求是的作风对他影响很大。1945年，而立之年的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生，第二年入美国印第安纳州诺脱丹大学研究院化学系，师从著名高分子化学家C. C. 普赖斯（Price），还作了美国通用轮胎与橡胶公司研究员，实践研究成果。他完成了“氯代乙烯基萘的合成、聚合与共聚合”博士论文，1948年8月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秀，连续三年获美国通用轮胎橡胶公司奖学金。曾随导师参加美国化学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让他大开眼界。



◎ 冯新德像

学成后，冯新德接受清华大学聘请于1948年9月回到上海，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兼辅仁大学化学系教授。1949年，冯新德于清华大学首次讲授高分子化学—聚合反应课，他博采国内外的先进方法与经验，把这门技术运用得有声有色。

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新德到北京大学任教高分子化学课，指导研究生论文，筹建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1953年开始招收高分子化学研究生。1955年起他受任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有关高分子化学的各项规划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他被聘兼任研究员。1958年在冯新德的倡导下，北大创建了全国第一个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他亲自担任主任三十多年。1965年秋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待日本大阪有机化学教授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团长并稔曾经读过冯新德的文章，一下飞机就提出要见识这位高人。郭沫若就请冯新德参加了晚宴。二人一见如故，此后交往密切，一起组织了中日自由基聚合讨论会，自1980年首次在日本举行后，每隔两年分别在两国依次举行了五届讨论会，在1991年举办了第六届讨论会。自此冯新德频频出现在日本、美国、德国、荷兰、韩国等地的国际会议上，备受国际化学界的瞩目。

“文革”中大学停止招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他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40多名。冯新德在教学上非常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技能，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冯新德的严格指导下，学生们成长较快。一次，有个研究生观察到一种反常的实验现象，重复多次，这一现象仍然出现，便认为可能是新发现，并根据其他实验，提出了新的看法。冯新德听到这一汇报后，布置这个研究生反复核实，以得出严格的实验证据。后来这个研究生又汇报了几次，每次冯新德都提出一些需进一步证实的问题最后终于发现这一现象是由于药品自身反应产生杂质所引起的假象，而不是突破性的新发现。冯新德严谨的治学精神，给研究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为了培养大学本科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冯新德一贯重视毕业论文的训练。1979年秋他陪来校参观的诺贝尔奖获得者P.J. 弗洛莱(Flory)教授参观时，介绍到本科生在做毕业论文，引起弗洛莱的极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做毕业论文。P.J. 弗洛莱到实验室观看了学生的论文实验，感受到冯新德教学方法的独特性。



◎ 冯新德与北京大学学生七十年代末的毕业生合影

1978年冯新德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至第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兼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院士)。此后,他受聘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顾问、日本京都大学医用高分子与生物材料研究所客座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中心客座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报》和英文版《中国高分子科学》的主编,他还负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分子化学方面的重大、重点项目,共发表中英文论文200余篇,并著有《高分子合成化学》一书,曾获国家级奖励6项。中国化学会于1989年授予他育才奖,1999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2005年10月24日冯新德因病去世,被誉为我国“高分子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代高分子宗师”。

(资料来源:丘坤元 张中岳《冯新德——中国高分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汤海山《冯新德:快乐院士》、吴江《冯新德:高分子化学泰斗的学子情》、孙燕慧《冯新德教授谈研究生业务培养的科学方法》。

钱家骏

钱家骏（1916—2011），原名钱云林，祖籍吴江同里。1932年7月，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高中艺术师范科，学习油画和中西绘画理论，更名钱家骏。1933年春与同学杜学礼、冯雪魂、徐恭寅发起组织苏州美专“科学研究会”，被称赞为“至着劳绩”。

1935年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由颜文樑校长推荐，考入南京励志社美术股，从事美术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家骏随工作机关转移后方，与同事在汉口绘制连环画片，拍成幻灯片分发各地放映，宣传抗战的意义。1939年冬季开始，钱家骏在重庆和“励志社”几个热血青年一起，将一首抗日题材的民间歌曲改编成充满田园情趣的黑白有声抗日动画短片《农家乐》，这是他拍摄的第一部动画片，对宣传爱国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1年8月中华教育电影画片社成立，钱家骏担任该社绘图组组长，包干全部绘制部分的工作。1943年钱家骏加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从事动画电影的教育工作。1944年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聘为教授。1945年5月，中华教育电影画片社解散，钱家骏回到重庆励志社美术股。7月，中国第一个动画学术团体——“中国动画学会”在重庆成立，钱家骏任会长。1946年8月，钱家骏随励志社由重庆迁回南京，任卡通股股长，1947年曾在“南国动画艺术学院”任董事，任教一个学期。1947年冬，励志社卡通股停办被调到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美术股股长和编导委员。1950年3至4月间，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成立“电影制片室”，钱家骏参加该室的工作，同时讲授《动画基础讲座》，编写动画启蒙教材《动画原理》、《动画线描》。10月，



◎ 钱家骏像



◎ 电影《牧笛》



◎ 电影《小蝌蚪找妈妈》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动画科成立，钱家骏任主任，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高等学校设立动画专业课。1952年7月苏州“美专”并入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钱家骏任动画专修科教授兼副主任，后又任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动画系主任、教授。他在动画教学期间，培养出了许多动画人才，钱家骏的学生中，徐景达导演《三个和尚》、《蝴蝶泉》，严定宪、林文肖导演《哪吒闹海》、《雪孩子》，胡进庆导演《鹬蚌相争》、《葫芦兄弟》，戴铁郎导演《黑猫警长》等均获国内外大奖。

钱家骏在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导演兼副总技师、总技师期间，冲破各种困境要为中国美术电影争口气，白天厂里上班，晚上研试化学溶解，天天过十二点才睡，他床前床后

放满了化学、物理书籍，在一张小桌子上试制的各种颜料和颜色药物瓶子。在他这样的废寝忘食的钻研中，终于解决了中国动画片在配色上的种种困难，诞生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这期间，他参与制作的动画片连连获奖：担任美术设计动画片《好朋友》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与李克弱联合导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获第八届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奖状、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三等奖；《一幅僮锦》背景运用了传统中国绢画形式，获捷克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荣誉奖。由于成绩卓越，他曾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奖。

1960年7月5日，钱家骏担任技术指导的我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开创了最富中国特色的水墨动画片之先河。该片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美术片奖、瑞士第十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短片银帆奖、法国第十四届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儿童片奖。1963年，他和特伟担任

导演的水墨动画片《牧笛》将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动画片推向世界，获法国第十七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南斯拉夫第三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分组一等奖、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第四届国际儿童和青年节二等奖、丹麦的第三届国际童话电影节上荣获金质奖，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文革”期间，钱家骏受到残酷迫害。1973年被关入上海第一看守所。1976年释放后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总务科从事体力劳动，后被派任资料员，到1983年3月1日才正式平反。他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仍执着地参与动画片的制作。1981年和戴铁郎联合导演根据敦煌莫高窟257洞内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的《九色鹿》，具有中国古代佛教绘画的风格，在加拿大汉弥尔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特别荣誉奖。1985年由于钱家骏对水墨动画片的巨大贡献，荣获文化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1月，中国动画学会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钱家骏为发起人之一。

1987年2月，钱家骏退休后，曾在杭州、无锡的动画制作公司和南京电视台参与教学工作。之后，淡出动画界。2011年8月15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他被誉为“中国美术电影泰斗、中国水墨动画片创始人之一、中国动画教育创始人”。

（资料来源：李镇《钱家骏年谱》、杨林《〈牧笛〉、〈九色鹿〉导演钱家骏病逝》、王京雪《继续寻找钱家骏》、徐佳和《钱家骏》、啸古《我的老师钱家骏》）

杨嘉墀

杨嘉墀（1919—2006），吴江震泽人。在祖父杨文震创办的“丝业小学”启蒙，毕业后就读震泽中学。1930年左右随父母迁居上海，1923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选读工科，学习到一些机器制造方面的知识和技术。1937年进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到了昆明，应聘到西南联大电机系担任助教。1942年中转入中央电工器材厂从事载波电话的研制工作，1945年做出了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的样机。1947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科学与应用物理系学习，获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除了在哈佛大学修读所在系的课程外，还修读了物理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课程，因此大大扩展了他的知识面。



◎ 杨嘉墀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杨嘉墀申请回国遭到阻挠。1950年至1955年他先后被聘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副研究员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现为洛克菲勒大学）的高级工程师，参与研制了高速模拟电子计算机。杨嘉墀研制的“快速记录吸收光谱仪”，曾获得美国的发明专利，被称为“杨氏仪器”。

1956年，杨嘉墀终于回到了祖国，先后担任了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兼室主任和副所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嘉墀曾为该校自动化系的建设、授课和学生的毕业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杨嘉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空间科学技术。12月回国后，他和其他团员根据当时我国国情，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从研制探索火箭起步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建议得到采纳。1960年前后，他领导的研究室和研究小组完成了火箭发动机试

验用的仪器仪表、热应力加温加载测试设备和核爆炸测试设备等科研项目；1964年初，负责完成了国防科委下达的研制核爆炸试验用测试仪器的任务（即“21号任务”）。为以后的原子弹试验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杨嘉墀作为总体组的成员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他白天要写检讨，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悄悄地到实验室工作。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杨嘉墀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然而，他却在假肢厂劳动改造。

1972年4月，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杨嘉墀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访问日本。他回国后在我国返回式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方案论证和技术设计中，提出了一系列先进可行的设计思想，使该系统在1975年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飞行试验，为我国空间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结束后杨嘉墀恢复了职务。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他针对以往航天器测试系统一个型号一套系统的作法，提出了用标准模块组成计算机测控系统的建议。1983年杨嘉墀负责中意利用“天狼星”卫星进行通信试验合作项目的执行，为开拓通信卫星的应用作了示范。就在这一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至1987年连任两届。

1986年，杨嘉墀与王大珩、王淦昌和陈芳允等四人一起联名致信党中央，呼吁我国经济建设不仅要着眼近期效益，而且要为我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四化建设打好基础。要抓住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时机，瞄准高技术的发展前沿、积极跟踪高技术。这封信受到党中央的高



◎ 1940年，杨嘉墀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



◎ 1992年，杨嘉墀在海湾战争后国防科技战略研讨会上

度重视。1986年3月，邓小平作了重要批示。随后国务院主持制定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即“863计划”。杨嘉墀一直在为这个计划中几个领域的执行献计献策，1989年

至1997年他担任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1996年，杨嘉墀提出关于月球探测和开发的建议，第二年又在一份由他修改过的论证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为以后的“嫦娥”工程打下了基础。2005年1月杨嘉墀与五位院士向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关于促进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的建议”，得到了总理的高度重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根据建议开始安排实施。他成就卓越，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1年被航空航天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1999年荣获何梁何利技术科学奖和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0年获IEEE（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授予的“千年勋章”成就奖。

2006年6月11日，杨嘉墀在北京逝世，被誉为“我国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

（资料来源：孙承启《我国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杨嘉墀》、边东子《他是一颗星——杨嘉墀院士的功勋》、汤海山《杨嘉墀：和平法码》、吴江 张澄华《杨嘉墀：搏击苍穹 丹心映天》）

后 记

经过近一年的编撰、编辑，《吴江历史文化丛书》一套九本终于正式出版了。在丛书出版过程中，九本书的编著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在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细致入微地进行了文稿的编写，从源头上保证了文稿的质量。同时，图片的提供者、插图作者、编务人员、出版社编辑等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使丛书能够以尽可能的完美奉献给广大读者。正是有了大家的精诚合作，使我们这套丛书得于在金秋十月顺利面世。

姚海兴先生为丛书的文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他不厌其烦与各位作者及时沟通，保证了丛书的整体质量，对他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吴江区委、区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中共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多次参与了丛书的前期沟通会议，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也提出了要求和意见，并在百忙之中欣然为丛书作序；中共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志芳亲自担任丛书主编，对丛书的内容、版设、装帧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使丛书的出版得于顺利推进。对于他们的关注、指导，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因为丛书涉及到的内容广泛，有些资料年代久远，编著者在收集整理撰写过程中也难免存在着偏疏和遗漏，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编者

2014年9月